



引 言

一 文化及文化学的概念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系统之中，文化无所不在，谁也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行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创造文化、选择文化的过程。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文化交流，冲开了民族壁垒，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改革的洪流，在世界各地掀起。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一方面，我们的时代要求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传统存下来的文化，既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改革相冲突的因素；还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对待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外国文化。于是，便引发了新时期以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冲突与论争。基于此，文化成为当今人们普遍关注并展开论争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文”甲骨文写作，像人身上刻有花纹形，本义是文身，

引中为花纹，再引中为文饰，如成语“文过饰非”中的“文”即是此义。“化”小篆写作，左像正人，右像反人，合在一起表示变化的意思，引中为教化。“文化”一词在我国的出现，至迟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意思是指文治教化，即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礼乐典章制度对人的制约与感化。这种对“文化”的理解，在我国一直保持到近代。

我们今天常用的“文化”一词，其意义显然与古代不同，它是19世纪末通过日文转译从西文引进的。这个词的英文、法文均为“culture”，德文为“Kultur”它们都是从拉丁文“cultura”演化来的。拉丁文“cultura”本意指耕作，后引中出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意思，现在的英、法、德等语种还保留了拉丁文的某些含义。

以上我们对文化的字面意思作了解释，那么什么是文化的科学含义呢？据《大英百科全书》的统计，对文化含义的阐释，在西方历史上有160余种，如果加上中国人的解释，大约有170多种。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在文化的定义上见仁见智，众说歧出。如有“理性的实体”、“理想的类型”、“社会的遗传”、“行为方式的总和”、“工具和制度的造作”、“民族精神的体现”、“人的能力的增长”、“生活模式”等等。^①看来文化是一个因其内涵的不确定而导致外延不确定的模糊概念。我们比较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指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状况。文化的主体是社会的人，客体是整个客观世界。所谓文化不是不受人影响而自然形成的自然物，而是人在社

^①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二百题》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会实践过程中认识、掌握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及其创造和保存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合整体，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①

研究文化的产生、发展，并阐释文化的性质、特征、内容、形式、结构、功能、类型和变迁，从而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即是文化学，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文化学是在近代西方逐步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文化学脱胎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是文化学的萌芽阶段。此时期的代表学者有法国的孔德、英国的斯宾塞和泰勒、美国的摩尔根、德国的克莱姆等。文化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于1909年发表《文化学的能学基础》，提出了“文化学”概念。美国学者怀特于1949年著《文化的科学》，又于1963年著《文化进化》，人们称他为“文化学之父”。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形成了许多研究文化学的学派，如进化学派、播化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社会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等。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西方文化学研究的各派观点多有引进。

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又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的集合体，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硬件”和“软件”。因此，文化结构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部分，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产物，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文化，是人在物质生产领域中认识、掌握、改造世界的创造力量和发展程度的表现。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获得生存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资料，必须进行生产活动，

^①参见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必须进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因此，物质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物质基础。

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精神活动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称，包括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政治、法律、道德、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理论、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组织机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谓区别是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人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创造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不同的。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二者之间的联系、统一是绝对的。物质文化为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虽有区别，但不存在着“开阔地”，它们之间有一个中介体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中介体就是各种社会制度，诸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正是由于社会制度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所以文化结构又可以分为二个层面，这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由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包括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又由于意识形态可分为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两部分，因此，文化结构又可以细分为五个层面：

第一，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状况。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这是整个文化结构的最底层面。

第二，反映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三者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决定着物质文化的性质。生产关系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文化关系的物质基础。

第三，连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体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制度，还包括受经济制度制约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

第四，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一个低层次，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在意识里的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客观内容的反映，包括感情、情绪、信念、意志、风俗、习惯、德行（如忠贞、刚毅、勇敢、正直）、情操（如同情、慈悲、义愤、爱情、热心等）、信仰（如敬畏、虔诚、佩服、信赖等）、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民族性格等等。

第五，思想体系。思想体系是升华了的社会意识，是系统化、理性化、理论化、抽象化的社会意识形式。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科学理论、艺术、文学、美学、教育、哲学、宗教等等。这是精神文化的高级层次。^①

二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结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悠久历史演化而成的一种经久起作用的文化，即是中华各族人民长期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表現，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这些内容有的起自奴隶制时代，甚至更早，有的起自封建时代，也有起自近代中国的。把传统文化界定在古代，或者等同于封建文化，都是不准确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结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经

^①参见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深厚基础。

第二，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早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氏族公社就已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构成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历史的基本事实。进入奴隶社会后，它演变为奴隶制的森严的等级关系和阶级关系。到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壤。皇帝、贵族、地主和农民，君臣父子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因此，“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宗法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封建文化极为重要的内容。

第三，在小生产自然经济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包括宗法等级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等。它们是适应和表现宗法等级的生产关系的制度规定，并为之服务的。

第四，在顽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家庭血缘宗法等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下和作用下，形成和积淀起来中国传统的稳定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文化心理结构。

第五，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结构的不断加工、升华，使之系统化、理性化、理论化，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伦理道德、科学理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而其中宗法伦理道德的意识形态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宗法伦理道德纲常及其理论上的集中代表——儒家的礼教占据意识形态的“一尊”地位，具有

“无上权威”。^①

三 西方文化及其特点

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三个主要的类型。西方文化的起步要比中国晚得多。当中国的夏王朝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欧洲基本上还处于一片蛮荒状态。欧洲的文明来源于东方。地中海东部靠近小亚细亚的克里特岛上的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同出一辙的米诺斯文化最早影响到欧洲。欧洲文化的来源有三，即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希伯莱文化（即基督教文化）。

1. 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的精神是注重自由、现世的欢乐，最突出的成就是哲学与科学。

希腊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苏氏偏重道德哲学；柏氏主张由真知达到德性，他所著的《理想国》为西方伦理、政治的重要经典；亚氏是最博学的人，他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伦理学方面，他将柏拉图的四基德扩大为十德；在政治方面，他主张道德政治；他所著的《伦理学》，是一部哲学巨著，是讲求思想方法的重要著作；他还研究动物学，是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总之，亚里斯多德的多方面贡献使他成为西方学术思想的权威。

希腊的科学，如几何学、天文学、数学、原子学说、物理学都很发达，成为今天西方科学的源头，其中德谟克利特、阿基米德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对后世影响很大。

^① 参见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 9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年。

希腊科学、哲学发达，它的哲学常从个人人生直透到宇宙万物，但缺乏政治，因此希腊始终停滞在城邦政治，而不能建立成一统的国家，这是希腊文化的缺点。

2. 罗马文化

罗马文化讲求政治法律，组织权力，所以它的突出成就在政治与法律，一切国家大事都由元老院议决，元老院议员是由有财产的市民选出来的；法律方面，公元前 451 年，罗马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就议定了《十二铜表法》，这是罗马有成文法之始。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起源于公元前的罗马共和时代。罗马文化中权力组织高于一切，谈不到道德，纵使有，也只是政治道德而已。

3. 希伯莱文化

希伯莱文化是宗教哲学的文化，是出世的，悲观的。希伯莱种族最初居住在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迁到巴勒斯坦地区，再迁埃及。到埃及后，受到法老的歧视和虐待，于是希伯莱民众在其酋长摩西的带领下，又回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并建立了国家。在大卫王统治时期，建都耶路撒冷。到了大卫儿子所罗门王统治时期，国家逐渐强大。所罗门死后，国家分裂成两部分，一为犹太，一为以色列，以后此二国分别被罗马与亚速所灭亡。希伯莱民众在长期流离迁徙和被人欺凌中认识到，欺辱他们的人固然有罪，而他们之所以常受压迫，也是因为有罪的原故。因此，他们仰望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耶稣就在这种仰望期盼中来临了。不过耶稣认为不仅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一切苦难的世人，因此耶稣教义具有世界性。当日耳曼人南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耶稣教会把罗马人的法律组织引入到教会里，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力量，把强大的征服者日尔曼人教化了，从而形成了宗教控制政治的局面，使一切学术思想、科学艺术都成了宗教的附庸，造成西方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公元 500—1500 年），于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便有文艺复兴与宗教革命。文艺

复兴是希腊文学、艺术精神的复苏，是个人现世自由欢乐主义的复兴；宗教革命是政教分离的复兴。由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才有现代西方国家的产生。

文艺复兴后，西方文化趋于活泼繁荣，特别在科学方面，相继出现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伽利略关于银河系的观念；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及微积分；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巴斯德的细菌学；汤姆逊的电子学；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这些科学上的伟大成就，造成了今天的知识爆炸、物质文明，也使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西方文化就是揉合了这三方面的文化而形成的。主张个人自由、重视科学研究是希腊精神；讲求民主与法治、主张向外扩张领土是罗马精神；主张互助博爱耶稣精神。

我国著名学者陈独秀、梁漱溟都坚持西方文化的精神是科学与民主的观点。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彩的文化。西方文化面临的是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如何求得生存。梁氏在其所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所有衣、食、住，种种物质的需要都是从自然界取得的，所以，这时态度当是向前要求的，就着前面下手的，对外改造环境的，以力征服障碍的。若不向前想法子而就着自己这面想法，那就不成功……那么就不得生存。

向前要求以满足欲望的西方意欲趋向产生了两个基本态度，科学和民主是其具体表现。朝向外在世界的知性计算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利己和谋求个人权力导致了民主的产生，现代西方文化是这两种态度逻辑发展的极点，而这两种态度又都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古希腊的怀疑论哲学家提出以‘个人利’为评价人物活动的唯一标准；苏格拉底把知识与道德相提并论，尤其强调理智。西方文化就是完全的自私和理智的运用。从古希腊时代起，大多数西方哲学家主要从事于对自然世界的理性研究——认识

论、宇宙论——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西方文化的一切特征——合理化的、竞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宗教的衰落，对法律、权利和个人的强调——都是从这里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文艺复兴使西方文化恢复了正常的发展，西方人的根本态度也由此回归到了希腊时代的样子。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成就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当然，“世界的发现”是科学的兴起。此时，希腊的理性主义得到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补充。批判的理性主义摧毁了宗教和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英国的经验论者则把利己和知性的计算这两个根本的态度，与西方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了现代工业的产生。文艺复兴的“自我发现”，促进了民主的发展，这种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个人的权力基础之上的：从积极方面来说，保证个人的充分发展；从消极方面来说，保证个人的自由在确定的行为范围内不受社会和其他个人的干涉。实际上“个性的伸展对于个人的社会性的发展”而言，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民主提供了有效的社会组织，但同时又保护个人使其个性不受社会组织的扼杀。是西方文化的自我意识产生了西方民主这一伟大成就：个性伸展和社会性发达。既然个人都享有参与组织决定权，那么个人就不是组织的附属品；组织对个人自由的保证，又使个人感到在不放弃自己自由的前提下有必要服从组织的决定。个人和组织相互依赖，不能分离，没有个人的组织或没有组织的个人都是不能存在的。

个人自由与自我意识不仅对个人有价值，而且对于集体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个人力量的发挥也就增强了社会团体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私自利，西方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殖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个人对社会的积极参与，著名的西方公众精神与民主也是不可能的。

西方文化对“自己”与“我”的承认与肯定，必然导致利己和向着自然界要求种种东西以自享的西方态度。作为西方人的知

性计算的一个后果，“我与其所处的宇宙自然是混然不分的，而在这时节被他打成两截，再也合拢不来。”西方人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满足自己欲望，被利用、被征服的对象。这种态度也表明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现代西方人的理智太强太盛。虽然它在知识与财富方面获得了巨大增长，物质生活也极为丰富，并取得了其他许多令人钦佩的成就，但它也使“精神上”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

梁漱溟认为：“西洋人自秉持为我向前的态度，其精神上怎样使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罅隙……罅隙愈来愈大，很深刻地划离开来，就弄得自然对人像是很冷，而人对自然更足无情。无复那古代以天地拟人而觉其抚有万物，像对人类很有好意而人也恭敬它，与它相依相亲的样子；并且从他们那理智分析的头脑把宇宙所有纳入他那范畴，悉化为物质，看着自然只是一堆很破碎的死物，人自己也归到自然内，只是一些碎物合成的。”西方人为了个人利益的知性计算，便把“（他们的）宇宙和人生断裂隔阂，矛盾冲突，无情无趣，疲殆垂绝”。^①

西方人也不可能从他们同伴那里获得任何安慰，因为“人对人分别界限之清，计较之重，一个个的分裂对抗、竞争……像是觉得只有自己，自己以外都是外人或敌人”。甚至家庭也受其影响，“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要算账，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

由此可见，理智的计算导致的科学、利己主义导致的民主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物质的知性计算与利己两种倾向结合的必然结果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达。

^①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辽宁大学哲学系自编教材。

四 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为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提出了“挑战与回应”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该民族对其所生存的环境所作的挑战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每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的两个重要的文化体系，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可以用“挑战与回应”的理论来加以说明。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太平洋西岸的欧亚大陆的东部平原地区，即黄河中下游平原。这一地区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南部是印度洋，西南是横断山脉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西北部是戈壁荒滩，北部是古人为防御外族侵略人为修建的万里长城。该区域平原广阔，土质肥沃，河流众多，人口密集。人们在这种自然兼人为的封闭的生活环境里进行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与消费单位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就具有浓厚的封闭性与内向性。在这种农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注重向人的主观世界寻求，向人的内心世界寻求。这种文化追求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关于如何“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观念与规范，伦理道德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成为伦理道德型的文化。

西方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西部，西临大西洋，南濒地中海，东南是黑海、里海，北临波罗的海、北冰洋，东部以乌拉尔山脉与亚洲相邻。欧洲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适于发展海洋贸易、海洋运输。欧洲上地面积狭小，平原少，山地、丘陵较多，发展农业生产条件欠佳。这样，古代欧洲

人自始就注重利用海洋的优势，发展海洋贸易与海洋运输等商品经济。商品生产与交换成为古代欧洲经济的一大特色。商品经济具有开放性与外向性的特征，在这种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欧洲文化也就具有了外向性与开放性的特征，就是说西方文化一开始走的是向外部世界寻求的道路。古代欧洲人向外部世界寻求并对这种寻求过程与结果进行知性计算，这就产生了自然科学，故西方文化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为重心，西方文化就成为自然科学型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要区别，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中国传统文化以静止、和谐对称、直觉思维、整体、性善、人治、中庸、平均主义、循环论为本位。

西方文化以运动、斗争战争、分析思维、个体、性恶、法治为本位。

以孔子、孟子为主要代表的儒家文化主张“宁静致远”；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主张“清静无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干，儒道互补型的文化，这样静止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了支配地位。

儒家文化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和谐对称成为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这种观念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建筑上，导致以和谐对称特征的四合院民居的产生；在历代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出现过汉代与匈奴的“和亲”（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联姻、明代与北方少数民族瓦剌的“和亲”；现代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思想在现代政治外交中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都注重直觉思维。直觉思维就是主体在充分的思想准备的前提下，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

接获得某种知识的能力，突然发生认识上的质变与飞跃，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儒、道、释三家都提出了丰富的直觉思维观念，从而使直觉思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直觉思维是灵活多样、瞬息而现的，它有利于人们动态地把握整个世界，但直觉思维也有弊端，它不注重定量分析，以直觉思维所获得的结论具有不精确性、模糊性，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明显的不精确性、模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定量分析是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必备条件，由于不注重定量分析的直觉思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就限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以直觉思维为主导的一个结果就是整体本位思想的产生。直觉思维的特点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道家代表庄子提倡“与天地并生，而与万物为一”；新儒学大师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整体观念，他曾这样解释国王的“王”字，上下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代表皇帝，皇帝作为天的儿子（天子）秉承天的旨意来统治人间，这样就把天、地、人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董仲舒的这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但却体现了中国古人朴素的整体观念。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的思维观念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中国人的姓氏是家族整体的姓在前，家族个体成员的名字则在后，而西方则相反，家族的姓在后，个人的名字在前。中国传统文化先强调整体，把整体置于首位，忽视个体，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义务与责任，轻视个体的权利。这种整体思维观念的现实表现就是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性论上，突出强调性善，儒家正统思想的代表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他举例说，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爬在井边有掉下去的危险，立刻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怕小孩掉下

去，想法去救他，这个人与小孩的父亲不是老朋友，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他也不想得到乡亲们夸奖，没有多加考虑，他的恻隐之心是真情实感，是自然感情，是内在的。孟子认为这就是人的先天本性，这种本性当然是善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都是善的，不是外力强加的。这种人性善的学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构成了德治、入治的理论基础。

在治国形式上，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人治”，主张“贤人政治”。儒家是“人治”论者，它把政治看成个人道德的扩大，注重并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所谓“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则着重对人与法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强调人起着决定法的作用，“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种人治论在儒家文化处于一尊地位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起着主导作用。

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孔子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前提下，总结与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中庸思想就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以执中的方法解决问题，其具体运用就是用中求全的实践辩证法。中庸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庸之道几乎成为正统的行为哲学的代称。

平均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损有余而补不足”，儒家孔子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这种思想观念对后世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早期农民起义大都是在“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的旗帜下进行的。宋代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向广大群众

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用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钟相则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则将这一“均贫富”思想发展成为“均田免粮”的纲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则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均主义口号。甚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伟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治国思想中也有鲜明的平均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循环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色。孟子曾说：“天下之势，口一治一乱。”认为人类社会是在治与乱的循环中向前发展的；阴阳家则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因素的相生相克，导致了人类社会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这种历史观上的循环论对中国古代社会上朝的循环更替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中国封建社会在朝代的恶性循环中停滞不前。

西方文化在静止与运动中更注重运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一切皆流”、“万物在变”的观点，认为运动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是永恒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他曾用“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运动的绝对性。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则将这一观念推向了极端，指出“人甚至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从而将运动神秘化了。

西方文化以运动为本位产生了它以斗争战争为本位。赫拉克利特曾说：斗争是万物之父，战争是万物之母；德国著名思想家黑格尔在其著名的《权利哲学》一书中曾指出：每个国家的主权在其外交活动中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不能用相互协商来处理的国家间的争端，只能靠战争来加以解决。黑格尔把这种战争制度看作是维护民族内部健康和活力所必需的和有益的制度，这一理论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前 50 年，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抢夺原材料、能源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活动，其间发生的国家之间的冲突、纠纷与矛盾，导致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以说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与精神痛苦的两次世界大战是由以斗争战争为本位的西方文化所蕴育出来的。

分析思维是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分析思维在探讨对象时，是将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然后对各个部分进行细致入微的精确研究。这样分析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定量分析，人们运用分析思维所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严密的精确性、逻辑性，而定量分析、精确性、逻辑性是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故以分析思维、逻辑思维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发展出了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发达的自然科学与技术。

西方文化注重分析思维导致了它注重个体。分析思维将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加以研究，这就把部分、个体突出了，将部分、个体置于首要位置，这样西方文化中就产生了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哲学观念。这种哲学观念将个体、个人作为社会的逻辑元点和价值元点，反映在民法上就是权利本位观念。权利本位则成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权利本位产生出了西方的人权观念、民主观念，西方的法律由此发展起来。罗马法即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典法，它影响以后整个世界的法律文化。

西方文化的另一特色是主张性恶，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基督教《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让他们在伊甸园中生活，并给他们制定了戒律。他们违背了戒律，偷吃了禁果，犯了罪，惹怒了上帝，上帝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由于他们犯了罪，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生来就有罪（原罪），人生下来就要赎罪，这就是基督教的性恶论；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与人是狼与狼的关系；著名哲学大师黑格尔则明确地肯定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恩格斯对此在《路

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作了如下表述：在黑格尔看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西方思想家主张性恶，认为人生来就是利己的、排他的，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发生冲突和纠纷，这就有必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来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纠纷。法治是西方文化的又一重要的特征。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明确指出：“法治高于一人之治。”他反对人治论，鲜明地倡导法治论，他说：“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者，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亚里斯多德认为法治总是同民主的或多数人的政治分不开的。产生于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改革，出现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一思想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学思想家改造与发展成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成为资产阶级法治的基本原则。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作了一个根本性的比较，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发展的两个系统。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与融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特别是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与斗争，从而开始了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与交流的历史。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产生、发展、特点及其百余年的论争交流史的反思，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走的是反省内求即向人的主观世界（内心世界）寻求的路线，它有助于培养人的“正心、诚意、

修身、养性”的内圣品格，它有助于净化人的灵魂，升华人生，它解决了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有利于培育人的高尚的精神意境；西方文化走的是向外部世界寻求的路线，它蕴育出了科学与民主，有助于解决人们生存所需的物质财富等问题，从而酿造出了巨大的物质产品。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日益融合已向世人展现出了 21 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品格为基础，以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开拓与发展的“外王”品格为补充，从而建设一种新的“内圣外王”的文化。

第一章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

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便是宋明理学；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水平已超过自己的外来文化。不过，由于耶稣会士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们未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社会学说和文学艺术，所以当时中国士人从耶稣会士那里只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技知识和宗教思想。这些科技知识，特别是近代的世界观念，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清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道路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开始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了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这与古代学者思维方式的直观性、模糊性相比较，已大进了一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政治经济造成的桎梏，“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而至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便全然中断了。直到鸦片战争后，“西学”才重新进入中国。不过，这时已不像明末清初那样，中西之间进行平等的文化交往，而是在洋枪洋炮和鸦片烟的伴随

下，西方文化的强行侵入。

第一节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

一 欧洲传教士大批东来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主义者的东来，中西交通的路线几乎完全转移到海道；自欧洲人从大西洋海岸诸港绕好望角前来中国，中西交通也从过去的中国——中亚——西亚和北非各国和地区，几乎完全转移到欧洲国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也从前一时期的伊斯兰等文明的传入，转变为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流。

欧洲基督教各国的传教士，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当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发生在 15 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使中世纪统一的罗马教会产生了分裂。几乎半个欧洲都挣脱了罗马教廷的统治。正当此时，地理大发现为宗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罗马天主教士的目光立刻投向东方。大批传教士融入早期殖民者的队伍，到海外去开辟新的天地。其中，西班牙人罗耀拉组织的耶稣会是最活跃的传教团体。

最早沿好望角新航路前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他在 1541 年作为罗马教廷派往远东的使节，从里斯本启程，走海路到达印度。1549 年，沙勿略到日本传教，发现日本在文化上受中国影响很深，于是决定来中国传教，认为中国人信仰了基督教，日本人自然也会信仰基督教。1552 年，沙勿略来

到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因为当时明朝海禁很严，他一直未能找到机会进入广州，不久就病死在那个小岛上了。此后近 30 年，欧洲传教士始终无法进入广州。直到 1578 年，耶稣会派到远东的教务巡视员范礼安仍在澳门对着中国大陆发出无可奈何的悲叹：“呵，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①

在范礼安建议之下，耶稣会派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澳门。罗明坚先在澳门学习中文，然后随前往广州贸易的葡萄牙商人到了广州。1580 年，他获准在广东肇庆传教，成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第一人。

不过，真正为在中国传教事业打下基础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进入该会创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1578 年，利玛窦从里斯本乘船前往东方，首先抵达葡萄牙人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大本营——印度果阿。在果阿，利玛窦进入沙勿略创办的修道院攻读神学。1581 年，利玛窦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做准备工作。不久，利玛窦在那里兴建了一所欧式教堂。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教堂还展出了从欧洲带来的“西洋奇器”，如自鸣钟、三棱镜、天象仪器、圣母画像等等。大厅里悬挂着一幅利玛窦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格外引人注目。利玛窦绘制这幅世界地图，真是费尽苦心。地图用中文标出地名，以便中国人能看懂；为了适应中国人天朝居中的观念，特地将中国放在地图的中央。他把这幅地图送给当地的总督、知府等官员。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利玛窦到达中国以后，就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别号“西泰”。利玛窦口说汉语，并学着中国礼俗打躬作揖，欠身下拜，这些举止行为，大大便利了他的传教活动。他广泛结交当地官员和读书人，连端州（肇庆）知府王

^①周燮蕃《中国的基督教》第 53 页。

泮都为他的教堂题匾作诗。后来，他从肇庆前往韶州，结识了礼部尚书之子瞿太素。瞿太素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知识，如天文、数学等，后皈依了天主教。他还劝利玛窦改穿中国读书人穿的服装，以便使士大夫阶层容易接受。从此，利玛窦脱去袈裟，换上儒服，成了一名“西儒”。为了确保自己在华传教事业有一个牢固的根基，利玛窦不满足于在肇庆、韶州已有的成绩，而是想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他辗转南京、南昌等地，著书，传教，广交朋友，大大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在他结交的官员儒士、学者名流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明代大学者徐光启。1601年初，利玛窦到达北京，献上了他给万历皇帝的贡品，包括天主图像一幅、天主母像两幅、《天主经》一部、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两座、《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同时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个奏疏，自称是“大西洋陪臣”，因为景仰中国，所以才渡海而来，历时三载，行程 8 万余里，并表示愿意为明朝在天文历算方面效力。万历皇帝虽然没有接见利玛窦，但允许他在中国传教、留居。于是，利玛窦定居北京，直至去世。死后，万历皇帝特赐葬于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在华期间，著有《乾坤体义》、《经天该》、《天主实义》等著作，还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

明末时期，中国有三位官员同利玛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对天主教和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徐光启（1562—1633），上海徐家汇人。1600 年开始同利玛窦结识。两年后入天主教，教名保禄。崇祯年间，做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曾随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制造等西方科技知识，并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这部重要的自然科学著作的前六卷。他运用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努力保护天主教在华势力，同时致力推广西学。此外，他还是我国古代重要自然科

学著作《农政全书》的作者。

李之藻（1565—1630），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602年结识了利玛窦。曾与利玛窦合作，撰写了《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他对西方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方面都很有心得，还为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一书作了序言，并编了一部关于天主教的丛书《天学初函》。1625年，当《人奏景教流行中国碑》发现后，他写了《读景教碑书后》一文，这是最早叙述景教来中国传播的文章。

杨廷筠（1557—1627），浙江仁和人。1602年在北京结识利玛窦以后，受其影响，由信佛教而改奉天主教，曾撰写了不少宣扬天主教的著述。当利玛窦死后，明政府一些官员发动“南京教案”，打击天主教势力的时候，杨廷筠同徐光启等人一道，为天主教辩诬，并保护了一些传教士。

利玛窦 1581 年来华，次年在肇庆开始为第一个信徒施洗，至 1586 年，全国施洗者 40 人，1589 年有 80 人，1596 年超过百人，1603 年约有 500 人，1608 年增至 2000 人。到他去世时，全国天主教徒约有 2500 人。与他同时稍后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如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罗如望、阳玛诺、谢务禄、苏如汉、费奇观，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居静、熊三拔、龙华民、王丰肃，西班牙人庞迪我等，协助利玛窦在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北京以及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传教。肇庆在 1583 年建教堂。韶州在 1589 年建教堂。南昌在 1595 年建教堂。南京在 1599 年建教堂。北京在 1605 年建教堂。上海在 1608 年建教堂。杭州在 1611 年开教。在 1775 年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接获教皇命令正式解散前，各地传教的多数是耶稣会教士。中国的耶稣会是在葡萄牙政府支持下，由罗马教廷直接派往中国的最大传教团。^①

^①参见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第 60—61 页。

利玛窦来华，为中世纪后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写下了新的一页。在耶稣会教士中，他首先进入明朝京城，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并对当时中国社会上层及以后在传教事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传教。作为来华的第一位西学代表人物，他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知识。尽管他的主观意图在于传教，所输入的也不是近代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但客观上确实使当时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同时他又是向西方正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人。自他以后，中学的西渐及其对启蒙运动的影响，都是非常令人瞩目的事情。在这些方面，利玛窦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二 利玛窦以后的传教事业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继掌中国天主教教务。他对于利玛窦认为无关紧要的，如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都视为迷信，禁止教徒参加。社会人士因而产生反感，反教风潮随之而起。

1616年5月、8月和12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淮三次向明神宗上疏，要求禁止天主教，并下令关押教徒二三十人，南京教案发生。1617年，庞迪我、熊三拔、王丰肃等被押解至广东。1621年山东白莲教起义，沈淮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勾结魏忠贤，指责天主教为白莲教，再次指使南京官员逮捕教徒。传教士纷纷迁居杭州杨廷筠和上海徐光启家避祸。1623年沈淮被首辅叶向高所排斥，南京教案才告平息。

此后，非教风潮仍连绵不绝，如1625年艾儒略至福建传教，引起施邦曜、黄问道、陈候光、李维垣、黄贞等士大夫厌恶，故有非教论著《示禁传教》、《辟邪解》、《不忍不言》等相继问世，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风潮。但明末因满族崛起，边防危急，以及

历法失修，推验失误，需要借助西方传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教士复又召回。在徐光启的推动下，邓玉函、龙华民、阳玛诺、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来京供职，取得合法身份，有了传教的便利。崇祯初，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三人甚至可以出入宫禁，天主教也因此深入宫廷。1630年，御马太监庞天寿首先由龙华民领洗奉教，不久，由汤若望陆续领洗40人。宫中为汤若望特设圣堂一所，几年内受洗者竟有540名之多。^①

1613年，耶稣会为了扩大在华传教规模，派遣金尼阁回罗马，要求增派教士。金尼阁请求教廷批准中国自成一个省区。当时在华传教士不满20人，会所不过五处（北京、南京、肇庆、韶州、南昌），教徒不足一万，因此只算两个省区，和日本同属一个省区，虽获准用汉语举行弥撒和念经，但尚未实行。龙华民以后，罗如望、阳玛诺、傅泛际相继担任在华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后又分华北、华南两大教区，傅泛际任华北会长，管理北京、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教务，共有教士5人。其中山东济南开教，龙华民出力最多。陕西西安开教始自汤若望。山西绛州开教，始自高一志。河南开封开教，始自毕方济。艾儒略驻福州，任华南会长，管理南京、江西、湖广、四川、浙江、福建教务，共有教士15人。此外，南雄、上海、嘉定、常熟等地，都建有教会。至崇祯末年，除云南、贵州外，全国已有13个省传入天主教。

清兵入关后，南明政权于危急之中曾通过传教士赴澳门向葡萄牙政府借兵。在南明宫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十多年前就已领洗。在他劝导下，宫中设有小堂，供奉耶稣。一年后，即1648年，皇太后、皇后由德人瞿纱微领洗入教。永历嫡母王太

^①徐宗译《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后，教名烈纳；永历生母马太后，教名马利亚；皇后教名亚纳。永历帝因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新生的太子慈烺，也受洗入教，教名公斯当定。宫中先后受洗的妃嫔 50 人，宦官更多，大臣也有 40 人。

耶稣会在明朝宫廷中的传教活动所取得的成功，由于明王朝的灭亡而前功尽弃，但在民间的传播，特别是天启、崇祯年间的进展却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全国天主教徒的人数，到 1615 年已由 2500 人发展到 5000 人，1617 年南京教案后增至 1.3 万人，1638 年为 3.8 万人，1650 年为 15 万人，1664 年教徒有 16.44 万人。这些教徒分布在华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中央（福建、江南、浙江、江西）、华南（海南、两广）三教区。其间到中国省区传教的耶稣教士有 82 人。同一时期共印天主教书籍 131 种，算书 100 种，学术及伦理、物理书籍 55 种，教徒刊印的教义著作有 14 种。^①

除了耶稣会外，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中国。

三 清初天主教传教事业

清兵入关后，耶稣会教士毕方济、翟纱微等继续活动于南明宫廷，而北方教务，由汤若望等留居北京，随机应付，以免被清廷所禁绝。汤若望因而成为清初在华耶稣会教士中最负盛名的人。

汤若望，德国科隆人，1620 年随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来华，1622 年抵达广州，随即到北京学习汉语，后被派往西安传教。1629 年，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举荐龙华民、邓玉函参与其事。

^①周燮蕃《中国的基督教》第 69—70 页。

转年，邓玉函死于北京。经徐光启推荐，从开封、西安两地调罗雅谷、汤若望进京，参加《崇祯历书》的编辑工作。汤若望受命管理历局，制造天文仪器，推演算术，翻译西书。同时，他利用为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进行传教活动，领洗入教的有御马太监庞天寿等。1636年，汤若望奉旨督造火炮，两年中设厂铸炮20门。为了替各省的天主教徒谋取合法地位，他在1638年奏请明思宗赐题“钦褒天学”四字，并制匾分送各地天主教堂悬挂；1640年，因再铸火炮而立功；两年后，奉旨将造炮技术传授兵仗局，并译述《火攻挈要》。

清兵入驻京城后，下令城内居民三日内迁居城外。汤若望为保全历书书版、天文仪器、传教经典、历法书籍、供像礼器等，上疏摄政王多尔衮给予保护，获得特许。多尔衮下令保护其地，不准士兵滋扰。1644年6月，汤若望进呈预推8月朔口食分秒时刻及起复方位；7月，进呈所制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舆地全图等，并上书修订历法，进呈新编历书一册；8月，经观象台测验，汤若望的新法推算密合天行，从此受到新王明的信任，与龙华民一起奉命“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订历法。11月，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印信，历局并入钦天监。1645年，汤若望将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书》改订易名，以《西洋新法历书》进呈，顺治帝亲批“依西洋新法”，定名为《时宪历》，下令印造颁行天下。汤若望就任清朝钦天监监正，次年加太常寺少卿衔。汤若望是大清钦天监第一任外国监正。

汤若望身为耶稣会北京会长，随其政治地位的上升，北京的传教活动也逐步发展。1650年，顺治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原天主堂旁空地一块，重建新教堂。1652年新教堂落成，顺治御笔亲题“钦崇天道”匾额。1654年又赐阜成门外利玛窦墓两旁土地为日后教会墓地，汤若望在其地建造圣母堂一座。1657年，顺治又亲笔题写“通玄佳境”，赐为宣武门教堂堂额，并有御制天

主堂碑记，以示宠信。此后，汤若望先后获准邀请传教士约 20 人分批到各地公开传教。

康熙初年，发生了钦天监教案。徽州人杨光先撰文攻击天主教，并于 1644 年诬控汤若望谋反。汤若望和一批涉嫌的传教士被捕入狱，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汤若望本人也病故。杨光先则被任为钦天监监正。直到 1668 年，康熙帝命杨光先和传教士南怀仁分别测出正午的口影，结果，杨光先测得极不准确，而南怀仁则测得分毫不爽。于是康熙皇帝将杨光先免职，由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汤若望的冤案也获得昭雪。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熙帝对于传教士颇为信用，对西学，特别是对数学十分喜爱，对天主教也相当尊重。只是由于后来罗马教廷完全不顾中国国情，蛮横干涉中国人民的礼仪习俗，禁止中国的基督徒祭祖尊孔，挑起了所谓“礼仪之争”（当时的传教士遵守利玛窦的遗法，允许中国入教的教徒保存其原来的习惯仪式，祖先的崇拜与孔子的崇拜概不禁阻。但利玛窦传教之法，后来为教中别派的人所反对，上书罗马教皇，说前此传教之人，破坏了基督教的教义。1704 年，罗马教皇派铎罗至北京，发表教皇的教书，命不从教皇命令者退出中国。清圣祖大怒，逮捕铎罗，押送澳门，并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者，一概出境。此即“礼仪之争”），此后，康熙皇帝、雍正皇帝才改变态度，禁止天主教。^①至此，长达百年之久的清初天主教合法传教结束。

在汤若望等传教士备受重用的同时，天主教传教活动也有很大进展，在 1664 年至 1701 年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受洗教徒几乎增加了一倍。据 1701 年的统计，全国 13 个行省共有传教士 117 人，教士住屋 114 处，大小教堂 250 处，教徒达 30 万人。^②

^① 杨东莼《本朝文化史大纲》第 271 页，北新书局 1934 年。

^② 周燮蕃《中国的基督教》第 82 页。

这一时期，基督教的另一派系东正教中的俄罗斯正教，也从我国东北地区传入内地

四 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得以初步传播，出现了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沿用至今的阴历他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六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原书十五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

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四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着关外崛起的满族，对西方先进的火器自然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火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朗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3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要略》，这是专门传播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火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说》。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曾改造过一个英国贡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学、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

的《坤輿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曾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还要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十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輿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称《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上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也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现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插图。

传教士们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也带到了中国。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时期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

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制造工程机械，担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乾隆皇帝大为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就已颇有成就。他在 20 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就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后，很受清朝统治者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播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神，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 2.23 米，阔 4.26 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阿睦尔撒纳等 11 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与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从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

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用西式画法，建筑则用透视法，整幅画构成气魄恢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东学西传”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初，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在布道的同时，译介了大量有关天文、数学、物理、地理、哲学方面的西方书籍，可考的约 370 种左右，这是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中国。但两种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在传教士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把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而且西传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明末清初中国文化的西传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深入内地，到处传教，游历四方，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人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晚年所写关于中国的札记，详细地叙述了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过程以及中国的风土人情、伦理道德、政治法律、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情况。在这部著作里，利氏称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并称“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①。利氏的这部札记被传教士金尼阁带回欧洲，于 1615 年在德国出

①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

版。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仅是一鳞半爪，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氏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利氏的札记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广泛传播，影响甚大，“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 17 世纪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它开启一个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①著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才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17 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不仅限于一般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当代史作了专门研究，如卫匡国著有《中国历史》（第一部）（1658）；冯秉正著《中国通史》（1783）；宋君荣著《唐代史》；白晋著《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1697），即康熙皇帝的传记；李明著《中国现状新志》（1696）等。通过这些著作，欧洲人更加真实地了解了中国文化。

在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和介绍方面，来华传教士也作了很大努力。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是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字母拼音的汉语字汇书。它是以利玛窦等人编的汉字注音书为基础，并在中国学者王征、韩云等人帮助下完成的。金氏编著此书的目的是帮助西人学习汉语，同时也为汉语拼音化开辟了道路。此外，1687 年来华的白晋编有《中法小词典》，并以拉丁文和法文写成《中文研究法》。1728 年，马若瑟又在此基础上，写成《中文概说》，分析汉字的结构与性质。他被认为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字的先驱者。18 世纪，魏继晋又编成《汉德字典》。来华传教士对汉语以外的文字也很重视，如钱德明曾编《满汉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

^①利玛窦《中国札记》英译老序言

蒙、汉），孙璋编有《汉满法对照字典》。这些为西人以后研究我国语言——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里，许多主要的儒家经典，都有了西文译本。例如，殷铎泽和郭纳桑合译《大学》，改名《中国之智慧》；殷铎泽译《中庸》，题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刘应译《礼记》部分篇章；马若瑟、孙璋都曾译过《诗经》；钱德明译《乐经·经传》；雷孝思译《易经》；卫方济编译的《中华帝国经典》就包括了四书、《孝经》，可算是当时的中国经典较完备的译本了。除了翻译经书之外，传教士还有研究经书和孔子学说的专著出版，如刘应的《易经概说》，白晋的《易经要旨》，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马若瑟的《经传议论》，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无名氏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等等。^①

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传统自然科学也做了某些研究和介绍。例如，宋君荣曾对中国天文学史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天文学简史》（1732）、《中国天文学论文集》（1732）、《中国天文学史》（1738）。汤执中是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植物学家徐西欧的学生，他把大量的中国植物标本寄给徐西欧，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植物学。巴多明同法国金石美文学院、科学院，圣彼德堡科学院保持通讯联系，介绍了中国的医学，并把大黄、当归、阿胶等多种中药推荐到西方。

在文学方面，传教士马若瑟最早将《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在巴黎出版杜赫得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收集了这部译著，同时还收进了四回《今古奇观》和《诗经》中的十几首诗。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一代文豪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的译本，写出了《中国孤儿》剧本，1755年在巴黎上演。法文版《赵氏孤儿》出版后，五六年内就有了两个英文译本。英国剧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4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作家经过加工和再创作，编出了四五个改编的剧本，并于 1759 年在伦敦上演。英国名作家汤玛斯·帕西曾从葡萄牙译本转译了中国小说《好逑传》，并编写了一部《中国诗文杂著》于 1762 年出版。18 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赵氏孤儿》的德文译本，此外，德国人还把小说《好逑传》从英文转译成德文。近代德国的两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曾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席勒想改写《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多》；歌德在《赵氏孤儿》故事的影响下，创作了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

由此可见，在华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不仅内容广泛，而且十分认真。儒家经典对西方传教士来说颇为深奥，但他们肯下苦功夫，埋头翻译，确是难能可贵。不管对来华传教士整体上作何评价，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桥梁作用这一点上，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二、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

无论是中国艺术的西传，还是儒家学说的西传，都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前者酿成了一场风靡全欧的所谓“罗柯柯运动”；后者则为西方启蒙思想的崛起，送去了东方“理性”的醉母。

“罗柯柯”一词源自法文“rocaille”，意思是指一种假山石或贝壳的装饰品。它们的特征是轻盈淡雅，线条丰富，重天然浑成，不重人工雕琢。这与严格匀称的欧洲古典艺术风格不同，恰恰和中国艺术追求的超脱、纯朴、宽放、想象的风格相一致。罗柯柯运动发源于 17 世纪末收藏中国艺术品最多的法国，不久遍及德、英、意、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它从 18 世纪 20 年代开始兴盛，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风靡欧洲的罗柯柯运动是在中国

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它不仅反映了中西文化间的亲和力，而且直接表现了对中国瓷器、漆器、丝绸、绘画和建筑等艺术品和艺术风格的追求和效仿，可以说罗柯柯运动就是当时西方人的“崇洋”和“中国热”。

瓷器于 15 世纪一传入欧洲，就被视为珍品，不过当时只有宫廷才有能力收藏。但到了 18 世纪初年，瓷器已成为富人家中必需品，尤其当饮茶时，非此不足以称时髦。法国人喜欢中国的彩瓷，德国人偏爱中国的青瓷，一时风气所趋，欧洲社会上层无不收藏中国的瓷器。在各国王宫中，往往都辟有“中国室”，陈列中国的各种瓷器。中国瓷器热，反过来又推动了欧洲瓷业的发展。1540 年威尼斯人首先仿制出一种“梅狄基”瓷器，外观纹饰和中国的相似，但质地粗劣。后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改进，制作技术有了明显提高。

漆器虽然在 16 世纪就已经进入欧洲。但直到 17 世纪末，法国才开始仿造出真正的漆器。于是，漆器成为居家必备的物品。1763 年德国伯郎希城设立了漆器工厂，以生产中国式上漆的鼻烟壶著名于世。中国上漆的轿子 17 世纪也被引进欧洲。当时欧洲贵族因轿子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大加提倡，以致坐轿子这一中国传统风俗，在罗柯柯时期风行欧洲，而且轿子的颜色和坐轿子的等级规定也完全以中国为标准。1727 年，维也纳曾出现上流社会按等级坐轿子出巡的盛况。

丝绸虽然早已闻名欧洲，但到了罗柯柯时代，才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当时法国巴黎是丝织品流行的中心。法商采用中国花纹染色等技术，从事仿造，获利丰厚。后来德、意各国又仿造中国的丝绸。此外，中国的刺绣也成为欧洲室内装饰品。中国人 4 世纪发明的壁纸于 16、17 世纪由荷兰人、英国人传入欧洲，不久法英两国才有依照中国花样造出的所谓“中法合璧”、“中英合璧”的壁纸。在法国尤以富有中国趣味的“勒未隆”壁纸最为有

名。

中国绘画对于欧洲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例如，著名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不朽名画《蒙娜丽莎》，它的背景就是中国式的山水。到了罗柯柯时代，中国绘画的意境和技法，已经成为欧洲绘画极力追求的时尚了。例如法国风景画家瓦诺，不仅为法国国王的衣橱绘制中国画，他的名作《远航》专家们认为也酷似中国的宋代风景画。而高升的山水画应用了水彩画法，还能用中国毛笔和墨水打轮廓，这种技术后来对西方水彩画的发展产生影响，就连印象派先驱者也明显受到中国画的影响。

在罗柯柯运动中，中国戏剧或以中国为题材的戏剧也盛行一时。如 1692 年 12 月意大利剧团在布尔哥格旅馆上演五幕《中国人》；1713 年在泽曼街上演以《道士隐形术与中国宫廷》为题的闹剧；1723 年在同市上演三幕中国喜剧《道士、毛狮、狗、塔、医生》；1729 年又在同一剧场上演《中国女王》。此后，中国戏剧为欧洲尤其是法国一般社会所欢迎。其中，伏尔泰根据马若瑟所译元曲《赵氏孤儿》改写成的剧本《中国孤儿》，1755 年在巴黎上演，更是轰动一时。

罗柯柯运动的最后阶段是中国的园林运动。18 世纪初欧洲人开始接受中国建筑影响，在建筑中模仿中国，建佛塔和凉亭作为点缀。此时德国在华肯巴特河旁建筑的费尔尼兹宫，就是欧洲建筑模仿中国式大屋顶建筑的典型例子。1743 年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从北京写信给巴黎的友人，很具体地报告了被他称为“园中之园”的圆明园的自然和谐之美。这封信引起了欧洲园艺师们的极大兴趣，他们要求看到更加详细的素描。1744 年中国画家唐岱、沈源作圆明园四十景图共 80 幅。后来，王致诚将圆明园四十景图的副本寄回巴黎。到 18 世纪中叶，英国园艺师维廉·张伯尔首先提倡学习营建中国园林，他曾两度来到中国考察，称赞中国园艺师同时也是植物学家、画家和哲学家。他亲自参加

了改造英国园林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为英王妃奥古斯塔改造的速园，这是欧洲第一个中国式花园，当时轰动全欧洲，法国称它为“中英式园林”。园林里的假山、丛林、瀑布、宝塔，湖光山色，曲径通幽，一派中国风光此后，法、德、荷各国，竞相仿效。^①

罗柯柯运动，虽然还只是表现为风行一时的艺术风尚和生活风尚，但是，它是以追求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为中心而展开的，因而典型地表现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亲和力。罗柯柯运动的影响遍及欧洲社会各个方面，这种影响，甚至在今天还能够感受到。

与罗柯柯运动同时和稍后，中国的哲学思想经来华传教士介绍，流传欧洲并产生了巨大影响。17、18、19 世纪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时代。启蒙运动萌发于英国，成长于德国，18 世纪在法国开花结果。进入高潮此时西传的中国哲学思想，便成为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具体说来，西传的中国哲学思想在两个方面对欧洲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影响了欧洲哲学的发展方向。17、18 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在德国、法国有不同的特点，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对实践的指导。而中国哲学对二者都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德国，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联系的奠基人，是德国近代著名启蒙哲学家莱氏尼兹。莱氏同时是科学家，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数理逻辑的前驱者。他早在 1687 年前，就读过孔子、老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并和在华的传教士建立了联系。儒家学说对他的哲学观念，特别是对他著名的“单子论”有直接的影响。他和中国哲学家一样，相信世界有统一性，宗教的目的就在于养成对社会有益的德性。所以，他的单子论和儒家的德性论是相通的但更有意义的，也许是中国《周易》对他数学逻辑观念的影响

① 何芳川、方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莱氏相信，只要有很少数目就能从“无有”中推演出一切，去证明抽象的必然原理。他通过与在华传教士白晋讨论有关《周易》的著名通信，证实他于 1703 年正式提出的《论二进制计算》和宋儒《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莱氏这位“德国哲学之父”开创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对其再传弟子康德以及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和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而这些都和中国哲学思想的西传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法国可以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例。1752 年伏氏写成《自然法赋》一书。该书论述的理性道德，受中国宋明理学的影响随处可见。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人顺从理性，实践道德，这和宋儒的《大学论》不谋而合。伏氏说，理性就是德性，是人的天性，但常常被私欲迷误，只要人们在内心时时警惕，人的天性是不灭的。这和宋儒讲天理人欲之辨没有什么两样。他还说，无论人欲如何旺盛，内心深处的理性道德总是存在的。他用泉水作比喻：水因风起而浑浊，但风平浪静之后，就是恶人也可以在水中看到自己的面孔。这和宋儒用水波来比喻人性如出一辙。最后，伏氏也和宋儒一样，把自然法即理，不单看作是道德的原则，而且看作是宇宙万物的原理，认为社会政治改革而至清明，就是实践自然法即理，实现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中国哲学思想对伏氏这位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的影响是全深全巨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儒学改变了法国哲学的发展方向。^①

第二，为欧洲启蒙思想宣传理性提供了新的依据。遍及欧洲的启蒙运动，倡导理性和科学，把社会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崇尚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和理性法则的合法性，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启蒙运动的发动者宣扬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思想，提倡智慧与教育，与主宰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基督宗教神学处于对立的

^①郑师渠《中国传统文化漫谈》。

地位。而起源于本土的古希腊文化的悟性统治世界说和宗教家对神意的信仰一样，始终难以使“抽象”和“具体”、“理性”和“自然”趋于和谐一致。启蒙运动者惟有向非基督教世界的东方求助借鉴，吸取合乎理性法则的思想材料。于是，中国文化中不崇神灵的思辨哲学（“形而上学”）与伦理本位的道德哲学，便受到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欢迎。

启蒙运动的重要派别之一是法国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此派的其他成员孟德斯鸠、霍尔巴赫、伏尔泰、波维尔等人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著译和报道，对中国的历史、思想、法律、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从中国哲学思想中吸取了构建他们“理性主义”的养料。如狄德罗盛赞儒教，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①。霍尔巴赫把中国看成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最好的典范，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②中国儒家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都已成为“百科全书派”中激烈的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的有力的武器。

同样，中国的哲学也影响了启蒙运动另一个重要派别——“重农学派”。此派的创始人魁奈因在 1767 年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他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传统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他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在 1756 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魁奈关于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出于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启示。^③

① 转引自朱谦之《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

② 霍尔巴赫《社会体系》。

③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 45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中国灿烂的文化传入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有助于使欧洲学者进一步形成关于文化具有普遍性和相对性的观念，帮助他们修正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使他们开始认识到，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和唯一的文化，东西方各民族不仅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都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宽容的品格，优于基督教文化，他在《论各民族的习俗与精神》一书中，把中国文化放在全书的首位，排在基督教文化前面，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有了深刻的认识。

总之，明清之际，既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东学西传”的时代。中国文化西传对欧洲的巨大影响，连西方文化巨子伏尔泰都承认：中国文化的发现对欧洲来说，同达·伽马和麦哲伦在自然界的发现是同等重要的事件。

第二章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因

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运动中中止以后，自清雍正年间起至鸦片战争发生前为止，清王朝顽固地推行了闭关自守的国策，使中国与西方社会的接触中断了一百多年。而正是在这期间，西方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科学体系全面形成，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发达的生产力，资产阶级还建立了一整套符合自己需要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欧美诸国陆续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情况相反，清王朝仍沿袭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它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不具备通过自我更新、自我调节而产生现代化文化的否定性因素，在全民族的心理上又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排斥异质文化的进步影响，因此当时的中国在封建主义的老路上止步不前。

19世纪中叶，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形态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文化势差，前者腐朽、封闭，后者先进、开放。根据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规律，这时，先进文化向落后文化流动的客观态势已经形成。因此，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东方的侵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开始对长期与世隔绝的中国发起了冲击，中西文化的冲突以鸦片战争为始点正式拉开帷幕。下面我们从理论上、史实上分析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存在的落差，探讨说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因。

在物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势能”，它是指物质系统由于各

物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而具有的能量。这一概念也适用于文化学的范畴。在世界文化这个大系统内，各子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势能。这种势能来源于文化的隔离机制。不同民族土壤中萌生出的文化幼芽，只有在相对隔离的情况下，才能够沿着一条有利于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单一取向不断积累和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然而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都是相对的，绝对的封闭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每一个系统在它形成之后，都要与外界置换物质、信息和能量。这样，它不能长期停滞在封闭状态，系统内部的发展使它突破原来的范围，要求与外界进行一系列的置换。文化系统也是如此，虽然隔离机制可以使萌芽状态的文化避免因与其他文化的无限制交往而陷于流失状态，和因无休止的融合及重新组合而丧失独立的发展，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吸取营养，以促使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

中国文化系统形成后，经过先秦的发展，到汉代已臻成熟，汉唐之际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并达到顶峰，直到晚清之前，中国文化系统并不是明显封闭的。在鸦片战争以前，华夏农耕文化曾经与中亚和西亚的游牧文化，南亚大陆的佛教文化碰撞融会，特别在明末清初，随着西方耶稣会士的来华，西学传入中国，它使中国文化第一次遇到一种高势能异质文化的挑战，这正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前奏。

何以会出现中外文化交流上的西学东渐一幕呢？这是和西方文化在近代的崛起和中国文化在近代延续分不开的。

10 世纪以前的西欧封建文化远比东方落后，但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持续时间却远远短于东方。14 世纪在意大利的北部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等地，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需要革新生产工具、需要开拓市场、改进运输，需要新的自然科学知识，需要银行家、建筑师、画

家、音乐家……但是，“宗教裁判所”不能提供这些，非但不能提供，他们还在顽固地制造教会精神统治和愚昧，新资产阶级需要又是如此炽烈，一场冲突不可避免。

冲突的焦点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一股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潮流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这种新文化，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呼唤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进行思考，开拓人们的视野，激发人们的自信心。这些思潮汇合成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文艺复兴”。

佛罗伦萨诗人但丁的《神曲》揭开了世界文明史册上这辉煌的一页。《神曲》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无情地揭露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大胆谴责教皇、僧侣的专横贪婪。但丁的勇敢和智慧，激励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学家。文艺复兴的火炬先在意大利，接着在西欧各国传递开来，这是一个“制造巨人”的时代，它通过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产生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民主思想，通过自然主义哲学孕育了新的自然观和科学观。一大批新型学者在欧洲脱颖而出，意大利除了但丁，还出现了彼特拉克、薄伽丘、瓦拉、达·芬奇等思想家；荷兰有爱拉斯谟；法国有拉伯雷、蒙田；英国有莎士比亚、培根、霍布斯等，这些人在文艺复兴的旗帜下，把欧洲文化推向了空前的繁荣。

虽然文艺复兴的巨匠们大多不直接从事生产和经营，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科学创见成了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政权、解放生产力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和强大的精神支柱。西方文化至此到了一个辉煌的转折点，近代化的文化特征在欧洲各国思想家的奋斗中渐渐形成了，科学精神第一次作为文化的重要因素在西方文化的解剖面上占有了不可缺少的位置。

在波兰，哥白尼用 30 年的时间撰写了不朽巨著《天体运行记》，推翻了被基督教会奉为经典的“地球中心说”，创立了“太阳中心说”，使人类认识从神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近代自然科

学从这里开始起步。

在意大利，布鲁诺宣传、发展哥白尼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无限的，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他勇敢地把自己的观点指向教会。宗教法庭监禁他十年后，决定用火刑处死他。布鲁诺在火刑架下呐喊：“你们对我宣读判词比我听到判词还要感到畏惧。”布鲁诺成为后来欧洲文化中以科学和真理向宗教迷信宣战的典型。

在西班牙，塞万提斯用《堂吉珂德》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各方面彻底撕下了封建制度的假面具。

在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号召人们用真理和武器去摧毁红衣主教、教皇和罗马教会。

在英国诞生了影响了整个世界文化史的莎士比亚；孕育了弗·培根。培根猛烈抨击了用繁琐的方法论证上帝的经院哲学，他在《新工具》一书中，给后人留下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激励起无数人向自然界进军。

恩格斯说：“从 15 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文艺复兴时代，实际上是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形成的时代。

文艺复兴运动，以新兴资产阶级追求民主、自由，追求科学、真理的思潮，不断冲击着欧洲中世纪封建经济社会的保守、落后、愚昧、专制。但这大体上还处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①到了 15 和 16 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

^①参见张其昌等主编《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革命因素迅速发展。¹⁾

进一步促进西方近代文化向前发展的是地理大发现。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兴起，从 15 世纪起，地中海沿岸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对财富的渴求使得商人们为向外扩充贸易而绞尽脑汁。

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必要。第一，在西欧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的同时，封建制度的危机逐渐加深。封建经济不断受到商业和农民起义的打击，作为国家主宰的封建王朝，力图通过海外远征，进行殖民掠夺，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同时也在经济上增加财政收入。那些领地经济日趋衰败濒于破产的贵族领主，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也热衷于对外从事军事冒险活动。第二，东西方贸易危机的发生。中世纪以来，欧洲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交往已经日益频繁。在欧洲市场上，来自东方的商品逐渐增多。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北路从地中海北岸东行至君士坦丁堡，越过土耳其，沿黑海、里海，经伊朗、阿富汗横穿亚洲大陆到中国；中路从地中海东岸叙利亚一带，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再越过阿拉伯到印度；南路自地中海南岸，经埃及下红海，过印度洋到达印度。但是 14 世纪以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在近东地区，战火连年不断。1453 年，土耳其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控制了地中海的商业通道，并在海上大肆劫掠，东西方贸易的北路基本断绝；南路和中路又被阿拉伯紧紧握在手中，欧洲商人的利益没有保障。于是，有必要从欧洲西海岸曲折绕到东方，探寻一条海上商路。第三，对金银货币的强烈渴求。手工工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要求有更多的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另一方面，整个封建主阶级为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消耗，力图开辟财源。贵族领主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2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了购买精美的消费品也要求有更多的货币，“黄金渴望”在欧洲炙手可热。金银只能通过贸易顺差和开采金、银矿得到，但是对欧洲来说这里面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长期以来，欧洲与东方国家贸易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金银外流。而欧洲的主要矿区，特别是德国，金银产量逐年减少，储量也呈枯竭趋势。向海外探寻黄金的来源，在欧洲人看来，最理想的地方莫过于东方，他们一直相信东方是盛产金银的富庶繁华之邦，尤其是马可·波罗的著名游记问世后，有关东方国家财富无穷、金银遍地的说法更令大家向往不已。

大致有如下原因使得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首先是在文艺复兴的启迪下，人们越来越相信地球是圆的；其次是科学技术的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在 14 世纪前后，经由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传入欧洲。在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相继出现了航速快、载重量大的多帆轻便船只，观象仪、风向仪和改进的铁锚、绞盘和其他机械也出现了远洋航行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欧洲航海事业的先驱者。

葡萄牙在 15 世纪初期开始提倡航海事业，多次组织探险队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试图探寻新航路和掠取黄金。1487 年，迪亚士率领的远征队到达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为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路创造了重要条件。1497 年，达·伽马又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次年到达南亚西海岸，打通了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

西班牙人探寻新航路的活动稍晚一些。由于葡萄牙人已经把持了非洲西海岸南行的航路，西班牙的探险队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另外一个方向，即向西越过大西洋去进行新的寻求。在西班牙国王的大力支持下，1492 年哥伦布率领的远征队到达了古巴和海地，以后又三次出航，登上中南美洲的沿岸地区和岛屿。这片土地，被哥伦布误认为是印度，后经多次考查，订正为亚美利加。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探险家又继续向西开辟道路，海上航程

不断延伸。1519年，麦哲伦率领的船队从西班牙出发，越过大西洋，经南美海峡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

地理大发现对西方文明史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影响到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强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开拓了欧洲人心中的世界疆域，因而使商业的流通范围和贸易地区扩大，也使得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发生变化，产生了商业革命。到16世纪末，欧洲人对世界陆地面积占有比14世纪时增加了5倍，这就使欧洲与外界经济联系的空间大大扩展，商业获得了十分广阔的活动场所。同时，通过航海，欧洲人从别的国家拿来不少东西充实自己的市场，如烟草、咖啡、可可、茶叶、大米、蔗糖等等，东方的香料也大量涌入欧洲市场。马克思说，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商业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①

如果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加速了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那么16、17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的意义也远远超过宗教本身，它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斗争的第一次大决战，并为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下一个世纪，在欧洲最具影响的事件是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在这期间，先后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代表狄德罗等不朽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创造了比较系统、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勇猛地冲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关于理性、人权、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论述，以及以科学反对愚昧的思想，为未来社会设计出了蓝图。他们的天才思想都已跨越国界，超出时代，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旨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英国、美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出现，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也飞速发展起来。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后来西欧、北美各国工业革命相继出现。鉴于工业革命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有必要详细加以叙述。

地理大发现使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处大西洋交通要冲的英国，通过 1649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 1688 年的“中庸革命”，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殖民主义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和土地政策。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英国先后取得了对西班牙、荷兰、奥地利和法国的海上战争的胜利，占领了北美、非洲、澳洲和南亚大片殖民地。18 世纪前期，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英国拥有大量的资本和充足的劳动力，建立了欧洲最先进的手工工场，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技术革新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伟大的工业革命在英国肇始了。

1733 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织布的飞梭，把织布的效率提高了几倍，并在织布工业中迅速推广，棉纱供应为之紧张。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技术与工业奖励协会设奖鼓励纺纱技术的革新。1764 年，纺织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珍妮纺纱机”，提高工效 20 倍。1769 年，钟表匠阿克莱特设计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创办了第一家水力棉纱厂。1779 年，克伦普顿综合了珍妮机和水力纺纱机的特点，发明了“骡机”，纺出了精细结实的棉纱，一台纺纱机可转动 300 多个纱锭，工效大大提高。纺纱机的重大发展又反过来激励了织布机的改进。1785 年，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把织布效率提高了 40 倍。与此同时，棉花加工业、棉布印染业也都走向了机械化。

以纺织机械为代表的工具革命对英国的冶金煤炭等原材料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1735 年，德比尔文发明了用煤焦炭混合石灰炼铁的新方法。1760 年加装鼓风机设备，使这一方法广为推

广。1783年，工程师亨利·科特又陆续发明了搅拌炼铁技术和碾压铁片的方法，可以将生铁炼成熟铁，这些材料机械的发明使英国迅速上升到炼铁大国地位。

机器的逐渐改进和生产能力的增大，结构的日益复杂，也日益需求强大的动力。1782年，瓦特将过去仅用于矿山抽水的蒸汽机改进成复动式蒸汽机，获得了蒸汽旋转做功的功能，完成了人类利用动力的一个重大突破，从此，世界进入蒸汽时代，通常人们把蒸汽机的运用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

工业革命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国家奋起直追，纷纷吸收和模仿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欧美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①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显示了它与同时代封建主义文化相比所具有的先进性。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这一时代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和其变种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儒家思想强调道义和道德及伦理，忽视人的作用；宋明理学则把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伦理加以强化，[1]向根本漠视和否定人的个性和价值的极端演绎，公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它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形成了鲜明的反衬。宋明理学用儒教禁锢思想，用禁欲主义消灭人的需求，用君权摧残人权，从而大大加剧了中国封建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代的黑暗。特别是到了清代，文化专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异族统治和君权的双重压迫使封建文人们只能埋首于考据的故纸堆中这样封建专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减少了人们相互联系和交流的机会，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

经济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文化诞生于东亚大陆，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人只能以农耕为主，农业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可以看出水利在农耕社会的重要性，而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了个体在茫茫洪水面前的无能为力。人们为了生存需要统一意志，服从统一领导，集体意识得到了根深蒂固的加强，伴随着对水源治理和分配而产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的夏王朝，反映了抑制个性崇尚专制权威的一种心理特征。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封建社会漫长的历程中，有着与自然经济相一致的积极作用，它使各个分散的、孤立的小农在政治上连成一体，使汉民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能够有效地克服周边民族对汉民族的离心作用，使许多部族认同、归宗、融合于汉民族，由此使中国很早就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官僚政治体制，借助层层官僚机构而统治全社会，支配社会全体成员，创造了社会大一统的政治环境，这就避免了或减弱了不同地域之间纷争，减少了统治阶级内部战争的频繁发生，一定程度上也缓和和调整了小农经济和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利于组织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创办交通事业，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繁荣与发展的政治保证。但是，专制主义所创造的社会稳定，主要是依靠民众的主权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淡薄。它对民众的基本原则是防范，是加强民众的分散性和隔离性。专制主义产生于一盘散沙的社会，必然致力于维持社会的一盘散沙状态。中国新型的生产关系很难形成，或者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很难破土，民众的创造力

受到极大的限制。专制主义下，最代表各阶层政治要求的是好皇帝和清官，因而在民众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暴君和贪官时，从没把他们归结到政治制度上，只是用另一个君主换掉这一个君主，用另一批官僚换掉这一批官僚。专制主义条件下，权力对社会的支配作用，使“官”显得无比尊严和有力。又由于行政权力只受令于君主及上级官僚，不必对民众负责，权力本身发生变质不可避免。专制主义深深埋下了吏治腐败的种子，到每个封建王朝行将覆灭时，吏治腐败总是从内部起催化作用。到了清王朝，便更甚一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最好的说明。^①

中国的科学体系本身也并非无可挑剔。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偏重于实用，而不注重科学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不善于借助逻辑论证和实验的方法把科学引向深入，因而长期停留在经验的阶段。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大多以经学为主，重人文轻自然，重伦理轻科学，他们的思想学说往往和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都很少考虑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从事科学技术的匠人阶层，由于文化素质不够，也很难把具体的科学技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因而一旦发明了一种技术，在相隔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更大的可能仍就是重复，缺少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创新，这样的科学技术就会长期停留在经验的阶段而很难有更大的进展。

中国古代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科学技术的状况并不能全面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处于“低势能”状态的原因，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需和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政策及清代中外文化交流状况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在近代的海上商路开通之前，中国已经和外国进行缓慢的和平贸易了。汉唐盛世，一度比较频繁，“丝绸之路”是一个著名

^①参见张其昌等主编《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的例子。宋朝时，广州就是中外贸易的市场，允许外国船只停泊口岸。明永乐八年至宣德八年，郑和的航海船队七次驶往西、南亚一带，远到非洲海岸。然而，中外商人正在广州、澳门频繁互市时，世界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欧洲资本主义在地中海沿岸开始萌芽。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很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发现，抢掠殖民地又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于是它们纷纷走上了世界殖民主义的舞台，法国、美国、俄国亦步其后尘，亦步亦趋。15世纪到18世纪欧洲对其境外的国家的关系充满了海盗气味。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远航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南岸的占里，1510年占领印度的卧亚，1511年攻灭马刺加，设印度总督，开始了对东方各国的掠夺。1517年，葡萄牙总督派安得洛德率船队到广州，开炮威慑，退泊东莞后，安营扎寨，持枪自固，接着就打劫行旅，掠夺百姓。明政府决定驱逐这伙强盗。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命令士兵围攻。葡萄牙人又窜至闽、浙沿海，继续进行海盗活动。明政府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再次命令宁波驻军讨伐，毙敌500人。中国政府对外实行限制政策，直接原因就是针对这些海盗行径的。

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也一跃而成为16世纪的海上霸主。1571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他们借与中国政府合剿林风为首的海盗，与中国发生关系，并在福建海口通商。但不久就宣称：“有五千名西班牙人就可以征服中国。”明政府对此只得闭关设防，阻止了西班牙人的阴谋。

17世纪，荷兰、英国逐渐取得海上霸权。荷兰侵占了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岛屿，在那里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殖民统治，后来又將侵略矛头指向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首次来到广州，又强占澎湖列岛和台湾，骚扰厦门等地。他们筑堡据守，掠夺渔船，俘虏贩卖华人。明天启四年（1624年），中国

政府出兵反击，夺回澎湖列岛。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荷兰对中国的野心，终成泡影，但中国对西方人的戒心，与日俱增。

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王查理一世派威代尔率领舰队闯进广东珠江口，武装冲击虎门，夺取炮台，放火焚烧了中国官署，截取二艘商船。

清初，东南沿海郑成功领导的反清斗争还在活动。清政府为了断绝内地人民对他的资助与支持，下令焚尽沿海民房和船只，实行海禁，“片板不准下海”。这个海禁也不能说是完全针对内部的，因为从一开始英国就参与了郑成功的反清斗争。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鉴于国内秩序基本稳定，外国商人也稍能遵守规定，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口岸，但闭关政策没有废除，保留和增加了一些禁令。169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建立了商馆，英国人在通商的借口下，在广州、宁波一带，船中夹带武器，进行海盗活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取消漳州、宁波、云台山三个通商口岸，规定“洋船只准在广州停泊”。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制定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不准在广州过冬，不许中国人向外商借贷资本，不准外商雇佣中国人，派官员到外商船只停泊处检查。1831年，又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规定禁止外商驶入广州口内，不准外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不许外商偷运武器，不许外商私雇买办等等英国对清政府的防范，十分恼火，不断用武力挑衅和外交讹诈手段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也愈加不敢放松防范东印度公司曾派一个叫洪仁辉的人到中国挑拨，乾隆亲自处理此案，将此人囚禁澳门三年。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统治集团朦胧的意识里，外部世界一片危险。应该说这不是一个理性分析的结论。然而，事实上，这

个时期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充满了杀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独立的封建国家。这个特点是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基础和条件，而实行闭关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保持这个基础和条件。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离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① 这就是说，闭关政策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治需求，他们试图给“内忧”“外患”这两个曾危及历代统治的因素上套上保险绳，防止国内外势力结合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和他们进行统治的经济基础，这就是马克思说的：“推动这个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② 不过，统治者不会想到，他们以为可高枕无忧的隔离墙，竟是一根危险的钢丝绳。

马克思在评论清代闭关政策时说：“……只有到了这个时期，闭关政策才可以说是对西方国家海盗商人不法行为的合理答复，是一种自卫手段，具有民族自卫作用。”^③ 从上述明清政府禁而又开，开而又禁的情形来看，闭关虽不能说是中国所能采取的好的对外政策，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民族自卫的作用。这必须正视摆在中外关系面前的两个事实：一是中国确实处在落后的地位，二是中国所面对的是一群野蛮的“文明人”。一位美国人曾这样描述西方对中国的“开发”：“这些所谓和平商业的开拓者的所作所为，说不上像友好的文明人，而只能说是海盗行径。……这些人不断骚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地杀死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帆而去。或者，他们登上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1、1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陆，强迫中国人给他们筑堡垒，用最粗野的兽性掳走妇女，强夺当地人的所有财物，践踏了人道与文明的一切准则。”^① 出于对这些强盗商人的抵制和对和平贸易的保护，一个落后国家的闭关政策有马克思说的那种民族自卫的客观作用。事实上，由于对外商的限制与防范，17、18 世纪，清政府的对外贸易额一直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

然而，把闭关锁国作为立国的政策又是对历史发展的反动，是难以长久的民族自卫。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异常迅速，把整个世界拖进了一场崭新的竞争。列宁说：“凡是资本主义发展快的国家，都急于寻找殖民地。”^②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辟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③ 中国这样的国家，既然不能够参与和把握住新的竞争，那么，只有沦为这场竞争的牺牲品。闭关锁国虽然保持住中国不像有的落后国家那样，一下子就消失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血盆大口中，却使得中国陷入了落后——闭关——落后的恶性循环。中国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日甚一日。等到闭关政策再也无法阻止交杂着现代文明与野蛮残酷的西方人的冲击时，中国人痛苦地发现，闭关锁国最终只有下列作用，即清代初期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海禁和闭关，限制了中外正当贸易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成长；使中国形成了与世隔绝的局面，对世界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迅速发展茫然无知，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在清朝统治阶级当中，形成了一股虚骄保守、拒绝进步的顽固势

① 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②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35 页，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③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545 页，人民出版社 1963 年

力。^①

中国文化隐身于这样的统治阶级所操纵的社会里，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比，必然处于“低势能”的位置。

鸦片战争前夕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一种鲜明的现象是：一方是置身于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具有“高势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另一方是隐身于中国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的处于“低势能”位置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文化差异悬殊，注定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不可避免。

^①参见张其昌等主编《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第三章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

如“引言”所述，文化结构可分三个层面，这就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融会，也大体先是物质接触，进而制度借鉴，最后是精神交往。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入以及中国人对西学的接触，也经历了一个始言技、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但这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所做的大略划分，其实，西方不同层次文化的传入，有时是互相交错的。

一 实用科学的传入

近代西方实用科学的传入，可以分三个阶段来叙述。

第一阶段是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近代西方文化以雄厚的实力，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西方文化以野蛮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出了征服世界的通道，当它用最不公平极富侵略性和奴役性的条约的绳索将中华民族裹挟进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时，同时也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地置于一个崭新的参照系中。中国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而且在这场充满血与火的厮杀中败下阵来。自此以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面对现实，睁眼看世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福州）人。他父亲以教书为业，家境清寒。林则徐自幼勤奋好学，1811年中进士，曾在浙江、江苏、河南、湖北、广东、陕西、云南等地做官，担任过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领导禁烟、抗英的伟大斗争。在广州，林则徐同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他逐渐认识到，闭关锁国是“因噎废食”，不可能“固疆强国”，只有了解西方，知己知彼，才能有效地抵抗侵略和保卫海疆。为此，他一面派人到广州一带刺探敌人的消息，去澳门了解西方国家的动态，购买西方的书籍和报刊；一面组织人力进行翻译，汇编了《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林则徐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资料，并找机会向外国人直接了解情况，从而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他向澳门和新加坡购买西方制造的大炮200门，用来装备虎门各炮台，还购买了西方制造的战船，组织力量仿制西方各式新武器，以加强军事力量。当时，中国社会愚昧落后，清王朝上至皇帝、下至一般官吏，都以“天朝”自居，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他们不知落后，反把西方的先进技术说成“奇技淫巧”，顽固地排斥。在此情况下，林则徐主张学习西方技艺，可谓远见卓识。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出身于地主家庭。鸦片战争中，他当过裕谦的幕僚。鸦片战争中国失败，魏源痛心疾首。为了强国御侮，他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的军事工业，改进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加强国防

能力。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和实施方法。例如，西方的战舰、火器要学习，此外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千里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也都要积极地学习、引进和制造。魏源的想法，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企盼中国繁荣强大的强烈愿望，这是积极的、进步的。魏源的富国强兵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由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倡导，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果。从鸦片战争到 1861 年，一些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相继出版。这一时期军事科技的学习和研究，主要是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自觉进行的，他们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抵制资本主义入侵，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二个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朝统治阶级的某些有识之士改变夜郎自大的态度，他们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代表人物有奕訢、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他们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①于是，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这些人大张旗鼓地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

洋务运动前后 30 年，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是洋务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以“自强”为主，洋务派在购买外国枪炮的同时，还先后在安徽、江苏、福建、直隶、湖北、四川、甘肃等省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其中最著名的有：

^①李鸿章《李文忠全集·明僚函稿》卷一，1905 年金陵刻本。

李鸿章 1865 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南京雨花台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左宗棠 1866 年在福州马尾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三国通商大臣崇厚 1867 年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其后，各省督抚为强化各自管辖区内的武装力量，也纷纷自筹经费，自 1869 年至 1890 年先后在西安、福建、兰州、广东、山东、湖南、四川、吉林、浙江、云南、山西、台湾、湖北等地相继办起了“机器局”、“火药局”、“枪炮厂”，总数达 17 个之多，其中张之洞 1890 年在湖北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最大。这些企业大体上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的组织进行机器生产的，它的产品虽然不是商品，但是，工人出卖的劳动力却是商品，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这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混合的官办军事工业，是封建官办企业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化的中间形式，在大机器生产下的雇佣劳动已不同于旧日的官府工业，这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

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是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以“求富”为主。清政府开始经营和提倡采矿、运输、纺织、炼钢等事业。其民用企业主要有：1870 年创办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上海轮船招商局；1877 年设于滦州的开平矿务局；1878 年正式在台湾基隆投产的基隆煤矿；1880 年创办、1881 年 11 月竣工的天津电报总局；1887 年筹建的中国近代新法采掘的漠河金矿；1882 年创设于上海的第一个机器棉纱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 年至 1893 年建造的汉阳铁厂。此外，还有 1880 年开始修筑的第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全长 11 公里的运煤铁路，后来这条铁路延长到芦台，1888 年 4 月又延至塘沽，8 月筑至天津，此后这一铁路又延至山海关外，关内外铁路共 348 公里。1887 年至 1893 年，在台湾筑成了从基隆至新竹的铁路，全长 77 公里。至甲午战争，民用企业总数已达 40 个以上，铁路已拥有 425 公里。除了近代银行之外，其他各类近代企业大体上都已具备。

在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将军事工业的重心从陆上转到海上筹建新式海防。1875年经清政府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厘金400万两白银作经费，计划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三支海军。1884年三支海军初具规模，北洋海军有舰15艘，南洋海军有舰17艘，福建海军有舰11艘，分别由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和福州大臣统辖。1885年清政府又成立了海军衙门，管理一切与海防有关的事宜。1888年李鸿章把北洋海军扩建成为北洋舰队，并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支海军。

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陈请选派幼童去美留学。同年，容闳在上海设立留美学生预备学堂。1872年至1875年四批官费留美学生120余人先后踏上了大洋彼岸土地。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也派出12人赴英，28人赴法留学。到1896年前，我国在国外的留学生总计已达200名左右。留美学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船政驾驶与制造，这同洋务派向西方学习以兵备为主的方针有关。这些留学生所学自然科学的门类繁多，归国之前还要通过考核。留美学生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海军人才，他们成为我国近代海军建设的骨干。

这一时期，清政府还派出了首批外交使节和官员，分赴欧美主要国家，出洋游历考察，他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带回了有关中国以外的大千世界的信息。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黎庶昌等人，目睹西方列强的强盛，深感中国落后，主张迎头赶上，走改革的道路。

此时，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间接走向世界的方式，即翻译西方著作。这种方式同开办新式学堂一样，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借以认识世界的又一窗口。江南制造局、同文馆、福州船政局组织人力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其中江南制造局最为突出。它于1862年设翻译馆，聘请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

徐边寅任笔述，英人伟烈亚力和美人傅兰雅等口译，至 1880 年该馆已译书 98 部 235 本，其中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航运、医学、工艺、军事等内容，可谓蔚为大观。

实用科学传入的第三阶段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震动和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当时许多爱国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它采取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向日本学习。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大声疾呼要求设厂自救，提出了自办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的主张。据统计，1895 年至 1898 年，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商办厂矿企业有 50 余家，资本总额达 1200 万元，^① 比较著名的有：商人楼景晖创办的合义和丝厂，华侨商人张振勋创立的张裕酿酒厂，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纱厂，杨宗濂创办的业勤纱厂，夏粹芳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等。辛亥革命前七年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从 1901 年至 1911 年间，全国新设的厂矿有 340 家，资本达 1 亿多元，这十年新设的厂矿和增加的资本都超过了此前 20 年间的两倍以上。这时的企业，主要仍在轻工业方面，特别是纺织、食品等行业，卷烟、造纸、火柴、玻璃等轻工业也都有较显著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11 年至 1913 年注册设厂有 72 厂，平均每年 24 厂；1914 年至 1918 年 5 年间，注册设厂有 183 厂，平均每年近 37 厂。此期间兴办的工厂以纺织和面粉工业进展最大；重工业部门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如临榆柳江煤矿、江苏铜山贾汪煤矿等；同时，电力、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也发展了起来。

^① 见《中国近代史》第 268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二 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

洋务派可以说是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改革派。他们看到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满清王朝的落后，力图通过向西方学习军事、经济来挽救清王朝。他们睁眼看西方，也开始学西方，从这个角度看，他们是当时的有识之士。然而，他们不可能意识到满清王朝的落后与它本身的腐败，以及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思想对社会发展的羁绊。他们想在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靠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先进军事器械来挽救清王朝并把中国引向富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及一批仁人志士对洋务派的批评，导致了新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出现。

一些曾经热衷于洋务活动的人士，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对洋务派只重视西方“船坚炮利”和某些技艺，而不愿改革封建政体，以及贪污成风、中饱私囊等丑恶现象，进行了种种揭露和抨击。他们开始着眼于政治制度的变革，提出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改良主张，并最终形成一场全国规模的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运动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时期。从 1895 年到 1898 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建立了 103 个学会，64 家报馆，185 所学校。^① 1895 年成立的强学会是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又是一个译书机构。在维新派的倡导下，大同译书局、东亚译书局等一批译书机构相继出现。维新派创办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等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宣传西学的主要舆论阵地。在这场大规模的西方社会

^①见张其昌等主编《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第 129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政治学说的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最主要代表。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然而，清朝的腐败，祖国的危亡，使年轻的康有为感到失望和不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怀疑儒家那一套治国安邦的道统，同时对清政府所宣扬的文治武功投以蔑视。他感到社会正处在危亡之中，中国需要进行一次改革。1879年他到香港、上海游览参观，直接接触到资本主义事物，耳闻目睹，他感到新鲜。以后他又陆续研读了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逐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封建制度先进。他接受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留心西学，主张学习西方，抵抗侵略，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强国。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次年，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发动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 1300 多人，联名上书，反对卖国条约，史称“公车上书”。他们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公车上书后，维新派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十天集会一次，讲演“自强之学”；随后，又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设学堂，编译著作，掀起了一次很有声势的宣传运动，为变法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做好准备。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局势，要求皇帝主持大计，实行变法。不久，康有为又于1898年1月第六次上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纲领——《应诏统筹全局折》，他强调变法的三条措施：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并把自己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人彼得变政记》呈交上去，指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在6月11日到9月21日的103天里，维新派

通过光绪帝下达了大批推行新政的诏书，诏书内容总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

政治方面，重订一些法律制度，裁减和淘汰中央和地方无用的衙门及官员，鼓励创办报纸，组织学会，有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中国银行、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并允许成立农会和商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鼓励商办各种工厂企业，编制国家预算，公布岁收岁入。

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训练新式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在各地开办各种专门学堂和中、小学堂，在北京筹办京师大学堂，设立编译局，翻译书籍和刊物，派人到外国留学，办理邮政，奖励发明。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改革现状，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向西方学习，走上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道路。从这些措施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把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和制订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定为变法的核心和关键；他们肯定了自由、民主、平等等资产阶级观念，并以此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也是一次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运动。

梁启超（1873—1929），是“戊戌变法”的第二号人物。早在变法前，他就追随康有为做变法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1895年赴北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活动，主办《中外纪闻》。8月，任强学会书记员。1896年8月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所作《变法通议》等著名政论，在国内政界、文化界发生很大影响。1897年11月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与谭嗣同一起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湘学新报》，宣传变法，鼓吹“民权”学说。

他的文笔生动流畅，通俗形象，热情奔放，极富感染力和鼓动力。变法失败后，长期寓居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东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原著，所谓“畴昔所未见之借，纷触于口，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所得之益极多极多”，致使“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①这时他的思想越来越倾向激进的民主主义。他所创办的《清议报》，公然申明，“伸民权”乃为该报“独一无二之宗旨”。在该报上，他尽量把东、西诸哲的启蒙学说“输入中国”。1902年，他又创办《新民丛报》，该报内容更加进步，他曾赞关卢梭说：“民约论者，法国大革命之动力也；法国大革命者，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总之，梁启超在维新变法中及变法后在宣传、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严复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宣传西方政治学说的又一位旗手。严复（1853—1921）福建侯官人，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五年，曾至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各地，初步开阔眼界。1877年赴英国留学，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20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文，斥历代帝王为“大盗窃国者”，反对顽固保守，主张向西方学习，提倡新学，实行改良，认为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是使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其具体方案为：禁止鸦片与缠足而崇尚武士精神，废除八股而提倡西学，废除专制政治而实行

^①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君主立宪。同时，他通过翻译工作向中国社会直接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其中最著名者为他译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对当时思想界影响极大。曾协办北京通艺学堂，主办天津《国闻报》。“百日维新”期间，受光绪帝召见，被询问办理海军及办学堂事甚详。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异常悲愤，不甘屈服，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从 1899 年到 1903 年，他接连译书《穆勒名学》、《原富》、《法意》、《社会通论》、《群学肄言》等五部西方名著，占其全部译书的一半。同梁启超一样，这时期也是严复一生中最活跃、影响最大的黄金时期。由于严复在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方面的巨大功绩，所以被时人尊为“西学之第一人”，被后人推为近代启蒙思想家。

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维新派集会结社，上书言事，打破了朝廷的禁令，改变了社会风气。他们废科举，办学堂，设报馆，译西书，大力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打破了几千年所形成的闭塞心理和狭隘守旧的传统思维，否定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神圣地位，因而从根本上转变了以往向西方学习的自发状态和被动局面。

辛亥革命前后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传入的第二个时期。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救亡图存，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愿望的破产。从此，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过程中，涌现出孙中山、章炳麟、邹容等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家。

孙中山(1866~1925) 名文，号逸仙。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3 岁到檀香山，在其兄华侨资本家孙眉资助下，先后入英、美在当地办的教会学校读书。1883 年回国，相继就读于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校。1892 年毕业于香港西

医书院，并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中日甲午战争前，孙中山虽然已经有了革命要求，但他还没有摆脱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1894年春，曾草拟《上李鸿章书》，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主张，希望政府进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改革。孙中山到天津投书李鸿章，被拒之门外，他又跑到北京探听清政府的虚实。当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在牙山战役中失败，昏庸的清王朝却在大修颐和园，准备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严酷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孙中山，从此他摒弃了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1894年秋，孙中山又来到檀香山。11月，他联合华侨中20多个经营小商店、小农场的反清人士，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会员人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1905年，在孙中山的推动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章程》，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建立了领导机构，同时决定创办《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刊物。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参与了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后来，他吸取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转变了政治立场，倡言革命排满，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猛烈抨击了康有为宣扬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论调，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这篇论文对于批判改良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启发人们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邹容(1885—1905)字威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自费留学

日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名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成为一名勇敢的革命战士。1903年他参加了爱国学社组织的活动，并积极投入到拒俄运动中去。他的光辉政治论著《革命军》，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文章深刻地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热情歌颂了反清革命，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统治，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把《革命军》一书作为主要的革命宣传品，大量印刷散发，对于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梁维新派在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巨大差异，就是他们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对封建专制公开鞭挞，彻底否定，在政治取向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建立欧美式的共和政体。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绝大多数都曾留学海外，身受欧风美雨的熏陶，回国后，他们便把那充满活力的新的社会政治学说，输入中国这个古老的机体。因此，与维新运动相比，辛亥革命时期的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是更加直接的“西学东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传播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胡适、刘半农、吴虞等人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服务的封建旧理论、旧道德。科学主要指提倡科学的思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反对迷信，反对崇拜偶像，宣传进化论和无神论。很多留欧、留美学生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积极组织学会，创办刊物，传播西方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政治理论学说。“五四”运动以后，伴随

着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启蒙性的文化运动表现出向更深层次发展的趋向，各种学会和刊物、学说和思潮纷纷出现。包括“五四”运动前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在内，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增加到 400 多种，各种社团大约有 300—400 个。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哲学流派，统统被作为新文化和新思潮介绍到中国，并且引发了激烈的论战。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师杜威、罗素来华讲学，更为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传播架设了桥梁。一批有志青年远涉重洋，以勤工俭学为手段亲赴欧洲寻求真理，为下一时期改变中国面貌准备好新的思想武器。^①

三 各种学术思想的传播

西学即西方近代文化，它既是多元的统一体，又有许多层次。列宁曾经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人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近代文化，只是就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言。其实，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的无产阶级就有了自己完整的文化形态。所谓西方文化，主要就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文化构成的。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先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随后是无产阶级文化，相继传入中国。确切地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

^①参见张其昌等主编《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第 130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之上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构成的资产阶级文化。

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传入中国的同时，各种科学学说也传入中国。

19世纪6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学、物理、化学等知识大量传入。公私机关和各学术团体、书局，如同文馆、广学会、上海排印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益知书会、墨海书院、湖南新书局、时务报社、上海译书局、东亚书局，格致书室、湘学报社、天津机器局、天津学堂、农学报社、求是报社、华美书馆、汇文书院等等，出版大量西学书籍，载于《东西学书录》的，有1000多种。傅兰雅、徐寿、徐建寅编译有《格致须知》、《代数学》、《化学原》、《化学分原》、《化学考质》等。林乐知译有《格致启蒙》。谢家荣编译有《算学三种》。藤田译有《物理学》。潘慎文、谢洪赉译有《八线备旨》。李天相译《化学新编》。王术烈译有《物理学》三编、《植物学》。黄英译有《动物学》、《生理学》等。以上所列为较著名者。

历史学也大量传入。1895年，李提摩太、蔡尔康、周庆云等编译有《泰西新史揽要》八册。1902年，秦瑞玠编有《西洋历史》。1903年，樊炳清译有《东洋史要》、《西洋史要》，胡景伊译有《欧罗巴通史》。1904年，邵希雍译有《万国史纲》。1906年，作新社编有《万国历史》，陈寿彭译有《万国史略》，张枏译有《日本历史》。1909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有《世界文明史》、《泰西民族文明史》《世界近世史》等。这时期译的各国专史有《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英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之史》、《瑞士建国志》等。这些著作不但丰富了中国人的知识，而且增长了中国人的斗志，特别是《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战记》、《彼得兴俄记》、《波兰衰亡史》等书，起到了政治著作的作用。

西方伦理学也传入中国。1903年，樊炳清译有日本上哲次郎的《伦理教科书》数种，广智书局译有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中学教育伦理学》，大学堂译书局译有《东西洋伦理学史》，樊炳清译有《伦理教科书总说》。1907年，戴裕著有《伦理学讲义》、《女子伦理教科书》。1909年，四川速成师范编有《伦理学》。伦理学的传入，对中国几千年的纲常名教是一个大冲击。争女权、男女平等成为新的社会改革的潮流。女子不缠足、男子死后女可再嫁、夫妇不相合可离婚、男子不娶妾等观念在社会上渐有影响。

20世纪最初几年，西洋教育学输入中国。1903年，大学堂译书局译有《培氏实践教育教学》五册、《欧洲教育史要》三册、《格氏特殊教育学》、《独逸教授法》。1909年，四川速成师范编有《教育史》，孙清如著有《教育史》，商务印书馆编译有《教育学》，中国图书公司编《教育学》、《心理学》、《幼儿保育法》，文明书局编有《小学校训练法》、《各种教授法》等。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制订了教育革新计划。资产阶级对教育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革命党人的热心倡导下，各省和各种专门性质的教育会纷纷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陶行知、张謇等人，都为教育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外国教育家杜威、蒙台梭利、海尔巴脱、纳法尔等人的教育学说也介绍到中国，教育理论开始研究。

此时，逻辑学及语言学也传入我国。1903年，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根据拉丁语法，设计出汉语语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语法书。同年，艾约瑟译有英国哲芬斯所著的《辨学启蒙》；严复译有英国穆勒著的《名学》，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逻辑学著作。1906年，章士钊著《中等国文典》，这是比《马氏文通》更加实用的语法书。1909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有《汉文典》、《英文典》《英文教程》。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译《初学英文规

范》、《简要英文法教科书》、《英语作文教科书》等。逻辑学与语言学的传入，对同时开始的白话文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法学也在这时传入中国。法学名著如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约翰·弥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干涉论》、《社会学原理》等已于本世纪最初几年由严复、杨廷栋、赵兰生等介绍到中国来。1909年，四川速成师范编译有《行政法大意》、《法学通论》等法学著作。

同时，大量的文学作品传入中国。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翻译小说近400种，实际上要超过此数。在翻译小说方面最著名的人是林纾。据统计，他翻译的小说共171部，主要有英国99部，美国20部，法国33部。他所介绍的著名作家，在英有莎士比亚、狄更斯和司各特等，在美有欧文、斯托夫人，在法有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在挪威有易卜生，在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在俄国有托尔斯泰。他所翻译的作品影响最大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及《黑奴吁天录》。除林纾外，翻译名家还有吴棫、陈冷血、包笑天等。吴棫译有《薄命花》、《塞桃记》、《车中毒针》、《银纽扣》、《黑衣教士》等。陈冷血译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土里罪人》、《大侠记》等。包笑天译有《铁世界》、《秘密使者》、《一捻红》、《侠奴血》等。外国小说的传入，不但“有关世道人心”，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创作，当时的小说家，从取材到描写，取法于外国小说的地方不少。

科学研究之风也由西方刮入中国。1914年6月，留美学生组织科学社，次年由任鸿隽、赵元任、杨铨等人发起刊行《科学》杂志，向国人灌输科学知识，“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并广译各国科学书籍，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组织科学演讲团，以促进国内实用科学的发展。1916年留日学生陈启修等组织丙辰学社，印行《学艺》杂志，讲求科学真理，促进科学交流。此后，讲求科学的风气在留学生中逐步推广，国人也逐渐认

识和重视科学的价值，科学研究风气初开。这时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科学家有：化学家侯德榜，地质学家丁文江和翁文灏，水利工程专家李仪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他们的科研成果，推动了中国的科学研究走向成熟和科学事业的发展。^①

四 基督教新教入华

基督教新教的来华，远较天主教和东正教为晚。17世纪初，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荷兰传教士也接踵而至，在台湾传教20余年，曾发展教徒千人左右。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将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境，新教在台湾的传教活动即随之终止。19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新教兴起大规模传教活动。新教各宗派相继成立向国外布道的组织，致力于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地区的传教活动。

1807年，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来中国，是为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是英国诺森伯兰人，1804年加入伦敦布道会，1807年被立为牧师，同年9月到达广州。来中国之前，他曾向一个名叫容三德的中国人学习中文，并在不列颠博物馆借出一本《圣经》的天主教中译本，亲手抄录30页。容三德替他抄录到《希伯来书》为止。他把这个抄本带到中国，作为翻译《圣经》的依据。1809年，他任广州东印度公司商馆中文翻译兼秘书，此后25年一直以这一身份为掩护，一边从事商务，一边传教著书。他的传教活动始于编著宣教小册子，曾著有《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注耶稣教法》、《古时如氏亚国（即犹太国）历代略传》、《养心神诗》等。因为广州清朝官

^①参见张其昌等主编《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第131—1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

吏严禁传教印书，又受到天主教势力的排挤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反对，马礼逊只得将印刷工作放到马六甲。他从 1810 年开始翻译《圣经新约》，并刻版刊印他修订的《使徒行传》中译本。1813 年，伦敦布道会派遣牧师米怜来华与马礼逊一起活动。他在马六甲创办印刷局，刊印马礼逊译成的《新约》及其他译著。1815 年，他们在马六甲建立英华书院（后迁至香港），培养传教人员和刊印传教印刷品。同时，在米怜的协助下，马礼逊开始翻译《圣经·旧约》，当时取名为《神天圣书》。全书于 1819 年译完，1823 年刊行，史称第一部基督教新教《圣经》中译本。马礼逊在译书过程中编著《华英字典》，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刊印，此为第一部汉英词典。马礼逊死于 1834 年，前后在中国传教 27 年，著有《新约历史总纲》、《赞关诗》、《圣教问答》、《天国之道》、《公用祷文》等 19 种大小作品，这方面他堪与明代的利玛窦相媲美。

由马礼逊于 1823 年按立的新教宣教士梁发（一名梁业发），一般被称为第一个新教华人牧师。梁发幼年读过村塾，15 岁进省城做雕版工人，1810 年起，不顾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及其雇员秘密印发书籍传教的禁令，私自为马礼逊刻印《圣经》中译本。1824 年，他继承马礼逊在广州的传教工作，经常利用生员在省城考试的机会，散发《圣经口课》和他自编的布道小册子。在宗教信仰上，他夹杂有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的影响。他著有多种通俗布道书，其中最重要的是 1832 年由马礼逊校印的《劝世良言》。该书包括九种小册子，并不是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系统宣讲，只是在六十几个互不连贯的小节中摘引《圣经》的某些经文，针对中国的习俗和时弊，附会儒家经典和历史典故，通俗地阐发基督教教义。书中反复宣传的是崇拜“神天上帝”、相信耶稣赎罪、反对偶像邪神以及天堂地狱、赏善罚恶等说教，它只是一本浅薄的布道书。但就是这本书，后来却对洪秀全发生了

重要的影响。

在马礼逊和米怜以后，伦敦布道会又派遣理雅谷来华，至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该院迁往香港，改称神学院，理雅谷继续在香港任神学院院长，致力于建立教会和培养传教人员，山屈昂帮助他办理印刷事务。此后伦敦布道会又陆续派遣杨格非（即杨笃信）、韦廉臣、麦都思、米利民（米怜之子）、艾约瑟等至上海、宁波、武汉、重庆、烟台、北京等地，传教活动由南而北向全国渗透。1830年，美国新教传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美国公理会教士裨治文于1830年至广州，后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资料。另一名教士伯驾于1834年至广州，与裨治文合作在1838年开设博济医院。卫三畏也是公理会教士，1833年来广州参加编辑《澳门月报》，后著有《中国总论》、《中国商务指南》等书。浸礼宗传教士罗孝全、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等人也相继来华。属于荷兰传教会的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士立，也在此时作为自立传教士来华，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1834年与裨治文共同组织益智会，1844年在香港设立汉会（又名福汉会，意为汉人信道得福），专门训练中国传教人员到内地布道。但到1890年，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在华传教士总共只有20人，代表4个差会，30余年中所收信徒也不满百人。这一时期，英美等国的新教传教士来华的主要活动是：广泛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情报；著书、译经、办报、兴学，为大规模传教活动做准备；鼓吹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和迫使清政府放弃禁令，以实现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目的。这在客观上起了配合殖民主义侵略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许多传教士是不平等条约的起草和策划者，他们认为“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借着殖民主义的武装侵略，他们将传

教活动作为特权列入条约。条约订立后，来华传教士人数急剧上升，英、美、德、加拿大等国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并以条约为护身符进入内地活动。据统计，1858年新教传教士仅有81人，至1889年增加到1296人，其中英国传教士约占3/5，美国传教士约占2/5，代表41个差会。新教各主要宗派相继传入，传教者足迹遍及全国。公理宗系统的伦敦布道会传入最早，它在巩固香港、澳门、广州的传教基地后，又在浙江、江苏、福建、湖北、直隶开辟了教区，在陕西、湖南、四川建立了传教据点。美国公理会（也称美华会或美部会）在上海、福建、台湾、山西、直隶、山东建立教区或传教点，还深入张家口、内蒙古活动。路德宗（信义宗）系统则从港澳扩展至内地，其传教区域分为豫鄂、湘中、湘西、豫东、豫中、粤南、陕西、东北等处，分属美国、德国、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等国差会。安立甘宗（圣公宗）系统把其在中国传教的地区分为11个辖区：浙江、福建、港粤、华北、山东、四川、桂湘属于英国圣公会；江苏、鄂湘、皖赣属于美国圣公会；河南属于加拿大圣公会。浸礼宗系统在中国分为英浸礼会、美浸信会（传自美国南浸会）、美浸礼会（传自美国北浸会）、瑞典浸信会等，其传教区域分为华南（两广）、华东（江苏、浙江）、华北（山东一部分、山西、陕西、东北）、华西（四川）、华中（河南、安徽）五区，教徒人数以山东、广东两省为最多。归正宗（长老宗）的传教区域与公理宗、路德宗大致相仿，绝大多数教徒分布在沿海地区。卫斯理宗（循道宗）先后有8个差会传入中国，最早的是美以美会，建立福建、江西、北京和四川的传教年会。监理公会以上海为据点，扩展到东北和云南。圣道公会在天津立足，除传播于直隶、山东、浙江、两广外，还深入到湖南、湖北、云南、贵州一带。内地会专门从事内地的传教活动。不过，迄19世纪末，新教教徒

人数仅 8 万人，远不能与天主教相比。^①

此时，天主教势力在各地大为发展，据统计，1900 年，全国已有代牧区 37 个（其中属法国传教机构的有 20 个），教徒 74 万，教士 1356 人，其中外国教士 886 人。同时，东正教也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至 1916 年，东北及内地东正教徒有 5587 人（其中北京约 1000 人，天津 200 余人），另外，蒙古及西北边疆地区注册登记的中國东正教徒有 37020 人。^②

义和团运动被某些教会史著作称为“庚子教难”。外国侵略势力及基督教教会，在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受到严重打击。义和团运动虽被镇压，但侵略者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所震慑。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布道会演说时，要求传教士今后去中国，“总以谨慎为主”。英国驻印度总督也劝诫英美教会应“慎选教士”，传教士要“自爱以防后患”。自 1900 年以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主要表现为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的巨额赔款，兴办医院、学校和其他文化慈善机构，以推动传教工作。

教会所办的医院，在 1900 年以前仅百余处，而且大多为教堂附设的诊疗所。到 1920 年，新教教会医院增至 246 所，诊疗所 380 处。天主教教会医院及养老院也有 200 多处。教会学校，特别是大学，有较大发展。1900 年以前，教会学校有 1100 余所，90% 为小学，10% 为中学，没有大学，只是一些中学里设大学班。1900 年建立的苏州东吴大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大学。此后 20 年，新教建有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湘雅医专、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沪江大

① 参见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第 104—106 页。

② 参见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第 108—109 页。

学、广州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和济南齐鲁大学，天主教也建有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到 1920 年，仅新的各类教育机构就有 7382 所，其中有大学 14 所；在校学生共 21 万多人，其中大学生 2000 多人。在文化慈善事业的掩护下，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很快恢复原有的基础，并且开始了持续 20 多年的全面发展时期。1900 年以前，新教教徒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而 1920 年时，已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地。据当时出版的《基督教占领中国》一书统计，在全国所有 5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只有 18 个还没有见到传教士的足迹。分属 130 个差会的 6204 名外国传教士，在各地建立 1037 处传教基地，教堂和礼拜场所超过万座。中国籍牧师从 1906 年的 345 人增至 1305 人，超过了外籍牧师的人数。在教会任职的中国人，也从 1906 年的 9661 人增至 28396 人，为当时外籍传教士人数的 4 倍多。全国新教教徒剧增，由 1900 年的 8 万人增至 1920 年的 36 万人。天主教的发展更为迅速。1900 年，全国天主教徒已有 74 万，至 1920 年猛增到 200 万。^①

1920 年以后到 1949 年，是基督教徒传教事业的更大规模发展阶段。

^①参见周燮番《中国的基督教》第 141—143 页。

第二节 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途径

一 留学生对西学的传播

“留学生”一词是由日本人创造的。远在 1300 年前，日本政府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来。由于遣唐使是外交使节，在中国停留时间不能过长，所以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唐使时，同时派来了“留学生”和“还学生”。“还学生”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留学生”是遣唐使回国后仍留在中国学习的学生。中国正规派遣留学生的时间则比较晚，但在传播西方文化上的贡献却是非常之大的。

1. 容闳及赴美幼童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者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容闳。容闳字达甫，号纯甫，清道光八年（1828）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镇。7岁时，他随父亲迁到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办的教会小学读书。由于经费困难，该校不久停办，容闳只好回到家乡，一边自学一边劳动。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进入马礼逊学校读书，该校是在澳门教会小学基础上开办的，主持校务的是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美国传教士布朗。1846年冬，布朗准备回美国，并想在走时带几名学生一同返美。当时仅有容闳、黄胜、黄宽等三名学生愿意前往。他们的赴美经费，由香港中国日报的主笔、美国商人梦奇，苏格兰人康培尔等人赞助，以两年为期，同时还补助他们的父母赡养费，以安定孩童们的向学之心。1847年4月12日，经过98天漫长的

海上行程，他们到达美国纽约。容闳等三人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当时美国还没有高中，仅设有预备学校作为升人大学的准备。容闳入校后被编入英文班，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虽然有一定的资助资金，但远不够用，容闳除上学外，还要靠做小工、帮人洗衣拉煤来赚点钱维持生活，既艰苦又紧张。1848年秋，一同赴美的黄胜因病回国，只剩下容闳和黄宽二人。黄宽得到香港几位英国商人的资助，去了英国。他赴英国后专攻医学，7年后即1856年以第三名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是我国留欧学医的第一人，后来回国行医，名声很大。留在美国的容闳，直到1850年在得到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后才得以进入耶鲁大学。刚入学时，由于听讲困难，他每天都要学习到深夜，休息很少，由于缺乏体育活动，身体非常瘦弱。进入二年级时，功课也不好，微积分每次都考不及格，幸亏他的英文较好，几次获头奖，这样才把平均成绩拉起来。据曾与他同过学的白博士回忆说，容闳刚进校时“异服异俗，颇受人笑”，^①但后来两次得班中英文一等奖，于是无人敢笑了。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积极在校谋求职业，他替自办伙食的学生管理饮食；为学生中的兄弟会管理图书。靠课余干这些杂活得到的酬金，容闳才得以完成了学业。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班共毕业98人。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中国人。

接受了西方良好教育的容闳，对破败的中国社会深感忧虑，一心想改变中国这种腐败落后的面貌。在他看来，如果多数中国人能像他那样到美国接受教育，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回国后对中国进行改造，就会将中国变成美国式的发达国家，也就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入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

^①见吴宽《中国人留学史话》第9页。

富强之境”。^①怀着这种“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于 1854 年 11 月 13 日乘船从纽约回国。

归国后，为了实现他的计划，容闳四处奔走，以图取得清廷官吏的支持帮助，不料屡屡碰壁。原因也不奇怪，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绝大多数官吏闭目塞听，顽固守旧，夜郎自大，他们视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向西方学习是“以夷变夏”，当然对容闳就不会理睬。正当他穷途末路之际，机会忽然来了。1863 年，经人推荐他认识了曾国藩。后来，曾国藩与李鸿章筹办洋务，打算在上海兴建一座兵工厂，正急需一名通晓外文、熟悉国外情况的人去美国买机器，容闳便被选上了。奉命之后，他不辞辛苦，取道英国到达美国纽约采办机器并圆满办成此事，曾国藩非常高兴，对容闳也更加赏识。这时容闳的好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容闳认为实现自己的计划的时机已到，便于 1868 年通过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提出留美的具体建议：“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卓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食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总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②容闳将派留学生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考虑到了。但是，由于意外的坑搁，这项条陈没有能上奏。1870 年，容闳再次见到曾国藩，趁机陈述了自己派留学生的意图，曾即同李鸿

^① 见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 1915 年。

^② 见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 1915 年。

章联名上奏，这一计划最终被清廷批准。

实施留学计划的第一步是在上海设立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入此学校的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家境富裕，身体健康，并要经过中文写读和英文基础（未习英文者可免试）的考试，才能被录取。学生在该校学习一年中西文学后前往美国，赴美前，学生的家长必须签订志愿书，志愿书中写明听其子弟出洋留学 15 年，15 年中，如有疾病、死亡及意外灾害，政府都不负责等内容。1871 年容闳等开始了紧张的招生工作，但是，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多数人认为西方是蛮夷之地，而且送自己的子女出国须画“生死押”，许多中国家庭都不愿冒这一风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容闳还没有招够 30 名，不得已只好到香港才招齐了这个数目。同年 11 月，李鸿章奏请以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驻美办理一切管理留学幼童的事务。这批挑选出来的幼童在上海经过严格的中西文训练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十一日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搭船赴美，同年秋天抵达旧金山。孩童们来到异国，仍都穿着满清服装，长衫马褂，瓜皮帽，白布袜，黑色白底洗鼻梁的布鞋，引得美国人既好奇又关心。在美国友人的帮助下，他们被安置分居在居民家中，以便习惯美国的语言生活。

1873 年 6 月 12 日，第二批幼童由黄胜率领出国，同行还有 7 名自费生。1874 年 9 月 19 日，第三批幼童由祁兆熙率领出国。1875 年 10 月 14 日，第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赴美，同行的还有自费留学的徐润的三位堂弟。至此，120 名幼童全部到达美国，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 16 岁，最小的仅 10 岁。其中广东 84 人（香山县占 40 人）、江苏 21 人、浙江 8 人、安徽 4 人、福建 2 人、山东 1 人。^①

为了更好地对留学生进行管理，1874 年在容闳的建议下，

^①见吴霖《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14 页。

清政府花 43000 美元建造了一座三层楼房，内有一间大课堂专供教授汉语用，还有餐厅、浴室、厨房、卧室及监督教员们的办公室，能同时容纳 75 人住宿。1875 年，容闳等人迁入这座大楼办公，并正式将它命名为“留学事务所”。

赴美学童们均由监督及教习管理，既要学习英文，又要学习汉语，并且以英语为主课。他们年龄小，聪明伶俐，学习英语进步很快。汉语教习也对学生们抓得很紧，孩童们一般是三人结伴到留学事务所学习，每次去 12 人，以两周为期，然后依次轮换。主要是学习读书写字、讲解作论。除了学习正规课程外，他们还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如打球、跳舞以及外出游览等。1876 年，幼童们曾前往费城参加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博览会，在整个参观期间，他们对人有礼貌，言谈举止落落大方，丝毫没有害怕畏缩的神情，深得美国人士的称赞。1877 年，头两批幼童已有 50 多人升入中学，有 18 人已升入大学。^①李鸿章等清朝官吏出于办、洋务的需要，希望留学生们成为开矿、机械、造船、邮电及各种军事、工业技术的人才。这样大多数留学生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基本上分别进入各类工科专业学习，如詹天佑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欧阳庚入耶鲁大学学习机械工程，许多人进入斯梯文工业学校。他们在课余还广泛涉猎各类社会科学著作，在思想、生活以及习惯等方面都深受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然而，就在这批留学生学劲正酣，即将圆满完成学业之际，由于腐败的清廷从中作梗，中途而废，1881 年夏，留美学生全部撤回。这批留学生被撤回国后，虽然经历了一段艰苦磨难的时期，但他们靠着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终于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据统计，他们中在外交界服务的有 16 人，其中梁敦彦曾升任外交部尚书；唐绍仪曾出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届内阁总

^①见吴寰《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16 页。

理；梁诚曾任驻美公使，在任内协助完成交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事宜。服务于教育界的有 5 人，如唐国安曾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并出任第一任校长，为清末民初大批青年赴美留学做出了贡献；蔡绍基在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任上，对大学建设做出了贡献。分配到海军工作的留学生，他们技术精练，作战勇敢，在中法福州海战及中日黄海大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从事技术与开矿工作的，在工厂、矿山、铁路、电报、电话等部门任技术指导的有 62 人，其中以詹天佑最为著名。他回国后，任天津铁路公司的工程师，在督修古冶到滦河铁路工程的时候，高质量地完成了日德工程师不能完成的滦河大桥，博得中外人士的赞扬。1905 年在督修京张铁路的时候，他出色地完成了居庸关、八达岭两处著名的隧道工程。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减缓坡度，詹天佑还在青龙桥设计出“人”字形路轨。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①

总之，第一批留美学生，成为西学的实际传播者，他们远赴异国学习语言、科学及文学，回国后，在各个行业施展才华。同时，他们也为中国同胞做了中西沟通的最好中介，使中国人在感情上接近西方，减少了中国与西方的隔膜。此外，他们事业的成功，也吸引了很多人去追求西学。

2. 赴欧留学与近代海军

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时刻威胁着满清帝国。1874 年 5 月，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怂恿下，悍然派出两艘铁甲舰和 3000 名官兵入侵我国台湾。一向轻视这个东邻小国的清政府官员们无不为之震惊。他们认为日本胆敢如此猖獗，“正恃铁甲船为白雄之具”。于是，清政府急切希望创办一支近代海军。为了解决人才和技术问题，清廷采取了重金聘请

^①见吴莹《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21—23 页

洋人做技术顾问和开办一些新式水师学堂的办法。但是，由于洋人瞧不起中国，不真心传授技术，加上所办的水师学堂质量不高，培养的人才仍不敷用，急需开辟育才的新途径，因而一些官吏就呼吁通过派留学生来解决问题。李鸿章也这样说，海军“为西国专门之学，非躬亲其事者不能尽悉”。^①于是，留学欧洲与创办近代海军紧密联系在一起。

光绪元年（1875），沈葆楨派遣福建船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随同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到法国参观学习。第二年，李鸿章派遣天津武介卞长胜等 7 人随德国人李励协赴德学习军事技术。这是中国学生到法、德两国学习的开端。由于这些赴欧人员都是由清朝官吏所派遣，不是清政府正式派送的，所以留学生的监督以及他们的学习科目都没有一定的规章。到了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李鸿章等人奏准派遣福建船厂学习制造的学生 14 名、艺徒 4 名、学驾驶的学生 12 名，由监督李凤苞和法国人日意格率领，加上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 2 人，前往英、法两国学习，开始了往欧洲正式派遣留学生。1881 年 11 月，李鸿章奏准派遣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学生黄庭、李芳荣等 10 人分赴法国、德国、英国三国留学，学习营造、枪炮、硝药、制造、鱼雷、驾驶等，这些学生在欧洲留学三年，均取得优异成绩。1886 年 3 月，李鸿章、曾国荃奏准予北洋水师学堂及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中选取刘冠雄等 34 名优秀学生，由监督周懋琦率领赴英国、法国留学，学习测绘、驾驶、兵船、制造等。总的说来，清政府派赴欧洲的几批学生主要是学习海军方面的专门技术，他们回国后，大都成为中国海军、造船、航海或其他科学领域中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破坏阻挠，洋务派派遣留学

^①见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生的运动并未继续下去，自 1886 年以后，中断了 10 多年没有续派，直到 1896 年才恢复了派遣留学生工作。这年 9 月，船政大臣裕禄奏请续选学生出洋留学。1897 年清廷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施恩孚等 6 人派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并委派江苏候补知府吴德章为监督。这批学生在法国学习了三年，由于经费困难，后撤回。这之后，1904 年前后，北洋海军派出了 40 名左右青年前往英国海军学校、航海舰队、军事工厂学习驾驶、指挥和制造等专业。除了海军外，清政府及各省也相继派留学生赴欧留学。1903 年两江总督张之洞选取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 8 人去英国学习管轮和驾驶，又由陆师学堂选取 8 人赴德学习步、骑、炮、工等科。同年，湖北选 24 名青年前往比利时学习实战。1904 年，山西专派 20 多名举人赴英学习法律、机械、冶金、地质等。据 1910 年统计，当时在英留学的人近 150 人。这一时期，京师大学堂译书馆、湖北、广东、广西等地也派人赴法留学。此外留德、留俄学生也有一定数额，所学课目以理工、军事为主。

留学欧洲的学生大都是 20 岁左右的青年，他们血气方刚，能独立生活和学习，具有一定的辨别力，而且在出国之前就具备了较高的文化水平，外语也大致过了关。这样，他们在国外学习，主动性就非常大，求知欲很强，学习刻苦且目的明确，对于所学的航海、制造、驾驶等技术，掌握快，成绩出色。在 1877 年第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中，制造专业学生魏瀚、陈兆翱最出色，可同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学驾驶的学生中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复、蒋超英成绩最好，其中刘、林二人“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足与西洋水师管驾官相等，均堪重任”。他们既可管驾大小兵船，“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①

^①见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 142—143 页，《庸盦全集》光绪年间刻本。

1881年出国的10名学生成绩也很出色，他们可以充任轮船管驾、学堂教习、制造监工等重要职务，直接被派往海军各个部门服务。1886年的留欧学生中，陈恩涛、贾凝喜等人文武兼备，最为出色；刘冠雄、黄鸣球等人考试多次名列前茅。这批人归国后可立即充任驾驶、教习、铁路监工、轮船监工等工作，直接为祖国效力。当时，就连同学生一起赴欧的随从人员也积极求学。1877年随李凤苞赴欧的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等人，在办完公事之后，都进入学校学习。马建忠、陈季同曾入政治学校学习交涉、法律、格致、政治、文词等。马建忠还游历法、英、德、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考察政治、研究法律，他后来著有《马氏文通》一书，将中国文法作严密的分析，成为中国现代汉语言学第一部重要著作。罗丰禄在伦敦学化学、物理、气象学等，回国后，为祖国做出了特殊贡献。

这些留欧学生与当年赴美幼童一样，成为中国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既有近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理论，又有高尚的爱国思想，希望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独立富强，民主自由。他们以他们的行动传播了西学，缩短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批留欧学生，成为清朝近代化海军建设的关键人物，如林泰曾任北洋海军左翼总兵，萨镇冰为海军帮统。北洋海军主要军舰的管带，如镇远管带林泰曾、定远管带刘步蟾、靖远管带叶祖珪、经远管带林永升、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超勇管带黄建勋都是留欧生。他们在传播军事知识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此外，严复和马君武还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震动全国；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一书，也产生广泛影响。

3. 庚子赔款和留美高潮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使馆安全为借口，组织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

二十七年（1901）九月七日，根据慈禧太后的旨意，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俄、美、法、日、德、意、奥、西班牙等14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条约规定，清政府应向诸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7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出于其在华长远利益的考虑，通过了以一部分赔款退还中国的议案。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总统下令，除扣去实应赔偿的款项外，其余都退回中国，退款金额共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美元，另外保留二百万美元作为或许有未经查出应赔偿的款项之用。这二百万美元，后经查出应赔偿的款项为八十三万八千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美元，余额也都交还了中国。对于这些退还赔款的使用，中美双方拟定了一项协议办法：

①遣派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并同意自1909年开始，每年派遣合格的一定数目的中国青年去美国。

②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各大专学校深造的预科。

③在华盛顿郊区，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负责管理中国留学生。

于是，宣统元年（1909）六月，清政府在北京正式成立游美学务处，命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学部郎中范源濂、外务部主事唐国安为会办，容揆为驻美监督。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一次考试，初试考国文、英文、中国历史、地理等科，当时有600人参加考试，只选出68名，复试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古代史、外国近世史、外国地理等科，最后录取赴美留学生47人。当时，清廷的贵胄学校特别要求格外加派秉志、倭中布、杨荫庆等三人，他们未经考试，随同

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①宣统二年（1910）七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二次考试，所考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德文或法文。而且规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论说和德文或法文外，一律采用英文考试，足见考试难度之大。考试结果，400名应试青年中有70名考中，第一名为上海南洋中学的杨锡仁，平均成绩79.207分；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的赵元任以73.4分的成绩名列第二，竺可桢考了63.8分名列第二十八，胡适考了59.075分列第五十五名。这批被录取的学生，来自江苏的29人，浙江14人，广东9人，直隶、安徽、福建、四川各3人，贵州2人，湖南、山东、广西各1人，而且大都是教会学校或有影响的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宣统三年（1911）七月，游美学务处举行第三次考试，录取了黄国栋、章元善等63名赴美留学生。这样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83名。^②留学教育的风气既开，各省选送的官费留学生也逐渐增多。据统计，1911年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达650多人。

1910年11月，为了克服选派留美学生的困难，清廷学部奏请改革游美肄业馆的三项办法：①将游美肄业馆的学生名额由原来的300名增加到500名；②将学制定为8年，分高等和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③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毕业学生不仅限于留美这一途径，在该馆肄业的学生，也能具有专门的才学。同时，请将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清华学堂的校址设在北京西郊清华园。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周自齐出任第一任总办，范源濂出任第一任会办，胡敦俊任教务长。凡经复试及格的学生，一律入学。全校30多位教师中，美国教师有10多人，全校400多名学生，来自各省，一律公费。

^① 见吴宓《中国人留学史话》第37页。

^② 见吴宓《中国人留学史话》第38页。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半年后的 1912 年 5 月 1 日，清华学堂重新开学，并将“学堂”改称“学校”，把“监督”改称“校长”，早期留美生唐国安出任第一任清华学校的校长，周治春为副校长，重新整顿了校务和教务，以培训留美预备生为宗旨。学校的许多课程采用英文教本，连一些诸如行政会议、文艺节目、布告、辩论等都采用英语。学校非常重视体育，规定如体育不及格则不准出国留学。1912 年，继前三批选送的直接赴美留学生后，清华学校又选送高等科毕业生侯德榜等 16 人留学美国，这是清华学校成立后第一批派出的留学生。这之后，清华学校每年的高等科毕业生全都资送留美。大约每隔一年，学校还招收一次女生（1914 年开始）和专科生（1916 年开始）直接资送留美。此外，还有一些留美自费生也接受清华的一部分津贴，称为“津贴生”。到 1929 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 1279 人。^①这样，以清华为中坚力量，便形成了清末民初赴美留学的高潮。

与第一批赴美幼童生相比，现在这一批学生年岁大，学历高，学起来得心应手，困难较少，加上他们的聪明和刻苦，大多成绩优异；也正是这一大批人，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留法勤工俭学

1901 年，李石曾、夏坚仲、张静江等人官费赴法留学。两年后，李石曾的好友吴稚晖由于宣传反清，被清廷追捕，亡命英国，他与几名留英学生一边做工，一边求学。1907 年，他赴法国巴黎与李石曾等人会合在一起试验勤工俭学。同年，蔡元培与同学数人自费赴德，实行俭学。在这些人的试验倡导下，一股俭学风在留欧学界兴起。当时国内很多青年人认为法国是资产阶级

^①见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41 页。

自由、平等、博爱理论的摇篮，资产阶级文明的样板，要建立共和国，向国内输入世界文明，必须去法国留学。但政府财政紧张，无法官费派遣，于是 1912 年 2 月，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俭学会主要任务是负责向想要赴法俭学者做介绍和联络工作，会址设在北京，只有一间办公室，室内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俭学会成立后，编印了《法兰西教育》一书，介绍了法国教育的情况。1912 年 5 月 15 日，《北京日报》刊出了俭学会的特别广告，欢迎青年人入会。上海的《民立报》也刊出了吴稚晖的《答友人同学留法俭学会书》，宣传说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民智民气先进之国，社会风气简朴，科学文化发达，要向西方学习，以留学法国为最合适，具体办法是俭学式留学，每年仅用五六百元钱，是留学英美费用的 1/3。为了落实留法俭学会的工作，由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吴玉章、张继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留法预备学校，由齐如山主持校务。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大力支持，并专拨一校舍给他们。凡俭学会会员均可入此校，以 6 个月为一期，期末进行考核，及格者发给证书，定期赴法。学校所开课程为法文、中文、算学及应用知识。1912 年 5 月 26 日该校正式开学，招收学生 60 多人，到 11 月底，这些学生完成预备学业如期毕业，取道西伯利亚乘火车赴法留学。1913 年 6 月初，第三班学生 20 余人又完成预备学业，踏上赴法留学的征途。^①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中的法国急需大量从事生产劳动和后方勤务的工人，于是提出在中国招募华工，北洋政府答应了这一要求，李石曾趁机以俭学会名义同法国招工局谈判，并达成协议由俭学会代为向国内招工，并向法方提出华工与法国工人同等待遇、须设工人教育等条件，法国同意了这些条

^①见吴宪《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82 页。

件。于是几年间，由俭学会招收的华工达 15 万人之多。他们到法国后，有的修路，有的运输，有的在工厂制造枪炮。同时，在法国政府的协助下，也对华工进行了教育。华工教育的逐步展开，使勤工俭学从理论宣传转到实际行动，为广大青年赴法留学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随着大批华工涌向法国，国内不少青年也纷纷要求赴法留学，留法勤工俭学会渐渐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迫切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办理诸如安排住宿、介绍学校、联系做工等事宜，于是，中法双方经过协商筹组了华法教育会，中方负责人有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李圣章、吴玉章。华法教育会的宗旨为“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① 1917 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返回北京成立了北京华法教育会。为了扩大宣传，他们再版了《勤工俭学传》；编印了《旅欧教育运动》一书，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沿革过程和赴法勤工俭学的办法，成了赴法必备的入门书。1918 年前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大力宣传、推动，国内各界名流纷纷捐款资助，各地也纷纷成立华法教育会分会，赴法勤工俭学进入高潮。1918 年 8 月中旬，毛泽东偕 25 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大力支持推动下，这批湖南青年于 1919 年下半年陆续赴法。1919 年 12 月，由向警予、蔡畅等人发起的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吸引了很多有志女青年。1920 年末，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也到了法国，在这前后，一批向往追求马克思主义，走苏俄道路的革命青年，如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贵州的王若飞，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江西的熊雄等，均先后来到法国，投入到勤工俭学行列之中。据统计，到 1920 年，

^①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第 527 页

留法勤工俭学的人数为 1600 多人。单是湖南就有 346 人，占留法人数的 1/5，成为一支主力军，其中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瓚、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肖三等入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①

留法勤工俭学的最大成果，是留学生们从西方取来了马列主义“真经”，从而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光明途径。

5. 20 世纪初的中国留日热潮

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起到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在古代隋唐和宋元明时期，曾有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险，劈波斩浪，来华留学到了近代，中日之间留学的方向发生了逆转，20 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

为什么会出现 20 世纪初的中国留日热潮呢？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尤其是 1895 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以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因此，纷纷主张效法日本，救亡图存。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

其次，清政府提倡和鼓励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在 1898 年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②

^①见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95 页。

^②见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劝学篇·游学第二》。1926 年刊本。

1903 年清政府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对日本大、中学毕业者经过考试，也授以进士、举人出身”。1905 年清政府决定停止科举考试，出洋留学成了知识分子的重要出路。清政府还鼓励官费、自费并举，推动了留学日本热潮的发展。

第三，日本政府主动吸收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形成留日热潮的重要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吸收中国留学生，既可密切两国感情，又可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扩张势力，与沙俄争夺远东霸权。当时日本各界，尤其是教育界十分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的工作，特别开设了一批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日华学堂、成城学校、弘文学院、振武学校、东斌学堂、经纬学堂、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此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留学日本比起留学欧美来，具有地理位置接近、来往交通方便、用费节省、文字习俗相似等等便利条件。

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最早是在 1896 年，当时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的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锜等 13 名学生赴日本留学。1898 年戊戌维新时期，清政府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至 1899 年各省派往日本留学的已有 100 多人，其中在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最多。1903 年留日中国学生已达 1300 余人。1905 年至 1906 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19 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几乎全是学理工和军事的，可是 20 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治、文史、外语、师范、军事到理工、农医、商业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而且以学文科的占多数，其中又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热门。另一个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较多，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不多，能学到大学毕业的就更少了。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他们通过创

办报刊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口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效果卓著，影响极大。

中国留日学生办刊物始于 1900 年冬天创刊的《开智录》和《译书汇编》。1903 年以后，各省赴日的学生越来越多，纷纷组织本省留学生的同乡会、同学会，创办具有地区性特点的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云南》、《四川》等。1906 年以后，留日学生办报刊达到高潮，除了宣传革命的政论性杂志和文学刊物外，还出版了一些专业性刊物，如《音乐小杂志》、《医药学报》等。据不完全统计，20 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所办刊物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和时代脉搏，表现了留日学生的思想感情，也体现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和融合。

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也是 20 世纪初中国留口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他们到了日本，学了日文，读到不少日文书，急于把新思想新知识介绍给祖国人民，于是便掀起了翻译日文书的热潮。1900 年留日学生金邦平等在东京成立的译书汇编社，是留日学生的第一个翻译团体，他们不仅出版《译书汇编》月刊，刊载日本著述的译文，而且从日文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等方面大量著作，及西方著名学者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日本版的中文译本。留口学生陆世芬等人还创办了教科书译辑社，译编日本的中学教科书，以供国内各省新式学堂采用。1902 年湖南留口学生杨度、黄兴等组织了湖南编译社，发行刊物《游学译编》，同时也翻译出版各种日文著作和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学参考书。1903 年留日学生范迥吉等选译了《普通百科全书》，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 100 余种。

1904年福建留口学生发行的《闻学会丛书》也是以翻译的口文书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04年短短3年中,以留口学生为主翻译的日文书就有300多种,占当时中国翻译外文书总数的60%以上。

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实际斗争的教育,很多留口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国外求学的条件,举行各种集会,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和书籍,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成员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在各省的主盟人也主要由留日学生担任。同盟会举行的10多次起义,每次都有留日学生参加或担任指挥。20世纪初大批留口学生投身革命,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在20世纪初,从中国赴日本留学的人数先后共计有数万人。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学习专业之广泛,开展活动之频繁,在世界留学史上也是罕见的。20世纪初的留口热潮,不但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建设产生影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是被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因此,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学习、传播日本文化,也就是学习、传播西方文化。也可以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化,在整个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二 西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翻译

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美法两国的支持下,结束了清代自雍正元年开始的闭关自守状

态。从此，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 他们前仆后继，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那时，先进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② 而学外国有两条路：一是向日本和西方各国派遣留学生；二是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即所谓西学或新学。因而掀起了继汉唐佛经翻译和明末清初科技翻译之后的第三次翻译高潮。

1. 爱国主义者的翻译活动

爱国主义者的翻译主要是指林则徐、魏源的翻译活动。

林则徐，晚清政治家、军事家。他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卓有建树，是著名的爱国抗英将领，而且在文化学术上高瞻远瞩，是中国近代率先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人物。他在广东任内，曾于广州设立译馆，翻译外国书报，使“洋人旦夕之所为，纤悉必获闻”。林则徐不谙外文，他的翻译活动主要是组织懂外语的人初译，再由他校订、润色，然后付印。由林则徐参加校阅、润定的译著有《澳门月报》五辑：《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以及《华事夷言》等。由于林则徐的倡导和亲自参与译事，翻译外国书刊在 19 世纪 40 年代蔚然成风，如汪文秦的《红毛英吉利考略》、萧会裕的《英吉利记》、徐继畲的《环瀛志略》等。

魏源，晚清思想家、翻译家，道光进士。青年时代与林则徐、龚自珍等过从甚密。鸦片战争时，曾参与浙东抗英战役。他曾受林则徐之托辑译《四洲志》。以后又在此基础上，广泛收集各国史地资料编译成《海国图志》一百卷。这是一部介绍世界各

①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58 页，人民出版社 1969 年。

②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59 页，人民出版社 1969 年。

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曾给继起的我国维新志士以很大启迪和鼓舞。鉴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魏源在该书中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他主张我国应建立新式工业，除仿制外国武器外，还应学习外国养兵练兵之法，仿造外国的机器和仪器。

2. 洋务派的翻译活动

继林则徐、魏源之后，我国近代史上有所谓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中央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地方有当时的封疆大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洋务派在外交政策上是软弱的，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者的压力；但是他们也和林则徐一样，主张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工作需要，他们也提倡翻译外国书刊，培养人才，派遣留学生。这一时期，西学翻译有两个中心：一是京师同文馆，二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京师同文馆由恭亲王奕訢于咸丰十年（1860）奏请设立，1862年正式成立。开始只有英文馆，学生仅10名。次年又设法文馆和俄文馆。1872年又增设德文馆。1896年又设东文馆（日文馆）。同文馆负有双重任务：一是培养外语人才，二是翻译西书。所译书籍以公法为主，兼及其他。如丁韪良译《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毕利干译《法国律例》、《化学指南》、《化学阐原》，骆三畏及其学生译《天学发轫》，汪凤藻译《新加坡律例》、《英文举隅》和《富国策》，俄文馆学生译《俄国史略》。

江南制造局于1865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立。1867年设翻译馆，由徐寿任主事，延聘外籍学者翻译格致化学制造等书，后将李鸿章于1863年创立的广方言馆并入，使翻译与教学同步进行。翻译馆中有几位担任笔受的著名华人科学家：

李善兰（1811—1882），晚清著名数学家、翻译家。字壬叔，

浙江海宁人。起先在制造局翻译馆工作，后任同文馆算学馆总教习。曾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代数学》十三卷、《代微积拾级》十八卷、《谈天》十八卷；与艾约瑟合译《重学》二十卷、《圆锥曲线说》三卷；与韦廉臣合译《植物学》八卷；与傅兰雅合译《奈端物理》^①等。

徐寿（1818—1884），晚清著名科学家、翻译家。江苏无锡人，字雪村。起初担任安庆军械所工程技术员，后任制造局翻译馆主事。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曾与华蘅芳试制木质轮船，为我国自制轮船之始。译有《化学鉴原》正、续、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等，系统译介了当时化学知识的主要内容。此外，还译有《西艺须知》正、续编，《汽机发轫》，《营阵发轫》，《测地绘图》，《法律医学》等书。

华蘅芳（1833—1902），晚清著名数学家、翻译家。字若汀，江苏无锡人。1873年入江南制造局，任提调兼翻译，并在格致书院主持讲席。译有《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合数术》、《对数造表法》、《决疑数字》（概率论）、《金石识别》（矿物学）、《地学浅释》（地质学）等。

洋务派的译书机构，还有广学会、墨海书馆、益智书会、美华书馆、科学仪器馆、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等。

3. 维新派的翻译活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这时，一部分爱国的官吏和爱国的知识分子拍案而起，要求变法自强，抵御外侮。1898年，康有为等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推行新政。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在这前后，维新派人士认为，

① 《奈端物理》即《牛顿物理》。

要救国，必须变法；要变法，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要学习外国，必须从翻译开始。

因此，自甲午至庚子（1894—1900），翻译之风大盛。一批学贯中西的爱国志士，办报馆，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和科学技术。此时先后兴办的报刊，不下 30 余家。如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以及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横滨创办的《清议报》等。这些报刊除刊载时事政论外，也译介外国报纸的新闻和重要文章，并译印西书。当时还成立有专门的译书机构，如山康有为、梁启超筹计，由文廷式出面在北京创立的强学会，设有强学书局，翻译出版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图书。由张菊生在上海创立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主要翻译外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以及科学技术书籍。1897 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稍后设编译所，由张菊生主持工作。由罗振玉等在上海成立的务农公会，以翻译农书、农报为主，先后译印图书 100 余种。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年曾是该会的主要编译人员。此外，还有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大同译书局以及译书公会、质学会、圣学会、明达学会等。

维新派译介的西学主要是：一、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学说，特别是天赋人权论和民权论；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三、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维新派翻译的代表人物是马建忠与严复。

4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翻译活动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做了大量思想和舆论准备。如金一译《三十三年落花梦》，黄中黄译《孙逸仙》，甘永龙译《伦敦蒙难记》，马君武译《弥勒约翰自由原理》、《斯宾塞社会学原理》、《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小鬟女士译《译文四种》：一、《美利坚独立檄文》，二、《法兰西人权宣言》，三、《玛志尼少年意大利章程》，四、《噶苏

上戒国人书》，罗伯雅译《共和政体论》，马为琬译《比较国会论》，作新社版《美国独立战史》，人演社版《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编译《法兰西革命史》，东京留学生译《意大利独立战史》，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等。此外，民报曾译载《法兰西革命歌》和 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这一时期，还大量译介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他国的书，如《波兰衰亡史》、《越南亡国史》、《西力东侵史》、《美国垂涎中华近事》等，以此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思想。

5. 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早在新文化运动前的 1899 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曾在上海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一篇题名《大同学》的文章，其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这是在中国报刊上最早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中国人自己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在 1902 年 9 月发表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曰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中国人最早系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是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和中国达识译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前书中有“加陆马陆科斯（即卡尔·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的写作过程。书中提到恩格斯时说：“野契陆斯（即恩格斯）与马陆科斯相亲善，始终同其难苦。”后书的内容，主要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二书。此书前后有三个译本，影响较大。据吴玉章回忆，他就是 1903 年读了这本书后，开始接触

社会主义思潮的。

我国最早节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文的是《近世社会主义》的中译者从日文节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话，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助手、民主革命家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1908年，我国旅日无政府主义者的机关报《无义报》，又发表民鸣译的恩格斯于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全文。这是马恩著作最早的一篇完整的中译文。同年，《无义报》又发表民鸣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即《资产者与无产者》）

新文化运动期间，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以及改组后由李大钊参加工作的《晨报》副刊，都曾发表过马恩著作的节译文和全译文。据罗章龙回忆，1920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成立翻译室，下设英德法三个翻译组。他们曾以德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前者有油印本。据许德珩回忆，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曾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完，但因故只发表了第一章。《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本，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的，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列宁的名字，最早见于1918年夏孙中山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胜利的电文，以后又见于上海大同书局《劳动月刊》上刊载的《列宁传略》。列宁著作的最早中译文，是1919年在《解放与改造》和《新中国》杂志上先后译载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从此，马列著作便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系统地译介到中国来。

6. 近代文学翻译

近代文学翻译的第一位大家是林纾。他在42岁时，开始与别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直到73岁去世，30年间，用古文翻译

欧美各国小说 158 种，约 1000 余万字。林纾的成名译作，是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的众多译作中，属于世界名著的有 40 多种：如《伊索寓言》，狄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即《格利佛游记》），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即《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贼史》（即《奥列佛·特维斯特》），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欧文的《拊掌录》（即《见闻札记》），列夫·托尔斯泰的《人鬼关头》（即《伊万·伊里奇之死》），《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刀冰伯爵》（即《两个骠骑兵》），塞万提斯的《魔侠传》（即《堂吉珂德》）等。林译小说影响了“五四”时期和以后的整整几代文学家和广大读者，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朱自清、钱钟书等，都受过他的影响。

近代文学翻译的又一位大家是苏曼殊。他原籍广东香山，生于日本横滨。母亲是日本人，曾嫁给旅日华商苏杰生为妾。后随苏回国，因遭虐待被迫返回日本。苏曼殊 8 岁就失去母爱，因而性情孤独。父亲死后，他 12 岁在广州出家，自取法号曼殊。15 岁后，数次赴日本探母，在日留学近 6 年，参加过拒俄义勇队等革命活动。1903 年回国，当过教员，也当过报社的翻译和编辑。他曾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与陈独秀合译，题名《惨世界》）、《拜伦诗选》以及彭斯、雪莱、歌德等人的诗。拜伦的名篇《哀希腊》，就是苏曼殊翻译的。

近代文学翻译的另一位大家是鲁迅。1909 年，鲁迅与他的弟弟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家和地区反映人民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这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翻译的开端，对继起的文学翻译以重大影响。

1915 年 9 月，作为“五四”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创

刊。《新青年》创刊伊始，便以介绍东西方进步的文学思潮和作品为己任。它在创刊号上首先译载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春潮》，以后又相继译介了俄、英、法、美、印度、日本、挪威、西班牙、波兰、丹麦等 10 多个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所属的作家有：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王尔德、泰戈尔、莫泊桑、易卜生、安徒生、高尔基等。1918 年 6 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号”译载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和《国民之敌》。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的著名翻译家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罗加伦、陈赅等 10 余位。

继《新青年》之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相继成立，从而掀起了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新高潮。

三 近代报刊对西学的传播

中国近代报刊发端于 19 世纪初期外国传教士和一部分商人创办的一批中外文报刊。一批意识到中国文化落后的知识分子看到报刊的传播功能和对社会舆论的作用，纷纷创办报刊，宣传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很大作用。

1. 近代报刊的产生

1807 年 1 月 31 日，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从伦敦出发，漂洋过海，于 9 月 8 日抵达广州，成为基督教（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当时清政府严禁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马礼逊只好把传教总机关设在南洋的马六甲。他与助手米怜、中国刻字工人梁发，于 1815 年 8 月 5 日创办了近代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主编米怜。“察世俗”即

“Chinese”的音译,^①该刊为本版雕印,每期五至七页,约 2000 字,免费赠阅,或借友人通信之便寄到华侨居住区。这是一本宗教性月刊,主要宣传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同时也介绍一些科学知识和各国概况。本刊直到 1821 年米怜有病离开马六甲而停刊。^②不久,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6)于 1823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了第二份中文刊物《特选撮要每月统计传》。

在中国本土出版的第一个近代中文刊物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由传教士、普鲁士人郭士立(1803—1851)于 1833 年创办于广州。与前两刊物相比,该刊重视介绍西方的实用科技知识,侧重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教,目的在于炫耀西方的文明,消除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戒备心理。

随着来华的外国商人、传教士的增多,以他们和外侨为对象的外文报纸也开始出现了。其中,1822 年创刊于澳门的葡文《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外文报纸。1827 年创办于广州的《广州纪录报》是在华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1832 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丛报》是美国人在华创办的第一家英文刊物。这些外文报纸更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迅速深入内地,上海首先成为近代报业中心。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到 90 年代,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创办的中外文报刊达 170 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 95%,几乎垄断了我国的报业。在外报的影响下,中国人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自办报刊。其中最早要算香港的《中外新报》。

^① 该刊英文名字为“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本应译为《中文月刊》。

^② 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65 页。

《中外新报》的前身是《香港船头货价纸》，1857年底创刊，主办者黄平甫和伍廷芳。约于1865年改名为《中外新报》，1873年改为日报，1919年停刊。其后，中国人主办的报刊相继出现，主要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年，广州）、《昭文新报》（1873年，汉口）、《循环日报》（1874年，香港）、《汇报》（1874年，上海）、《新报》（1876年，上海）、《维新日报》（1879年，香港）、《述报》（1884年，广州）、《广报》（1886年，广州）。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循环日报》。^①

《循环日报》的创办人是王韬。该报的鲜明特色是在“中外新闻”栏内经常发表王韬撰写的政论，开创了中国近代报纸以政论为主的风格。王韬的政论抓住国内外发生的时事，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变法改良的主张，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的时候，传教士办的宗教性报刊开始没落，一些外国人将眼光投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纸。上海成了这类报纸的竞争之地。在竞争中，《申报》和《新闻报》成为旧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刊。

2. 维新运动的号角

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为宣传西学、呼吁变法，创办了多种刊物。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自筹资金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第一家刊物。不久，以北京为中心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正式成立，该报即转为该会的机关报。由于该报与当时上海广学会外国传教士办的报纸同名，遭到教会势力的反对，出至第45册后改名为《中外纪闻》。

《中外纪闻》由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主编，双月刊，

^①见王凤超《中国报刊史话》第16页。

山出版《京报》的民间报房代印，委托报贩免费送给在京官员阅读。《中外纪闻》的发行和“强学会”的活动引起了顽固派官员的不满，在处境日艰的情况下，康有为南下上海，组织强学会上海分会，并在 1896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创办了《强学报》。《强学报》也由康有为的弟子徐勤、何树龄任主笔。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的发行，使维新变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更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视。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查封了这两个刊物，解散了两地的“强学会”。但是维新派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利用上海强学会的余款，经过半年的准备，于 1896 年 8 月 9 日又创办了《时务报》。该报为旬刊，由梁启超任总主笔，汪康年任总经理，共出版两年 96 期。梁启超因在该报的业绩而名扬天下，成为维新运动中卓越的报刊政论家。

针对维新运动屡遭挫折的事实，梁启超感到开发民智的重要。他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题为《论报馆有益于国是》的文章，第一次用“耳目喉舌”这一通俗而形象的比喻，阐述了报纸“去塞求通”的功能。他在该报发表的《变法通议》等文章，出色地宣传了变法维新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各地纷纷创办鼓吹变法的刊物，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热潮。据粗略统计，从 1895 年到 1898 年间，全国八个省创办了约 30 种报刊，不但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报业的局面，还把人们的思想引进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些有代表性的报刊是：

《知新报》 1897 年 2 月 22 日创刊于澳门。徐勤、何树龄等为主笔，康广仁、何廷光为经理。是中国南部倡导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

《湘学报》 1897 年 4 月 22 日创刊于长沙。由湖南省主管文教事务的官员江标和其后任徐仁铸等督办，唐才常等主编。 1898 年 8 月终刊。

《湘报》1898年3月7日创刊于长沙。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办，熊希龄、唐才常等主编，为湖南地区改良派政治团体南学会的机关报。同年10月15日停刊。

《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严复等主编。戊戌政变后售与日本人

这些报刊都以宣传维新变法，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政治制度为其主要内容，同时又带有当地维新运动的色彩。其中《国闻报》选译外国报刊达百余种。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报上连载，首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到日本，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梁启超主编，麦孟华等佐之。该报为旬刊，每册40页，从1898年12月23日至1901年11月11日，前后三年共出100册。《清议报》主要宣传保皇思想，提倡开发民智、系统地阐发了民权思想和爱国观念。

《清议报》因报馆毁于火而停刊。1902年2月，梁启超另起炉灶，又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为半月刊，主要栏目有“论说”、“学说”、“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新知识之杂货店”等。1907年停刊，前后出版近6年，共出96号。《新民丛报》是戊戌变法后资产阶级改良派最有代表性的刊物。特别是创刊初期，它以“维新吾民”为宗旨，通过介绍、评议西方思想文化来对中国人进行启蒙教育，对当时没落腐朽的封建思想起了巨大的冲击作用，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3. 妇女的办报活动

中国近代妇女的办报活动，是在维新变法声浪的推动下开始的。

1898年5月31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桂墅里女学会书塾”（后定名为“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学，同时，中国女学会也在上海成立。同年7月24日，作为女学会的会刊和女学堂的校刊——《女学报》问世，该报为旬刊。参加编撰的有薛绍徽、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中国最早的女报人裘毓芳、女学堂教习孙蕴华等。《女学报》的宗旨是提倡女学，争取女权，宣传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并提出了妇女参政的要求。

继《女学报》之后，陈撷芬女士在父亲陈范的协助下，于1899年在上海创办《女报》，不久停刊。后于1902年5月8日续出《女报》。该报为月刊，突出报道了广大妇女的悲惨状况，喊出了妇女要求平等自由的呼声。

1904年，丁初我在上海创办的《女子世界》杂志，累计出版18期，1907年终刊。这是辛亥革命前出版时间最长、革命色彩更浓烈的妇女刊物。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女杰秋瑾创办的刊物占有一定的地位。秋瑾（1877—1907）又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是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革命活动家。她在日本学习期间，于1904年9月24日在东京创办了《白话》月刊，共出6期。内容有论说、教育、历史、地理、理科、时评、谈丛、歌谣、戏曲等栏目。1906年秋瑾回国，于次年1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月刊。这两种刊物以救亡图存为主旨，为辛亥革命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

4. 革命派的喉舌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部，并着手创办机关报，1900年1月25日创办《中国日报》，陈少白任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该报十分重视对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和各地民变、暴动事件的报道，常配以评论，讴歌革命党人的献身精神。

《苏报》由胡璋于 1896 年创刊于上海。1899 年由陈范接办，开始转向革命。1903 年 5 月 27 日，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出任该报主笔，就在这一天，《苏报》刊出邹容写的《革命军·白序》，《革命军》揭露了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号召人们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首次在中国近代史上系统地勾画出未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震撼了思想舆论界。

1905 年 11 月 26 日，孙中山等创办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该报以政论为主，每期有图画、论说、时评、译丛、纪事等栏，约 6 至 8 万字。先后任主编的有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民报》的宗旨是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在该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围绕三民主义发表了大量文章，使革命派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06 年 4 月，《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开始。这次论战是继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与顽固派论战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论战主要集中在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这场论战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做了舆论准备。《民报》广泛介绍了各种社会学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 1905 年 11 月 26 日出版的第 2 期上发表了革命派理论家朱执信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这是中国人最早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学说的文字，文中还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段落。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以前，这种介绍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5. 划时代的《新青年》

《新青年》是综合性文化月刊，1915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 1 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它高举两面大旗：一面是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旧世界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一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可称得上是划时代的刊物。

1917年初，陈独秀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北京这时的《新青年》又向旧文学和阻碍新思想传播的文言文发起冲击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提倡白话文。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倡文学革命的主张。

《新青年》于1918年1月起改版，行文用白话，使用新式标点，使人耳目一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演说词和论文，成为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最早的人。从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第六卷一号开始，《新青年》成立编辑委员会，成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新学大家，分期轮流担任编辑。“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把他主编的六卷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在这一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共产党机关刊物，更加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

四 新式学校对西学的传播

清朝沿用明制，于北京设国学，各省府州县也普遍设学，但学习内容皆为诗赋策论及八股文，其目的只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为补国学、府州县学之不足，各省府州县逐步建立了书院。书院延聘学识渊博之学者名流主讲，内容涉及各方面学术。清代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曾在书院肄业。清代书院中最著名的有广雅书院（广东）、两湖书院（湖北）、南菁书院（江苏）。同治以后，洋务派倡导新政，将部分书院进行调整，学习内容加入西学，并聘请外籍教师讲授外文、数学，书院的名称改为学堂。这种改造的学校，也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场所之一。

同时，为适应对外交涉及近代国防建设的新形势，洋务派在

对书院改造之外，又设立了一些新式学校。这些新式学校较著名的有：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

北京同文馆是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1862年（同治元年）为培养翻译人员，由恭亲王奕訢等奏设，在北京成立，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只设英、法、俄文三班，后陆续增设天文、算学及德文、日文等班。生员只限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岁以上、25岁以下的满、汉学员；也有时招收不限年岁的满、汉学员，学习天文、算学。学习期限，最初定3年毕业。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为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者，8年毕业；一为年岁稍长，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5年毕业。课程最初只设英、法、俄、汉文，1867年又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除汉文外，其他课程的教习多数为外国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65年到馆任教，1869年由赫德提名为总教习，总管校务近30年。该馆设有印刷所，译印数、理、化、历史、语文等方面的书籍。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广方言馆是继北京同文馆之后又一个培养翻译人员的学校。1863年（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清政府批准，仿北京同文馆例，在上海设立，又称上海同文馆。招收14岁以下文章入馆，学习外国语文及自然科学。分英、法文两班，后又设日文、俄文班，3年毕业。1869年移入江南制造局。1905年改为兵工中学堂。

福建马尾船政学堂是清末最早的海军学校。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招收16岁以下的学生。分前学堂（即造船班）、后学堂（即驾驶班）。教育体制悉按英法海军学校成规。前学堂学法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地理、航行等课程，后学堂学英文、算术、几何、画图、机械图说、机械操作

等课程；两学堂并读《圣谕广训》及《孝经》，兼课策论。分别由法国人和英国人主持。学习期限 5 年，毕业后授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1876 年沈葆楨、李鸿章奏令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各国留学，此为我国第一批学习海军的留学生。1913 年，前学堂改为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为海军学校。

北洋水师学堂是清政府设在天津的海军学校。1880 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仿英国海军教习章程制订条例和计划，派严复为总教习，聘用英国军官教练。招收 14 岁以上 17 岁以下青年入学。1888 年有学生 120 人。分设驾驶、管轮两科，驾驶科专习管驾轮船，管轮科专习管理轮机。学习课程有英语、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三角、驾驶、测量、推算、重学、化学等，并习汉文，训演外国水师操法。学习期限 5 年，四年在学堂学习各种课程，一年上练船实习。毕业后分往北洋海军任职，或选赴外国留学。

天津武备学堂是清末设在天津的陆军学校。1885 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设。规制略仿西洋陆军学堂，聘用德国军官教练。最初挑选各营中弁日入堂肄业，文员愿习武者一并录取，学生一百余人。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诸法，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初仅肄业一年，考试及格，发回各营。其后逐渐延长年限，选募年轻学生肄业。1896 年有学生 280 人，分设马队、步队、炮队各科。北洋系将领多出自此。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被焚毁。

此外，洋务派为适应近代工业发展的需要还创办了一些工科大学。这类学校主要有北洋大学、天津电报学堂等。

北洋大学的前身为天津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1895 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设，分为头等、二等两校。头等学堂设有工程、电学、矿务、机器、律例 5 科，4 年毕业，性质属于专科

学校；二等学堂为中学性质，亦 4 年，毕业后升入头等。1900 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停办。1903 年复校，改称北洋大学，课程设有土木工程、采矿、冶金等门，成为我国最早的工科大学。

天津电报学堂是中国最早的通讯学校，隶属于天津机器制造局。地点在东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分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洋务派创办了很多学校，这些学校在西方文化的传播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19 世纪 90 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也办了一些学堂，最著名的有：康有为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谭嗣同等人创办的时务学堂及维新派在北京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等。这些学校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宣传变法聚徒讲学之所。1891 年创设于广州长兴里，后迁府学宫。康有为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设图书室和仪器室，注重体育和音乐，选高才生充任学长，日夕讲业，助康编书。以康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讲学主要内容。不仅讲解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而且传授西洋哲学、社会学、政治原理学及中外史学，说古论今，探讨沿革得失，鼓吹托古改制，按照资产阶级改良政治的需要改造儒学和孔子。学生开始不满 20 人，后增至百余人，其中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人都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1894 年被清政府解散。1896 年后又有讲学活动。

时务学堂由谭嗣同等人发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赞助，于 1897 年 10 月在长沙开办。熊希龄任提调（校长），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之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任分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任数学教习。第一批学生 40 人，学制定为 5 年。至 1898

年春间，全党师生有蔡锷、林圭、秦力山等 200 余人。梁启超以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教学内容：一为博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等；一为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着重使学生具有变法维新的意志，阅读儒家著作及历代治乱兴衰的记载，参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研求治国的道理。学生按日作笔记，由教习批改。梁启超主讲“民权”学说，且多言清代史实，举其失政，力倡变法主张。师生醉心民权学说，日夕讲论。成立仅数月，即遭顽固上绅王先谦等人攻击，被迫停办。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1898 年 7 月，维新派通过光绪帝下令创办京师大学堂于北京，目的在于“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由光绪帝师孙家鼐主办，美国人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招收官员、官僚子弟及各省中学堂毕业生入学。计划设道学、政学、农学、工学、商学等 10 科。戊戌政变后，新政措施几乎全部废弃，该校得以幸免。但在顽固派控制下，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两堂，每堂不过 10 余人，性质与旧式书院无异。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被迫停办。1902 年复校，增设预备科（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1903 年再增进士馆、医学实验馆、译学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1901 年改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辛亥革命后改名北京大学。

从 1901 年起，清政府在举办“新政”期间，颁布了一系列兴办各类学堂的命令、章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开始逐渐移植到我国。1904 年 1 月，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拟订的学堂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的学校教育系统。在“癸卯学制”的推动下，全国学校迅速发展。据当时学部统计，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宣统元年（1909）学

校数由 719 所增到 52000 所，约增加 73 倍。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元年（1909），学生人数由 6943 人增加到 1562170 人，增加 225 倍。^① 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为西方文化的全面输入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设立革命活动的据点，也陆续办了一些学校，其中著名的有：蔡元培于 1902 年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徐锡麟在浙江绍兴先后创办的热诚小学、越群公堂和大通学堂，革命党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公学等。

大通学堂全称“大通师范学堂”，1905 年 9 月由徐锡麟、陶成章等设立于浙江绍兴城内的豫仓。推徐锡麟为监督。招收来自金华、处州等地的会党成员，施以短期的军事教育，培训革命骨干，内分体育、师范两科。设有国文、英文、日文、历史、舆地、理化等课程。1907 年 2 月改名大通体育学堂，举秋瑾为监督，成为浙江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主要中心。同年 7 月由秋瑾主持的浙江光复会起义失败后，遭清政府破坏。

中国公学是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学校。1905 年 11 月 2 日，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清国留口学生规则》，对中国学生入学严加限制。东京 8000 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罢课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各省留学生一时退学返抵上海者达 3000 余人。为使回国学生不致失学，留学生中的姚宏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劝募经费，于北四川路横滨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清两江总督端方在舆论压力下，会财局每月筹拨银 1000 两，派四品京堂郑孝胥为监督。校务实际由王传沙（敬芳）主持。革命党人马君武、陈伯平等任教员。1906 年 2 月正式开学。共招学生 318 人，分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理化专修班，其中不少学

^① 见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第 126 页

生参加革命活动。

清末民初，中国又出现一股留学美国的高潮。为克服选派留美学生的困难，清政府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设立了“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全校30多位教师中，美国教师有10多人，全校400多名学生，来自各省，一律公费。1912年5月1日，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学校的许多课程采用英文教本，连一些诸如行政会议、文艺节目、布告、辩论会等都采用英语。为出国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西方各国教会也在中国创办了很多学校，据统计，到19世纪末，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00多所。而美国在全国创办的教会学校，竟达1100多所，其中有大学多所，著名的有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等。这些外国人开办的学校，在传播西方文化上，比中国人自办的学校更加直接。

第三节 近代的“东学西传”

一、中国文化的西传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上，在中国文化的西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来华后，为了适应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传教事业，不但改穿儒服，戴上儒冠，自称儒者，而且广泛搜罗、潜心钻研中国典籍，著书立说，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

利玛窦的先驱罗明坚是第一个用汉文发表教理书的传教士，他又是第一个翻译《四书》的西方人。1590年他返回欧洲后，向罗马外交官和耶稣会上学者安东尼奥·波赛诺维奇提供了其巨

著《图书论》中有关中国的资料。波赛诺维奇依据这些材料，对中国文化作了耶稣会士的第一次阐述。其后，法籍传教士金尼阁发表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中介绍道：“今天在中国流行的观念，主张天地万物一体。中国的儒生声称所有的人都应互爱，因而都可变得如同上帝一样。”这些记载，揭示了儒学的主要观念。熟谙于中国文化的利玛窦在 1604 年致耶稣会长的书简中还提到了有关“太极”和“理”的理论。^① 1626 年，金尼阁将“五经”译成了拉丁文，在杭州刊印，这是最早刊印的中国经籍的西文译本。1662 年耶稣会上殷铎泽和郭纳爵合作，将《大学》译成拉丁文，将书名意译为《中国之智慧》，在建昌刊印；殷铎泽还翻译了《中庸》，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分别于 1667 年和 1669 年在广州及印度刊印；最早刊印的《论语》拉丁文译本，亦出自殷、郭二人之手。比利时教士柏应理回欧后，于 1667 年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全书由四部分组成：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中国经籍之历史与要旨导论；孔子传；殷铎泽、郭纳爵所译《大学》、《中庸》、《论语》之拉丁文本，三书皆附译注疏。这本书的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但并未收入《孟子》。将“四书”完整地译成拉丁文，是 1711 年由比利时教士卫方济完成的。卫氏的译本注重逐字翻译，忠实原意，连书名也不例外，如《大学》译成《成年人之学》，《中庸》则译为《不变之中道》。卫氏另著有《中国哲学》，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儒家经典和古代哲学思想。拉丁文被称为西欧文化之源，在当时既是为传教士所熟悉的文字，又是在欧洲最盛行

^①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 878—87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的文字，“四书”“五经”译为拉丁文后，在欧洲极易流传。^①

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地理，以及中国科技、中国文学也都以耶稣会士为中介，在欧洲广泛流传。1735年法籍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刊行了被誉为中国百科全书的巨著《中华帝国志》，该书分为四卷，第一卷记叙各省地理和历朝编年史；第二卷研究政治、经济、经典和教育；第三卷介绍宗教、道德、医药、博物等科目；第四卷将满、蒙、西藏、朝鲜列入研究。许多中国著作的译文如《古文观止》、《赵氏孤儿》都被收入该书内。该书还收入了马若瑟所译《诗经》、《书经》。《中华帝国志》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与德国、英国的知识界均以此书作为了解中国的重要材料。

此外，白晋、傅圣泽、刘应、雷孝思等曾奉康熙之命研究《易经》，并将《易经》及其研究心得用法文或拉丁文介绍到欧洲。1783年以后，卫方济所译“四书”被完整地转译成法文。乾隆年间来华的孙璋、宋君荣、钱德明、蒋友仁、韩国英等都以精通汉学著称，他们先后发表了大量译著，向西方介绍中国经典。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频繁接触，中国文化的西传作为西学东渐的较微弱的回应延续着。

1.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出版报刊。从1815年至1949年，外国人在华办了四五百种报刊。

1815年马礼逊在米怜的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了《察世俗

^①参见石源华主编《中外关系三百题》第223—2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每月统纪传》(期刊),这是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期刊。如前文所述,1822年在澳门创刊的葡文《蜜蜂华报》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1827年起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发行的《广州纪录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前文所述,“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中文报刊一般以中国读者为对象,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要内容,也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社会风俗、自然科学等等,成为中国人最早了解西方、接受新知识的重要渠道。外文报刊则以来华外商、传教士和外交官等为对象,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经济物产以及政治动向、军事部署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832年由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

裨治文(1801—1861),新教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美国马萨诸塞州人。1826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1829年获安多弗神学院学位,1830年来广州,从马礼逊学习汉语。1834年与郭士立共同组织益智会,任中文秘书。1836年参与创办马礼逊教育会,并任该会通讯秘书。1838年开设博医院。1839年任林则徐译员。曾到虎门参观焚烧鸦片。1841年获纽约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44年任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和秘书,参加订立《望厦条约》。1847年出席《新约》翻译代表委员会会议,1850年译完后,又进行《旧约》的翻译,次年2月译就。1854年任美国公使麦莲的译员。曾担任亚洲文会首任会长。

《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或《中国文库》。它创刊于1832年5月,直至1851年12月停刊,共坚持20年,印出了20

卷（每月 1 期，每年 1 卷）。该报除免费使用美国公理会送来的印刷机和英文活字外，美商奥利芬还提供开办费和拨给一所楼房作为编辑、印刷之用。裨治文为这个刊物的编辑，卫三畏被指定为该报的印刷者和发行人，并在不久也参加了编辑工作。

卫三畏（1812—1884）——译卫廉士，美国传教士兼外交官。1833 年受美国差会派遣来华传教。他先是从事《中国丛报》的印刷、出版和编辑工作。1853—1854 年，随美国舰队司令佩里出使日本，任翻译。1855 年先后任美国驻华使馆秘书、翻译、代办和代理公使。1858—1859 年间，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1876 年因病辞去外交官职务。他在华长达 40 余年，回国后于 1877 年任耶鲁大学教授，直至去世。著有《中国总论》、《简易汉语教程》、《中国历史》、《中国地理》、《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等书，这些都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必备的书籍。

在《中国丛报》创刊号中，裨治文毫不掩饰地指出该报的主要宗旨和任务，就是要通过出版《中国丛报》，广泛了解中国各种情况，包括了解中国气象、土地、江河流域和出产等自然资源；了解中国商业的过去和现状；了解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如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等关系。因而，《中国丛报》辟有各目繁多的栏目，主要有宗教消息、书评、文艺杂谈、时事日志、近代中国介绍、中美关系、英国对华政策等等。

就内容而言，《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历史、地理、文化、气象等。就内容的分量而言，《中国丛报》又特别注重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它记载了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了许多如清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并提出了各种侵略主张。该报的发行对象为欧美各国政府及商业团体和在华的外侨，以及在南洋活动的传教士等，因而对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中美《望

厦条约》的一些不平等条款就是根据该报提供的情报拟定的。所以，《中国丛报》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该报还以大量篇幅翻译和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学、农业和科技例如，该报曾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介绍中国妇女的缠足，以及缠足习惯的起源、程度和影响；还登载过几篇讨论关于汉字拉丁化表音法的文章，并提出各种不同的汉字拉丁化的方案。

创办、学校也是基督教传教士举办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1839年创办的马礼逊学堂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它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创办，这也是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学堂的开始。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到1918年，基督教传教士共创办了约5000所学校，其中13所为大学，其余为中、小学，学生约20万人。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办学活动，以1877年为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877年以前，主要是小学，规模很小，大都附属教堂，具有“慈善”性质。例如，创办于1849年的上海徐汇公学，是徐家汇天主教堂收容因水灾流离失所的12名难童，供给衣食，开设读经班，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燕京大学的前身，通州潞河另塾就是由美国传教士江戴德于1868年招收几名小乞丐办起来的。据统计，在1877年以前，教会学堂只有360所，学生917人。1877年以后，学校逐渐增多，除小学外，中学和大学也相继出现。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教会大学相继建立。如比较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岭南大学和燕京大学都是在这时期建立的。而当时中国人自办的国立和私立大学只有8所

教会学校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来说，虽然主要是促进了西学东渐，但是，它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剑桥中国晚清史》曾记载说：“鸦片战争以前在教育方面最有名的尝试是1818年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它曾设在马六甲多年，

那里有大量华侨，而且比广州和澳门安全。基督教课程是每天的必修课。但是，英华书院的大宗旨（其成就平平）是双重的：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主要是英国）学者介绍中国文化”在后来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中，学校的课程包括三个方面：宗教课（还有各项宗教活动）、中国经书、自然科学知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主张用中文教学。他的理由是，一个中国人应该熟悉中文，如果中文不行，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就失去影响。作为传教人员要会读会写，还会用中文传授宗教道理，使听众明白，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决不是几年功夫可以完成的。一个传教人员对自己国家的语言很蹩脚，是很难发挥作用的。他认为应加强中文教学，不应该开英语。在他主持的山东广文大学和谢卫楼主持的华北协和学院，都没有开英语，到本世纪初才开设英语选修课。^①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外国注册，学位得到外国承认，学生可以直接升入与外国挂钩的大学，这无疑又增加了中外文化沟通的一条渠道。例如燕京大学的新闻系闻名于世，它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挂钩，斯诺曾在该系任教，在旧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新闻机构的驻外记者都是燕京新闻系毕业生。不仅如此，一些教会大学的汉学研究本身就有很高水平，使得这些教会大学形成了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辐射。例如，燕京大学出版《燕京学报》，1930年成立“引得编纂处”，编纂了60多种驰名汉学界的“引得”。

“汉学”又称“中国学”，专指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涉及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社会习俗以及自然科学等广泛的领域。鸦片战争前后，在西方汉学研究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以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需要为原动力，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为主要媒介，西方各国又一次出现研究中国的热潮。在英国，1823年皇

^① 参见《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四期第132页。

家亚细亚学会成立，并于 1834 年创刊了《皇家亚细亚文汇报》。1858 年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在上海设立，还出版会报。1876 年在牛津大学、1877 年在伦敦大学、1888 年在剑桥大学相继开设了汉学讲座。在法国，1818 年亚细亚学会成立。1825 年创办了《亚细亚学报》。1815 年和 1881 年，法兰西学院和东方现代语学校先后创办汉学讲座。在美国，美国东方学会经马萨诸塞州法院批准于 1842 年正式成立，并于 1851 年发行《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尔后出版《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翻译丛刊》。继 1884 年耶鲁大学开设汉学讲座后，1896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也开设了汉学讲座。在这股汉学研究热潮中，一批汉学家应运而生，在这批汉学家中，应首推理雅各。

理雅各（1815—1897），英国传教士，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杭特利城一个中产家庭。早年毕业于阿伯丁英王学院，1837 年投考希伯利神学院。在此他接受了系统的神学训练，并且从伦敦大学教授吉德学习汉语。两年后，他向伦敦传教会申请赴华传教，获准。1839 年 7 月，他带着新婚夫人离别伦敦，1840 年 1 月到达南洋马六甲，担任伦敦传教会在那里开设的英华书院的校长。他上任后，首先就是设法将书院迁到更靠近中国大陆的地方。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对于中国门户从此可向欧洲开放感到由衷高兴，并多方寻求支持。1843 年终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成为专门招收当地中国青少年入学的一所早期教会学校。

在中国办学和传教的经历，使理雅各逐渐意识到“如果想引起一个民族的注意，而不试图去了解这个民族，那将是一个悲剧”。^①于是，他决定把整个儒家经典著作译成英文，“以便使世

^① 转引自石源华主编《中外关系史三百题》第 67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界其余地区真正了解这个伟大的帝国，特别是使我们能够具有足够的知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从而获得持久的成绩”。^①正是基于传教目的，遵循“知己知彼”的中国古训，他早在 1840 年初就开始阅读中文本《论语》，1841 年编纂了《英语、马来语和汉语字汇》。英华书院迁港后，利用便利条件，他更加广泛涉猎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尤其致力于钻研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学说。他认为，“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他也认为，儒家学说与基督教义不乏相同之处，了解和利用儒家经典，可以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西方的上帝。根据上述信念，他制定了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庞大计划。

1861 年，理雅各翻译的第一部作品《论语》正式出版，此后 25 年间，《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英译本相继问世。他将这部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并详加注释的 22 卷巨著，取名为《中国经典》。这部巨著迄今为止仍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

这部巨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理雅各和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合作的结晶。王韬 1862 年因上书太平军，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后，即以理雅各为居停主人，过着“佣书”生涯。1867 年理雅各一度因病回国，为了不中止译事，特地资助王韬赴欧。1870 年两人又乘船同回香港，继续翻译工作。王韬的协助，使理雅各的翻译如虎添翼，他不厌其烦地为理雅各解释疑难，帮助理雅各撰写注释，王韬在国内时就是著书立说的人物，又有深厚

^① 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59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的儒学功底，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完全是得心应手的。理雅各盛赞王韬为中国“第一流学者”，王韬则对理雅各“注全力于十三经，贯穿考核，付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的科学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正是他们俩人珠联璧合的通力合作，使得这部巨著得以高水平问世。

1873年理雅各离开香港返回英国，这年他58岁，此时，他已成为享誉欧洲的著名汉学家。回国后，他一如既往积极倡导为了英国的政治、宗教和商务需要，加强对中国，特别是对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正是在他的努力下，1876年10月27日，英国第一个汉学讲座——牛津大学汉学讲座在伦敦谢尔登大剧场举行了开学典礼。理雅各因他在翻译中国经典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和广泛影响，被破例提名为第一任汉学教授，主持该讲座。在这个位置上，他一直工作到1897年离开人世，他始终没有中断汉学研究，先后发表《法显行传》、《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孔子——中国圣贤》、《孟子——中国的哲学家》、《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致缪勒函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帝》、《中国编年史》、《离骚及其作者》、《帝国儒学讲稿四篇》、《封建的中国》、《道德经》、《道教论》、《中国的诗》、《扶桑为何及在何处？是在美国吗？》、《中国古代文明》、《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诗经》（英文押韵诗体译本）等。此外，他还在各种场合进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学、人物评传、天文、社会宗教等方面的学术报告，培养了不少汉学家他与出使英国的中国官员郭嵩焘、曾纪泽等也有广泛的交往，并共同讨论过中国的经典。

此外，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推动或促进中国文化西传的著名传教士还有麦都思、郭士立、巴拉第、丁韪良、戴德生、林东知、樊国梁、李提摩太、卜航济、福开森等。

麦都思（1796—1857）——译朱赫斯，为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1835年抵广东，旋乘船北上，至山东、

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活动，不久回国。1839年，复来中国。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略军翻译。1843年被派至上海传教。1848年3月，与另外两名英国传教士非法潜入清浦县，激成清浦教案。1853年5月，在上海参与研究美国公使文翰从天京（今南京）带来的太平天国印书，译其全文，并加评语，写成概论，提出英国暂时应取“中立政策”，伺机而动。他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是著有《中国》。

郭士立（1803—1851）德国籍，英国传教士。一译郭实腊、郭施拉、郭甲利。1824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从该地华侨中，他学会了福建方言。1831年前多次来华游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随英军北上，任翻译兼情报官。英军相继占领定海、宁波、镇江后，他曾分别任该地民政长官。1842年在《南京条约》谈判中，他是英方三个翻译之一。后在香港任职。1849年返回欧洲，在英国、荷兰、德国、俄国、瑞典、奥地利、法国进行讲演，兜售其使中国耶稣化的计划。1851年死于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任上。他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有《中国史略》、《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道光皇帝传》、《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等，慕尼黑大学藏有其全部中文著作。

巴拉第（1817—1878）俄罗斯正教会教士。曾任第13届和15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领班修士大司祭，在彼得堡神学院毕业后不久，以修士辅祭身份随第12届俄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领班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到北京供职，在任期内晋升为修士大司祭。1849年率第13届驻北京传道团到中国。在任期间曾多次向沙俄政府提供中国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1855—1858年间参与签订《中俄璦琿条约》。1864年再次率领第15届驻北京传道团赴华，在此期间，曾到东北和蒙古地区实地考察并进行地形测绘与搜集情报，在北京负责出版研究中国

问题的定期刊物《汇报》。他对汉学和佛学研究有较深造诣，著译甚丰，如《从北京经满洲到海兰泡的旅行记》、《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佛陀传》、《早期佛教史略》。他在编纂《汉俄大辞典》时未及完成即去世，后由帕斯·波波夫续编出版。巴拉第成为俄国传教士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突出代表

丁韪良（1827—1916）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字冠西，号息三。184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大学，后转入新阿尔巴亚神学院攻读神学，毕业时他作了题为《传教士应利用自然科学》的演说毕业后受美国长老会派遣，同哥哥一起，于1850年4月，带着新婚刚满10天的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抵达中国后，首先在宁波传教。他在边传教边学习中文的同时，招收了40多名男童设立了两所私人走读学堂。为了进步在当地扩大基督教影响，他曾将部分《圣经》译为宁波土语。由于他刻苦学习，很快掌握了中文。1854年，用中文编写了宗教书《天道溯源》，出版后得到广泛流传，再版多次，并被译为日文和朝鲜文。1862年他携家到北京开辟了传教基地，在城内租地居住，并开设走读学校招收学生，培养教徒，只招到6名男生，他曾到河南开封调查那里的犹太人情况，是第一个到开封的新教传教士，并骗取了两部希伯来文经卷带回美国。他曾参加美国谈判使团，参与美国政府同中国的修约谈判活动。1865—1867年，他先后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和翻译教习，每年获得1000两白银的高薪。1869年11月，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推荐，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任期长达25年。1878年与林乐知等设立上海圣教书院。1898—1900年间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总教习。《辛丑条约》签订时，他主张各国在中国划定势力范围。1902年应张之洞之邀任武昌大学堂万国公法教习，后因该学堂未办成，于1905年卸任。1911年重入长老会工作。1916年卒于北京。他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写下了《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

人对抗全世界》、《中国之觉醒》等著作。

戴德生（1832—1905）英国传教士，中国内地会创立者。生于英国约克郡巴恩斯利，曾在赫尔和伦敦学医 5 年。1853 年受福汉会的派遣，先后在上海、汕头和宁波等地传教行医。1857 年向福汉会辞职，成为自立传教人。1865 年创立内地会，同年发表第一部著作《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吁西方的传教士来华。1866 年率 13 名传教士再次来华。1875 年 7 月他负责创办了《中国大众》。1905 年在长沙去世。

林乐知（1836—1907）新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字荣章，生于佐治亚州伯克县。1858 年毕业于埃默里学院。1860 年到上海，曾从王韬治汉学。1863 年在清政府创办的上海广方言馆任教习。1868 年，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广方言馆移入局内，他兼译书。同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因专谈宗教，销路不畅。1874 年 9 月更名《万国公报》，变为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在内的综合性刊物，读者多为高级官员。1882 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并任监院。1883 年《万国公报》停刊，1887 年加入同文书会工作。1889 年 2 月，《万国公报》复刊，并改为月刊，成为同文书会的宣传刊物，仍由其主编。中日甲午战争后，宣传维新变法。1907 年在上海去世。他所编著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中西关系略论》等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中东战纪本末》，收录了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文件，具体记述甲午战争过程，并加以评论。书中提出“弱肉强食”的论点，给人们以很大的触动，在当时广为流传，风行一时。

樊国樑（1837—1905）天主教传教士，法国人。1858 年加入遣使会，1861 年晋升神父。次年到中国，在北京北堂传教。1884 年慈禧太后扩建中海苑囿，要求北堂迁西什库重建。樊与李鸿章派的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会商，提出新址须较北堂基址宽广一倍等

条件，并索取重建费白银 45 万两，后减至 35 万两。1886 年樊与德签订迁堂条款，同年得清政府赏赐三品顶戴。1897 年晋升主教，任北直求教区有继任权助理主教。次年因交涉保定教案，结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清政府又赏赐其二品顶戴，时为驻京总主教。1899 年清政府在樊和法国公使毕盛的压力下，颁布《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五条，规定外国传教士在交涉有关民教纠纷时的政治地位同年返罗马述职，得到赞扬。1900 年回京时，他要法国公使从大沽口调水兵进京保护教堂。八国联军进京后，他在法国公使同意下，指挥教徒闯进礼王府、庄王府、立王府和李莲英宅等处，连续抢劫 8 天，掠夺金银珍宝无数，该年以胜利者姿态返回欧洲，被教廷誉为“宗座卫士”，法国政府授予其十字荣誉勋章。他著有《燕京开教纪略》和《樊主教日记》等，流传于西方。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传教士，字善岳，威尔士人。曾于哈佛弗德韦斯特学院肄业，1869 年由浸礼会派遣来华次年抵上海。先在山东布道，曾一度在东北地区调查。1877 年赴太原主办赈灾及布道，在此前后，结识了山东巡抚丁宝楨、山西巡抚曾国荃和张之洞、李鸿章他认为“只要改变了达官贵人的思想，其余的人就会像绵羊一样成群地跟着”。他建议“英国有必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学，主要的报纸，主要的杂志和一般的新读物。通过控制这些东西和控制中国的宗教领袖，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的头和脊梁骨”。1890 年任天津《时报》主笔，撰文鼓吹变法。次年任上海同文书会（后改名广学会）总干事，连续任职 25 年。他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及翁同龢也有联系，参加过强学会。曾向张之洞、李鸿章、翁同龢等建议聘请英美人士充当清政府最高顾问。1898 年光绪皇帝拟聘请其为顾问，后因变法失败而未就。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曾掩护康有为逃亡国外。义和团运动后，他提出由列强组织一个半为中国人半为外国人的

“联合中央内阁”。1902年又利用庚子赔款，要求山西当局设立山西大学堂，并由他任西斋总理。辛亥革命期间他支持袁世凯攻击中国人民觉醒运动。1916年回国，后在伦敦去世。他写了《留华四十五年记》，介绍在华期间中国国内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方面的一些重大情况。

卜航济(1864—1947)美国传教士。曾入纽约三一学院、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神学院等校学习。1886年来上海，任美国教会所办圣约翰书院英文教师。1888年任该校主任，同年8月，与华籍女子结婚。1892年返回美国为该校筹款。1905年该校正式更名为圣约翰大学，他担任校长，至1941年去职。著有《中国之暴动》、《中国历史概略》、《上海简史》等。

福开森(1866—1945)美国传教士，华名福茂生。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家庭。1886年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即来中国传教。1888年在南京设立汇文书院，自任监督(校长)。1897年受聘为盛宣怀在上海所创办的南洋公学的外国语文教习，后升任监院。他是美商慎昌洋行股东。1899年，他从英人丹福士手中购得《新闻报》，使长期控制，使该报与《申报》并驾成为旧中国的最大报纸。继而参与压制四明公所事件，帮助法租界、公共租界扩展界址，法租界因之辟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以酬其“功”。义和团运动时，参与盛宣怀等策划的“东南互保”，先后担任亚洲文会会长、华侨义赈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及刘坤一、张之洞和北洋政府的顾问。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时，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故宫博物院的“鉴定委员”，利用“庚子赔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基金”的津贴，聘请中国古文物学家，帮其编著《历代著录古金目》、《历代著录画目》、《艺术综览》等书，这些书中都用大量篇幅介绍中国文化，在西方具有一定影响。另外，他居留中国近60年，以传教士、教育家、新闻出版家、慈善家及文物考古学

家的面貌，来往于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掠卖了一些中国文物。

总之，西方传教士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大规模向外扩张的浪潮来到中国的。他们为了传教的便利，为了获得西方政府和中国教民的支持，影响中国民众乃至达官贵人，举办了各种文化活动，在这些文化活动中，有意或无意地向西方介绍或传播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内容。尽管这种介绍和传播有时也可能是片面的或是一些支流末节，但它毕竟在沟通中西方文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的确，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贯采取了敌视中国和中国民众的立场，甚至干涉中国革命，阻挠中国进步，或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向中国传播西学方面，从而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自然视为一种副产品，但是更多的还在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或早或迟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出于种种目的产生了“偏爱”，以至于最后老死于中国这块土地上，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博大和魅力，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绚丽光彩。

2. 来华官员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伴随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大批西方国家特别是英、法、美、德等国官员不断来华，他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殖民统治或政治奴役的过程中，也介绍了一些中国文化到西方，这其中有德庇时、威妥玛、麦华陀、瓦德西、西摩尔、福里等。

德庇时（1795—1890）英国外交官，汉学家。1813年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派委员会当职员，1816年随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到北京，充汉文正使。1832年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1833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成立时，任第三商务监督，旋升第二商务监督。1835年辞职。1844年璞鼎查离华，他被外务部任命为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同时殖民部派其为香港总督兼总司令。1847年4月，派英军突然侵占虎门，武力胁迫两广

总督耆英允许英人进入广州城。1848年去职回国，晚年居于布里斯特尔。他是英国的“中国学”开创人之一。著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中国见闻录》、《交战时期及讲和以来的中国》、《中国杂记》等，此外还翻译过几部中国的戏剧和小说。

威妥玛（1818—1895）英国外交官，曾在剑桥大学读书。1838年加入陆军，1841年参加鸦片战争。1843年任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翻译官。1852年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4年，英、法、美三国取得上海海关控制权后，被派任上海江海关第一任外人税务司，次年辞职。1858年任英国驻华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活动。1861年任英国驻华使馆参赞。1866年在英公使阿礼国授意下，向总理衙门呈递《新约略论》，1871年任英国驻华公使。1876年借口马嘉里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扩大英国在华侵略特权。1883年辞职回国，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并将掠得的大量汉文、满文图书赠给剑桥大学。在华期间，他曾编写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设立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这种拼写方法称“威妥玛式”，为过去所沿用。

麦华陀（1823—1885）一译麦特赫斯特，英国外交官。1839年随父麦都思来华。不久受雇于英国在华商务总监督与全权代表义律的秘书室，后成为英国侵略军全权代表璞鼎查的随从人员，参与侵占厦门和舟山的活动，并留在舟山担任口译工作。1843年受任为上海英国领事馆译员，1848年升为英国驻厦门代理领事，继往香港任商务贸易的中文译员。1854年11月担任福州领事，在职期间，参加镇压太平军。1865年为驻汉口领事。1868年复回上海任领事职。是年8月，扬州发生教案，他乘舰前往南京进行威胁，迫使清两江总督曾国藩将扬州知府撤职，赔偿“损失”，并在教堂前立碑，申明保护外国教会。1870年被委任为驻

上海的永久领事，1876年退休。在其著作《在远东中国的外国人》中，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一些情况。

瓦德西（1832—1904）德国陆军元帅，生于普鲁士的波茨坦，1850年入普鲁士边防炮队，1866年为陆军少校，1870年普法战争时任上校参谋长。1880年升少将。1882年晋中将，任德国副参谋总长，1888年继毛奇为总参谋长。1900年晋升陆军元帅，同年夏天，侵华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后，竞相争夺联军统帅之位，终为德国所得，他于这年8月启程来华，次月正式就任联军统帅。11月抵北京，指挥侵略军作战，次年6月经由日本回国。著有《瓦德西回忆录》，有中文节译本《瓦德西拳乱笔记》，它记载了关于瓦德西任联军统帅镇压义和团运动的部分内容，1928年由王光祈加以摘译而成，上海中华书局印行。内容包括：瓦德西所写日记，向德皇的奏议，德皇的函电谕旨、报告、其他函电及笔记等，共149件，时间从1900年8月7日起至1901年11月23日止，各件基本按时间排序，译者按语附注中，也偶有译日瓦德西在1902年所写日记或报告的内容，记载了八国联军在华活动，除吹嘘德皇和德军外，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罪行也有所揭露，对各国公使为了各国政府利益而争夺分赃的丑态，也不加掩饰他承认“拳民运动”中所表现的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入侵的“好战精神”的存在，表明人民群众“尚有无畏蓬勃生气”，而帝国主义之间又矛盾重重，因此，急欲瓜分中国“实系毫无益处之举”全书译文约12万字，为中国和西方研究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的有参考价值资料。

西摩尔（1840—1929）英国海军将领。他是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的侄子。1852年参加英国海军。1854—1856年参加英法对俄国的克里木战争。1857年作为中尉见习生，参加英法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2年在上海随军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回英国，后升为中将。1897—1901年任英国驻华舰队司令。

1900年6月10日，各国以保护北京使馆为名，由他率领一支由美、英、德、法、俄、日、意、奥八国军队组成的2000多人的混合部队，从天津出发，进犯北京。12月在杨村、廊坊等地受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被迫后撤，在北仓又受到义和团的截击，先后被歼62人，伤病312人，6月26日得到援军接应才败回天津。1901年回国，后升至上将，著有《我的海军生涯和旅外游记》，书中有大量在华时期的历史记载。

福里（1847—1933）法军军官。1860年进圣西耳学校。1868年加入海军陆战队。1884年为中校，次年参加法军在非洲上塞内加尔和上尼科尔的战争，1887年升上校。1890—1891年率法军在越南北部作战。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派往中国任八国联军法军司令。8月4日，率法军800余人随联军自天津出发，14日晚进攻北京，16日率法军及意奥水兵，解除法天主教堂北堂之围，后回国升任驻防巴黎的军长，著有《1900年在中国的战争》流传于西方。

近代来华的西方官员主要分为两部分，外交官和军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特点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在华经历的回忆和记录整理，二是对中国文化财富的掠夺和贩卖，真正系统地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和介绍是很少的，他们是站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这就注定了在他们意识的表层和深处，带有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动传播者。

3. 西方人对中国艺术品的掠夺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掠夺集中表现在对圆明园和敦煌文化的掠夺上。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48年，即1709年。这一年，康熙将明代皇戚的遗园赐给第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并亲自命名和题写了匾额：圆明园。雍正即位以后，决定把圆明园建成“避

喧听政”的地方。在园内，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勤政采贤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雍正开始在此办理朝政。从此，圆明园成为仅次于紫禁城的政治活动中心。乾隆时期年年营建圆明园，他在位 60 年，先后六下江南，搜罗天下名胜，命人在园内一一仿造。他又下令在圆明园的东面，拓建长春园，以备自己退位后养老之用；在圆明园的东南面，拓建万春园，作为皇太后居住之所。圆明园三园的布局基本确定下来。从康熙到咸丰的六代帝王，用了 151 年的时间，把圆明园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式与风景式交融的“离宫型皇家园林”。它既有北京之古风，又有江南园林之秀韵，更兼其中西庭园合璧的风采。全园占地 5200 余亩，方圆 20 多华里，比现存的最大皇家园林——颐和园还大 850 亩。它的建筑面积达 16 万平方米，超过故宫 1 万多平方米。圆明三园有 100 多个风景点，宫殿楼阁 140 多所，亭台碑碣、桥廊水榭难以历数。园内珍藏着许多中外古今的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铜瓷古玩，例如，乾隆年间历经 10 年，组织全国儒生而辑成的 3457 部 99071 卷的《四库全书》就在其中。所以，圆明园堪称人类文化宝库之一。

“斯园胜概疑天造”，这是中国人对圆明园的赞美。西方传教士称它为“万园之园”，认为它“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和它们比拟”。^①法国文学家雨果这样写道：“把我国各大教堂的宝藏会集在一起，也是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而辉煌的博物院的。”^②

然而，圆明园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英法侵略者的野蛮劫掠和焚毁。

^① 齐思和等编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 41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② 转引自《清王朝的覆灭》第 101 页，学林出版社 1984 年。

英法侵略军于 1860 年 10 月 6 日进入圆明园，抢掠是从 10 月 7 日（星期日）一大早开始的侵略军涌向园内的各个角落，奔向宫殿、楼阁、馆厅、书屋，他们“头碰头、手撞手，在搜寻和强夺里面的物品”。“他们全部闹哄哄地，逡巡而上，扑向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园里多年收藏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精美物品，珍贵文物，被洗劫一空，“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時計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①“这人也也许喜欢景泰蓝的宫瓶，那人或者贪恋一件绣花的长袍，也许又有人念及将来的时候，就挑选一件皮大衣。”^②英国军官赫里斯第一次抢到一簇金花盆，盆中栽着一株高一英尺的黄金树，树枝上挂着许多蓝宝石的果子，他将这个金花盆和其他宝物，装了七大筐，归为己有。第二次，他又抢到一座七英尺高的金塔和大批宝物，找来七个士兵，才搬回兵营，单这一座金塔，就价值 2.2 万英镑。有人抢到金条子、金叶子、金佛像、镀金香炉。“堆积如矿山似的财宝和园内各种珍奇物品，陈列在法军面前，任其肆意抢劫”。“每人背着一个大口袋，内中充满了他所喜爱的各色各样的物件”。

侵略军抢到的奇珍异宝，有的现场拍卖，有的带回国去贪为己有或作为礼品赠送他人。当时的英国军官赫里斯讲道：“我看见华尔怀里抱着一个盘膝默坐的大佛像，从佛像的重量上我直觉出它是金铸的，立刻告诉华尔……几天后，华尔终于把他的金佛

^① 《北京的和平》，《泰晤士报》1861 年 1 月 14 日，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217 页。

^② 齐思和等编者《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 40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像卖给一个随军贩卖酒食的犹太人……”^① 一位随军牧师写道：宫殿重门洞开，任人抢劫。这一匹一匹的绸缎大为印度士兵们所注意，就用大车将它们运走。他们在营盘中售卖这些绸缎，起先 2 元钱一匹，但是不久就提高了价码，从 10 元到 20 元，高低不等。颜色和质料千般百种。英国皇家炮兵队队长那以斯回忆道：许多美丽的装饰物，都陈列起来进行出售。一个黄色的中国式小茶杯，就卖到 22 金镑。我买到几块美丽的宝石，还有一个最精美的碧玉项圈，上面还镶着红宝石呢！这是一位著名的鞑靼酋长贡呈给清朝皇帝的。我仅仅花 50 块钱就买到了，好像没有人喜欢这种装饰品似的。我还买了一块蓝色的宝石，雕镂得很是精致。另外还有两个美丽的大瓷瓶，乃是游吉普罗宾所交来的，样式非常好看，我请求他和奖品委员会，允许我将这两个瓷瓶送给女皇，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他还说，当时售出的款项，总计 8000 金镑，还有法人交给我们的 1.8 万镑现款。

由于抢劫的时间很短促，因此不能仔细地鉴别，许多金质东西被误认为黄铜的而毁坏；有些珍奇的手抄本被当作“废纸”，“用为燃点烟斗的火具”。当英法侵略军抢劫完毕，由圆明园向北京城内开拔时，英国远征队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马都是满载的；法国侵略军载物品的车队，从排头出发到队尾起劲，用了整整一个小时。侵略军的炮兵所抢珍宝、细软之物最多，他们有马匹、车辆，甚至炮管里炮身上塞满了珠宝绸缎。他们一边抢劫，一边装运，圆明园内外满地是衣物、丝绸、玉器、瓷器，还有大批文物被践踏和破坏。许多精美的时钟和象牙雕刻被他们塞进车辙，再用车轮辗轧。从圆明园到军营，沿途都是被践踏得一团糟的丝绸和各种珍品。

英法强盗抢劫将近 40 年后，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圆明园又

^① 1912 年版《中国詹姆》。

屡遭掠夺，同治、光绪年间的陈设被洗劫一空。

西方列强到底从圆明园抢走了多少宝物，是无法计算的。据不完全统计，仅法国侵略军回国后奉送给法国皇帝的部分“礼物”就有：两端镶有大块玉石的金杖两根；约 400 公斤重的鎏金怪物像两尊；皇帝穿的新龙袍一件；做工精细的窗帘两卷；戒指、酒杯、漆器、瓷器难以计数；珍奇古玩近万件。在巴黎东南约 70 公里处，有个叫枫丹白露的地方，1863 年拿破仑三世专门在这里建一个中国馆，将从圆明园抢劫来的上千件珍贵文物收藏在这里。有商周朝代的青铜器、明清朝代的瓷器、明景泰蓝薰炉，还有各种玉雕、如意、丝绣、大象牙等等。此外乾隆玉玺、玉印、金佛、翡翠、玛瑙、珊瑚、水晶、漆雕等数不胜数。收藏在法国巴黎博物馆的圆明园全景的彩色巨幅画图，于乾隆初年一直悬挂在“九洲清晏”西边的清晖阁的北墙上。绢本彩色的圆明园四十景图、乾隆所作各景题咏 40 首共 80 幅珍贵文物，现在则收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圆明园的文物珍宝有相当多也聚集在英国。在同治、光绪年间曾在清廷任职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一书中记述了 1866 年 4 月 4 日他在伦敦目睹售卖圆明园文物珠宝的回忆：“至一处，内极广阔洁净，见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售卖。”这些物品包括皇帝的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还有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等。

圆明园的文物也流失到了美国。乾隆心爱的《耕织图》现在在美国。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在纽约博物院所收藏的“中国宫内器物最多”，而“得自圆明园之役者半”。1987 年，被当年英法联军砍下的十二生肖铜质喷水猴头、猪头雕像（后被带回欧洲），在美国被拍卖。

不仅如此，圆明园里大量艺术石雕，除西洋楼残留一点石柱以外，大都流失到国外。

据《泰晤士报》在北京的记者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 600 万镑”^①

敦煌是我国古丝绸之路的一颗璀璨明珠，早在 2000 年前的西汉时代，这里就成了著名的国际都市，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汉朝统治者向边地大量移民，仅公元前 119 年一次就移民 70 多万人。这样就使得莽莽沙漠中的一块小小的绿洲，终日人群熙攘，各国商人来往不断。当时印度佛教已开始传入我国，汉魏之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状态的这一社会背景及其所造成的人们的心态成为宗教滋生和发展的温床，佛教因之广泛地流行起来。366 年（东晋太和元年），反映这种文化的石窟寺——莫高窟在这块开凿了。魏晋以降，经过千年努力，这块弹丸之地已建有 400 多座石窟。石窟中不仅有精美佛家塑像，而且有瑰丽的窟檐装饰，丰富浪漫的壁画，由于沙漠气候特有的干燥，至今被保存如初，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罕见的瑰宝。当然，敦煌文物的贵重还不止此，大约在 1049 年以后，敦煌被西夏统治时期，莫高窟的和尚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在绢上的佛像、织绣、杂书等都放进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外面筑起一道泥墙封闭起来，画上菩萨像。这样，大批文化典籍被秘密隐藏起来，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 1900 年，住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国霖，因为修理洞窟，在洞窟主群北头相近的甬道边的一堵壁画墙的裂缝处，发现一个用泥封住的小门。打开小门，里面是一个三公尺见方的复室，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拓本、写本和印本的图书丝织物、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词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大约 4 万件左右的文书典籍，包含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关宗教、历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文化

^①转引自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217 页

史上的重要发现。

但是，到了近代，敦煌文物遭到了外国探险家的恣意掳掠。其中，最主要的有五次：

1905年和1914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鄂登堡分别来到敦煌，弄走了数目可观的文物、经卷，并剥走了一批壁画和彩塑。

1906年5月，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到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后，便假借考古之名，窜到敦煌，仅以一笔很少的“功德钱”“捐给”庙里，买通了王道士。这样，斯坦因花了7夜的功夫恣意挑选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从1907年起，他先后去过莫高窟5次，以几乎同样的手法骗取文物。例如，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莫高窟，用500两银子向王道士“买”了600多卷佛经。据统计，他先后窃去织绣品150余方，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印本、写本等6500余卷。所有这些文物，都被运到了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英国政府为表彰其盗宝之“功”，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

1908年7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助手奴奈特来到莫高窟，用50银元贿赂石窟管理人员，伯希和凭着懂得汉文，把斯坦因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藏入国民图书馆。他还偷拍了全部洞窟的壁画，并将各个石窟编了号，因为这是带不走的文物。

1911年10月，以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为首的日本探险队到达莫高窟，住了4个月。为了窃取宝物，他们佯装与王国策促膝恳谈，终达目的。其中，吉川小一郎得了100多卷写经、两尊精美塑像，桔瑞超得了360多卷写经。

所有盗宝者中，美国的华尔纳手段最卑劣。他于1923年到达莫高窟，当时，石窟文物已空，他把预先制好的特殊化学胶布贴在选好的壁画上，用加外力摩擦的方法，将壁画贴印在胶布

上，先粘去了莫高窟中 139、141、144、145 号等洞窟中 26 方珍贵的唐代壁画，计 32006 平方厘米。他还用利刃铲去了其他几方壁画，搬走几尊神采飞扬的唐代塑像。华尔纳后来还想再次到华继续这种活动，并计划剥离西魏石窟中的一方画工十分精美的大型壁画，因遭到中外人士的一致谴责而未得逞。

外国探险家之所以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从我国掠去这么多稀世瑰宝，主要是因为当时清王朝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家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使得这批文物没有得到严格保管，任其散失，以致本国的专家都没来得及研究它们的真正价值。清末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得知“藏经洞”发现后，认为很有价值，建议将洞中文物全部运到省城兰州保管，但因运费一时难筹而未能运走。1904 年 3 月，甘肃省下令敦煌县衙清点这批东西，并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暂为保管。此事就此搁浅。由此可见，清政府对文物的不重视，给外国探险家以可乘之机。

敦煌文物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首先，敦煌石窟所发现的艺术文物，在中国文献文物史上确实还未曾有过。像汉代孔壁遗文、晋代汲冢竹书、殷墟甲骨发现，都不能和它比拟。敦煌的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年代久远，写本部分的年代从公元 5 世纪到 10 世纪，即北魏到宋初，有 5 万多号，艺术品也不下 1000 件。其次，敦煌艺术文物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据计算，如果把 492 个洞窟的壁画展开有 4.5 万平方米，连起来长度可达 30 公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北魏壁画色彩沉着浑厚，立体感很强；隋朝壁画线条流利活泼；唐代壁画则更多的是描写现实社会生活，如《张汉潮夫妇出行图》，长 16.40 米，高 1.20 米，绘有牛、马、侍卫和杂技、歌舞场面。莫高窟中保存了许多古注的《老子》，有久已不存的古本隶书《尚书》，有笺注详细可供后人校勘的《诗经》，有亡佚的文学作品如韦庄的《秦妇吟》长诗，有《大乘四法经论》、《佛说延寿命经》、

《萨婆多宗五事论》等久已失传的佛经，以及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户籍、账册、契据、信札、状牒、祭文、医卜等，涉及范围极广。第三，它提供了我国历史上重大创造发明的真实标本。敦煌所出六朝写本表明离蔡伦造纸不过二三百年来，造纸业已达惊人水平，这些文本纸页洁白坚韧，技术令人惊叹。敦煌文物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刻版精细的印本书也表明当时我国印刷业已十分高超。因此，敦煌文物的大规模被盗窃及流失，实是我国文化史上的悲惨一页。

历经劫难，敦煌文物损失是惊人的。其中，北魏到北宋的写本就有 2 万多卷，包括佛经、道经、摩尼经、诗赋词曲、小说、地方志、信札、户籍、账籍、各种借贷契约、历书、医书等。此外，还有绘画、织绣等工艺美术品 1000 多件。这些文物的丧失是令人痛心的。

4.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人，主要有三部分：饱读经书，经过科举“正途”而跻身朝上行列的驻外使节；长年居留国外，但时刻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出于求知求学的目的到国外进行考察游历的官员和文人学者。

到了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已处于一种低势能的状态，因而，这时中国人向西方传播的中国文化也就只能集中在了道德伦理、诗词曲赋、典章经书等方面了。

1866 年以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为向导，由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的德明（张德彝）、凤仪和法文馆的彦慧一行 5 人，赴西方游历，这是经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亲自去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他们耳闻目睹了西方文明，也或多或少地传播了中国文化。当西方人向斌椿“询问大中华，何如外邦侈”时，他“答以我圣教，所重在书礼；纲常天地经，五伦首孝

梯”。^①在出国的船中，有一位日耳曼乘客请张德彝题中国字，他“磨墨草诗二章赠之，其人大喜，如获拱璧”。王韬到西欧后，喜欢交结学士文人，如所遇法国博士儒莲“足迹虽未至禹域，而译书已裒然盈尺”，“通中国文字，能作笔谈”；不仅如此，王韬还和“通中西语言文字之学，精于时人家言”的苏格兰牧师湛约翰讨论《春秋》朔闰和日食记录《漫游录·伦敦小憩》中访问牛津大学的记载，对王韬在英国宣传中国文化作了细致描述：“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监院者特邀余往，以华言讲学余备论中外相通之始言：……三百年前，英人无至中国者；三十年前，中国人无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视中原如堂奥，无他，以两国相和，故得至此。……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其中肄业生年长者……特来问余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若何？余应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源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在这里，很明显，王韬丝毫没有自卑感，而是在“素著名望”的英国最高学府里坚持了“中国之道”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旅欧期间，他曾有机会和外国学者讨论东方文化。如法国立瀚（里昂）“东方会堂”即邀郭氏入会，并请其准备论文，题目之一为“中国孔子之前何教？老子学问与今道上绝异，何以道上皆宗老子？”郭氏为此做了认真准备。这类接触，都有助于郭氏对中西文化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和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以“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而自称的容闳。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多，但在命运转折处的十字路口上，中华文化对他的影响立刻表现了出来。当容闳要报考

① 中华书局编《走向世界》第71页，1985

耶鲁大学时，他坚决拒绝了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为他安排的使其成为传教士的前途。他写道：“予虽贫，白首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大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在这简短文字间所流露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强有力的传播。

在近代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过程中，还有一个著名人物辜鸿铭。他是福建厦门人，名汤生，1857年生，自幼留学英国，复遍游德、法、意、奥等国，精于欧洲语文。他在30岁时回到国内，曾为张之洞、周馥的幕僚，后任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推尊孔子学说，曾把《论语》、《中庸》等译为英语，并以英语撰《尊王篇》、《春秋大义》等，对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上述只是局限于精神文化的传播方面，那么，1876年中国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则突出了物质文化的传播。中国此次参展的展品有720箱，价值银20万两。美方由于事先估计不足，不知道中国会有这么多物品参展，所以安排给中国的参展场地较小，“颇不敷用”。中国展区在展览大厅的西门内，左有智利、秘鲁，右有日本、埃及、土耳其，对面有意大利、挪威、瑞典等国。中国展厅建有木质大牌楼一座，上面大书“大清国”三字，牌楼两旁有东西辕门，上插黄地青龙旗。整个建筑颇似于国内的官府衙门。根据德璀琳的建议，牌楼上还题有对联，横额是“物华天宝”，左右联是“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中国参展的物品几乎都是手工艺品，如绸缎、牙雕、玩物、银器、瓷器、漆器、绣品、镜屏、各式乌木椅榻、宁波雕

木器、古玩、字画等等。中国展厅的展品都按中式陈列，即使像陈列物品用的木架、橱柜，以及桌椅铺垫等都“悉遵华式”制造。纯粹地道的中国风俗，“悉为他国游览官民日未经见，无不赞叹其美，且云今而后，知华人之心思灵敏，其有过于西人者也。”除手工艺展品外，中国参展的物品还有由海关经办的丝、茶、药材等传统出口物品，展出的药材不下 700 种，丝、茶也各种具备。在博览会上，中国的展品最受欢迎的有茶、瓷器、丝、绸缎、雕花器、景泰蓝等；铜器、漆器、银器、藤竹器次之，而玉器几乎无人问津。通过此次参展，扩大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

此外，中国文化在西方影响的扩大也同近代一些政治风云人物的传播有关。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在为保皇摇旗呐喊的同时，也宣传了一些中国文化。康有为撰写了《爱国歌》和《爱国短歌行》。《爱国歌》热情讴歌了万里神州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赞颂了伟大祖国的可爱，激励同胞只要齐心发愤，就可迎头赶上世界列强。后来，由于感到歌词太长，难于记忆传唱，便把《爱国歌》浓缩为《爱国短歌行》，歌词凝聚着作者对祖国一草一木的无限热爱，对祖国腾飞的坚定信心和急切期望。歌曰：“神州万里风泱泱”，“地大物博冠万方”，“我祖黄帝传百世”，“大地文明无我逮”，“我人齐心发愤可突飞”，“舞破大地黄龙旗”。这两首歌对启发华侨的爱国思想，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起了巨大作用。因为这些华侨长年居住在西方国度，这些歌曲在华侨中的普及传唱，无疑也增进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在此之后，胡适留学美国期间，“他各处讲演，谈论中国民族文化”，^① 不仅如此，他的博士论文以《中国古代名学方法之

^① 《胡适之评传》第 36 页，南海出版公司 1992 年。

发展》为题，指出古代中国实用哲学批判标准的应用，这就向西方粗线条地传播了一些中国文化中古代的哲学思想。

二 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

1. 韦尔斯《世界史纲》对中国的评价

韦尔斯首先对中国的早期历史进行评述。他写道：“我们对中国的考古学所知很少。石制的工具曾经在中国各地发现过，河南和满州的发掘，使我们对世界这部分地区的石器时代的文化有所了解。”中国的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公元前 2000 年见于史册的中国文明乃是南北文化之间长期冲突、混合、交流的结果，而南方文化可能更早一些，发展得也更高一些。“商（公元前 1750—前 1125 年）和周（公元前 1125—前 250 年）是古代的两朝朝代。这两个古代王朝的青铜器皿既美丽又壮观，各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至今还存在着，而且毫无疑问，甚至在商朝以前，一种很高境界的文化早已就存在了”。

韦尔斯在书中还专门对汉字进行评述。他写道：“中国汉文是一套非常特殊而又复杂的符号文字。有大量的字需要记住，而且必须习惯于它们的用法。它所具有的表达思想和议论的能力，至今还不能拿西方的标准来计量。……在中国，文字造就了一个特殊的读书人阶层，也就是官吏。他们也就是统治和官僚阶级。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古典文学格式，胜过于集中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它的人民的个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看来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其次，他还对中国文明发展及官吏制度进行评述。他认为“在中国，我们见到一个社会体系沿着另一条与印度和西方文明所遵循的不同而只在大体上平行的路线进行着。中国文明比起印度教文明更是以和平为目的而组织的，武士在社会体制中所起的

作用很小。同印度文明一样，中国的领导阶层是一个知识阶级……官员是中国的读书人，不是一个种姓，因为官吏不是靠出身，而是靠教育”。这就使中国的官员具有从刻苦的脑力劳动中获得的精力。“但是，他所受的教育几乎全部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学究式的学习，因此他的影响几乎完全是保守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它的一套，直到 1900 年它还在这条路上迈步。入侵者来来去去，朝代不断更换，但这黄种文明的生活常规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第三，对中国的汉朝和唐朝进行评述。他认为，汉朝和唐朝“都是类似的盛世”，这期间经历的 400 年的分裂，是动乱的时期，而不是根本改变的时期。“中国的分裂被认为只是政治上和疆域上的，而且因为这 400 年的告终和开始一样，中国在亚洲据有大致相同的地位，是仍可辨认的中国，仍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字和共同的主要思想”。‘中国世界的社会崩溃，从来没有像欧洲世界那样地彻底。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很多区域里苦心经营的生活艺术仍能进行。这里的清洁、装璜、艺术和文学产品并不像我们不得不谈到的西方那样完全退化，也没有像欧洲那样放弃了对优美和快乐的追求……中国在六世纪就开始饮茶。中国诗人愉快地写出第一杯、第二杯和第三杯茶的味道等等。中国在汉朝衰亡以后很久还继续产生优美的绘画。在二、三和四世纪中，有些最优美的风景画可以称为人类空前的杰作。许多美丽的瓷瓶和雕刻品继续出产。精巧的建筑和装饰也继续进行。木版印刷大约与饮茶同时开始，在七世纪还有显著的诗歌复兴。”

第四，对清代中国文化进行评述。他认为，中国的清代是一个文学昌盛的时期。中国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堪与欧洲相当的作品媲美，但又独具一格，在风格和情趣上达到了高水平；中国的戏剧也有重要的发展。此外，还创作出了很多优美的山水画，套色版发明了，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学会了铜雕，而且中国瓷器的制

造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韦尔斯在这部书中，重点评述了中国文化及其发展。他认为，唐初诸帝时代，中国的温文有礼、文化腾达和威力远被，同西方世界的腐败、混乱和分裂对照得那样地鲜明，加之由于迅速恢复了统一和秩序，使得“中国确实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了领先的地位”。只在一千年以后，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了美洲的发现，有了西方印刷书籍和教育的传播，以及有了近代科学发现的曙光，西方世界才开始再次走在中国的前头。然而，“在唐朝，中国的极盛时代，其后又在优雅的、却颓废的宋朝（960—1279）以及又在文化很高的明朝（1368—1644），中国呈现了繁荣、幸福和文艺活跃的景象远在任何同时代国家的前头。”

韦尔斯认为“同世界的任何地方一样，中国也有不少孤立的观察、创造和发明”。中国人在六世纪就知道火药，他们在欧洲用煤和煤气取暖以前的几百年就在他们的地方上用过这些东西；中国的桥梁建筑、水利工程都是值得羡慕的；表现在中国搪瓷和漆器上的物质知识非常广博。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阻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包袱，“中国过去巨大的成就，早期的繁荣和普遍的满足必定使我们人类中那个国家的人都把自然的自满和守旧思想都看成正当的了。……十九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少能引起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他们自己的文明一般优越于世界其他各处的文明，发生过任何认真的疑问，因此显然也没有任何改变的理由。”因此，尽管中国产生了大量美丽的艺术，一些优美的诗歌，令人惊叹的烹调法和世代相传几亿人民的光辉愉快的生活，但它始终是一个许多小生产者的国家，各种人手都需要，还可以被吸收到古老的祖宗传下的农业工作中去。这也就使得“从唐朝起，中国文明虽然缓慢而稳定地传入了安南、柬埔寨、暹罗、西藏、尼泊尔、朝鲜、蒙古和满洲，但在文件的记载上却只是版图的进展而已。公

元七世纪的中国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文明化了的民族，就像他们在一千年后一样。”

在中国众多的文化名人中，韦尔斯突出称赞了孔子，他写道：“别的民族从来未曾通过举止礼貌的渠道去取得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然而孔子的方法在中国无论如何却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讲求礼貌和自我约束的普遍传统。”

2 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

首先，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初，耶稣会上向欧洲介绍中国，其本意在于宣传中国是传播“福音”的理想之地，动员更多的传教士来华，并为他们在华活动募集经费。可是，当时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这场运动以反对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而中国儒家经典中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以及以“理”为天地万物最高与永久法则的观念，与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多有吻合之处。耶稣会上报道的中国康熙年间安定繁荣的社会景象，也恰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中国成了启蒙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国度，孔子成了欧洲思想界的偶像，德国的古典思辨哲学家、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学派等，纷纷从中国古典经籍中吸取养料，促成了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

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创始人莱布尼兹早在 21 岁时就读过有关孔子的论著和传记，与到过中国的耶稣会士闵明我、白晋有过交往，曾将白晋所撰《康熙传》译成拉丁文，对中国有较多的了解。1697 年他在所出版的《中国近事》中云：“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在军事方面，中国亦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他又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

族存在，现在的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我几乎相信，中国应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哲学的宗旨与实行，好像我们派教士教他们由神启示的哲学。”他的这些思想对他的弟子佛郎克、华尔夫以及再传弟子康德等均有影响。路德维希作《莱布尼兹哲学发展史》，强调“研究莱布尼兹与华尔夫之世界观，必先研究柏拉图与中国哲学”。

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霍尔巴哈、伏尔泰、波维尔等对中国古典文化都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中国”一条下，介绍了自古代至明末的中国哲学，认为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中国儒教“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指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否则便会出现危险。”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联的国家只有中国”，伦理道德是中国的“唯一宗教”。公然声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伏尔泰对中国文明更是推崇备至。在这个时期他创作的哲理小说《查第格》中说，中国的“理”或者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① 他推崇孔子“全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② 他的书房挂着孔子画像，下面题着四句颂诗：子所言者皆理性，实乃贤者非先知。天下不惑心则明，国人世人皆笃信。伏尔泰还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骂理性和自然的教条”。^③ 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中国“应赞美、惭愧，尤其应模仿”。伏尔泰对于中国伦理型文

① 《伏尔泰小说选》第 31—33 页。

② 《伏尔泰全集》第七集第 330—331 页。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化的巨大精神力量同样颇为注重。他曾仿照元曲《赵氏孤儿》编写了诗剧《中国孤儿》，剧中崇尚武功，企图以暴力取胜的成吉思汗，最后折服于崇高的道义。伏尔泰在这个诗剧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证明，它体现了理性与才智对盲目和野蛮的力量具有自然的优越性。”波维尔对中国社会景况十分景仰，他认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①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因在 1767 年发表了《中国的专制制度》而被誉为“欧洲的孔子”。在该书导言中，他断言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中国皇帝是合法的专制君主。因为中国文化制度一切以自然力为依据，虽皇帝也须守此大法，受天理支配。在《自然法则》一书中，他将中国奉为按自然法则建立国家的主泉。他提倡以农为本，对中国长期奉行的重农轻商主义极为赞赏，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他在充任御医时，还极力鼓动法王路易十五于 1756 年仿效中国皇帝行“藉田”礼。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启示，他提出了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重农学派政治上的领袖、担任过财政大臣的杜尔哥曾与两名留学法国的中国修士高类思和杨德望有过交往。在他们回国时，杜尔哥特地并列了一份列有 52 个问题的详细提纲，委托他们协助调查中国的土地、资本、劳动、地租、赋税等状况。

与欧洲启蒙思想家海绵般汲取中国文化营养的同时，17、18 世纪的欧洲社会，特别是法国，也因耶稣会士的介绍与中国、西欧间贸易的蓬勃展开，而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的欧洲流行中国的茶、丝绸、绣品、瓷器和漆器，在艺术样式上，以中国艺术为泉源的罗柯柯风格大为盛行。

①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 82 页，商务印书馆 1962 年。

其次，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从一些简短的记载上也能看得出来。张德彝在法国游历时，有一位叫茹良的“法国翰林”，“读华书三十余年”，虽然不懂得发音，但是已经“识字之义”，并且翻译了许多中国书，如《四书》、《礼记》、《三字经》、《千字文》和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他们还看到有的人家，满屋陈列着中国的字画文物，悬挂着北京正阳门大街、东四牌楼、桂芳斋糕点铺等地的照片，“大皆盈尺”。在俄国，有一位家境清苦的老学者，“能翻写满汉文字，极其精通”。又“善华言”，也请中国客人到他家喝茶、吃饼。在日本，见税关二位年轻日人读《桐叶封弟辨》。又有一同船日本医生能作汉诗，“殊清雅可喜”。双方语言不通，但可用古汉语笔谈。“询伊曾到中土否？伊云：‘有志未逮，以阮囊羞涩故耳’。”在纽约藏书阁，见有英译《康熙字典》、《汉英合璧字汇》，又有《中华风土记》二册：“图画精细，注解详明，如拜佛诵经，婚嫁宴会，耕樵歌唱，以及儿童玩具，靡不完备”。在伦敦，见到一种中文报纸名《飞龙报》，内容有“国事人情，地图景致”和广告，“镂版细致，刷印精工，而文法不甚佳，盖精通笔墨者所撰也。”同治八年六月初二日在巴黎，见侯爵德理文家中收藏中文图书甚多，并“延川省李某为记室”，将《离骚》、《原道》翻译成法文。前一日在巴黎观剧名《茶花儿》，“男女装饰如粤人，屋宇器皿亦如粤式”。^①同治七年四月十二日，在美国国务卿徐尔德家，见到和硕恭亲王（奕訢）和总理衙门各大臣的照像与各国国王、王后的照像挂在一起。七月初三日（1868年8月4日）使团到达波士顿时，更是盛况空前，据记载：“城内外周游六十余里，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男女开窗眺望，免冠摇巾，击掌飞花，口呼‘贺来’。有举中国雨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有铺红被列烟具瓷盘于

① 《走向世界》第104页，中华书局1985年。

窗下者，有戴中上秋帽者……总之，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背、攀树登梯者。”翌日，“通城商贾工匠，入堂参谒中国钦差。钦差立于正面台上，台之左右有阶，左升右降。……自巳至未，升台谒见者已有五千余人，而台下立待者仍不减少。”五月八日在纽约一家香水厂见到中国专销的香水，“上罩银箔，下粘局票二。一系白纸，印有五彩水花洋字，一系红纸，金书华字三行：

“孖梨烟 林文付流梨地

上品花露水发客

奴约林文焜监制

笔画端楷，似经华人代写所谓‘孖梨烟林文’者，局东马利与兰满之名也；“付流梨地”者，香水名也；‘奴约’者，纽约也。”

在日本，也有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和王后结交成朋友的冈千仞是著名中国游记《观光游记》的作者，竹添光鸿游历四川写下了《栈云峡雨日记》，增田贡著《清史揽要》，此外，还有些汉学著作在日本出版，如《明清八大家文》、《韩非子纂诂》、《左传辑释》、《西河析妄》等。此外，本多正谏著《清史逸话》这些说明，日本人在明治时代即已注意对中国现况进行研究。

如果说，在近代，汉学研究在西方形成一种热潮，学习中国文化也形成了一种风气。在日本，有好学少年叩门求见王翁，“操笔纵谈，久之不去”；两京著名女史湘烟、花蹊诸氏，呈诗请改或托人求教，的确可算一时之盛。

第三，中国艺术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代表作《蒙娜丽莎》，即采用中国山水作为背景。此后，盖华德·马普所作《圣安东尼之诱惑》，也含有中国绘画的笔意。

17世纪初，中国的轿子已传入欧洲。路易十四时代，轿身

用漆绘有牡丹、芍药等中国花卉纹饰的轿子被巴黎人士视为最时尚的物品，乘轿者多为贵夫人。与中国不同的是，法国人不用肩荷，而用手抬轿子，因而轿子在法语中被称为“抬椅”，莫利哀的喜剧就出现过这种抬椅。

17、18 世纪中国的扇子西传后，法国宫廷中的贵夫人不论冬夏，手中所持的已不是上一世纪流行的羽毛扇，而是中国式绢制聚头扇，又称折叠扇。此后，欧洲建筑中也出现了“扇形窗饰”、“扇形气窗”、“扇形穹窿”等。

17 世纪中叶，福建漆器便在英国时兴起来，有的直接从中国运去漆器原件，有的将大块漆板运至英国再加工成屏风；还有的将家具运至中国，上好漆后再运回英国。家具制造商也纷纷仿造中国漆器家具的图案和色彩，打制刻有龙、塔、佛像、花草的中国式家具。

在欧洲，以华瓷作为装饰品和日用品的风气极为盛行，法国人用“塞拉冬”称呼来自中国的青瓷，英国人则用中国（China）泛称瓷器，德国白制的白瓷上，往往以欧洲的透视法作中国的风景与人物画，有时也摹写一两个汉字，只是常出错误。18 世纪以后，瓷器进一步进入普通家庭，欧洲各国也开始仿效华瓷建立自己的制瓷工业。

中国的手绘壁纸传入欧洲后，成为崇尚中国风格不可或缺的室内装潢，英、法等国都曾仿制各色壁纸，其图案多仿中国的花鸟及山水画，中国绘画艺术供西人欣赏、摹仿的机会也因此增多。

欧洲人了解了中国的园林后，认为它兼具英、法两国之长。英国文豪艾迪生曾在报上撰文，认为中国式的园林“匠心独运，巧为计划，不求整齐呆板”，只有它方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德国的建筑家温亦于 1773 年写作《中国庭园论》称赞中国造园艺术布置多变，小桥、流水、曲径、斜坡无一不呈曲线，生动而多

姿，足资欧洲人取法。英王的建筑师威廉·查布斯曾几度来中国，著有《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东方园林记》等书，风行欧洲。1750年，他为肯特公爵设计建造了一座中国式庭园，园内有湖，湖中有亭，垒石为假山，小涧曲折绕其下，茂林浓荫，湖畔高耸163尺的10层四角形塔，角端悬以口含银铃的龙；塔旁建有孔庙，图绘孔子事迹。

中国绘画对欧洲的影响，以山水、人物画开其端，这种画多见于瓷器上，画家中最有名的有法国的华托，他的作品中出现的暗淡的流云、蔚蓝色的远山，都深受中国画的影响，所作《孤岛帆影图》颇具中国风味的欧洲画家，无论是立体派、后期印象派、未来派、漩涡派，都受到过中国气韵的影响。

第四章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第一节 在侵略和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

文化交流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交流双方的关系看，有时是相互平等的，也有时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从交流的方式看，有时是经济的（通商贸易），有时是政治的（互派使节、首脑互访），有时是军事的（发动战争），有时甚至就是直接的文化交流（艺术活动、文艺活动）。

近代中外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交织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这时期，从西方来说，它们是以武力为先导，以掠夺为目的的。它们不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占我土地，杀我人民，而且在每一战争中或战后，都要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屈辱的条约，割地赔款自不必说，还要建立“国中之国”。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奴役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掠夺和文化掠夺。鸦片走私合法化了，从 1800 到 1927 年，据不完全统计，只以走私鸦片，西方帝国主义就从我国掠去约 284 亿银元的财富；从 1800 到 1925 年中，西方殖民者以“猪仔贸易”与契约华工掠夺我国

人口就在 1000 万人左右，连西方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诸如美国西部铁路的铺设和西部经济的开发，非洲德兰斯瓦尔金矿的开采，无不是由华工的血汗和尸骨堆成；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勒索及抢劫中国的款项至少在 14 亿两白银以上，五次大的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又在数千亿美元以上；圆明园被劫掠和焚毁，文物宝藏被窃夺……在这个中华民族自尊心受到历史上最惨重戕害的年代里，在可怕的瓜分豆剖的深重民族危机降临的年代里，反对外国侵略成为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围绕这个总目标而展开，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始现，是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联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字，是为了雪耻，为了“制夷”，“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优西海之民”^①，这种渴望中华民族强盛起来的情绪，正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心。

爱国主义精神在文艺领域也明显反映出来。在绘画方面，当时民间卖的版画中有《大贩鬼子图》。林昌彝绘《射鹰驱狼图》，以表示对英国侵略者及助纣为虐者的仇恨。文人学士为此图“题咏极多”，也是时代风气和思想情绪的反映。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诗歌在近代也是很多的，仅鸦片战争时期，就有魏源为谴责英国殖民主义者以鸦片害人祸国而创作的《阿芙蓉》，朱琦感愤于清政府腐败无能而作的《感事》，张际亮愤怒揭露英军侵略暴行，深切同情人民苦难的《东阳县》，还有张维屏热情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等，爱国主义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脊梁。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和抵抗侵略、启蒙和救亡是紧密联

① 《魏源集》第 874 页，中华书局 1976 年

系，难解难分的，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如果学习西方不能和反对外国侵略相结合，必然在政治上迷失航向，失去促进学习的直接动力。反之，反对外国侵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也毫无出路。这一时期真正先进的中国人，只是谙通西学，了解西方是不够的，还要具有不可缺少的爱国爱民的立场和情怀。林则徐是最早把了解西方、学习西学和抵抗外国侵略相统一的爱国者和先进的中国人。洪秀全、洪仁玕则是把这两方面相结合的农民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特别是孙中山都在两者和谐的结合中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洋务派的情况比较复杂，从他们引进西技西学而言，总的来看具有进步性。但他们之中，既有左宗棠这样既敏于西政西学，又反对阿古柏入侵，为保卫祖国西北边陲作出历史贡献的人物，也有虽谙于西政西学，但在对外关系上妥协退让，参与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后者常常遭到史笔的谴责。

在近代，中国人民背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在轰鸣的枪炮声中你死我活地拼死厮杀，一方面是要平心静气地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这就需要克服自我矛盾的凝重心理，这些决定了这种文化交流要比以往艰难得多。例如，主张抵抗英国侵略的梁廷枏。他留心时务，重视了解、介绍西方的情况，并有所撰述，称得上是有见识的、开明的人物，但他却对“师夷长技”的主张很反对，认为“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①这种矛盾心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正是由于“中国人对外国入侵者的畏惧和厌恨是如此强烈，以致使他们开始兴办报业，建设工厂，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被推迟了整整

^① 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卷 5，第 172 页。

一代，”^①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进度和范围受到了严重影响。

第二节 中国近代处于文化“入超”的不利地位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虽说也曾有过游牧民族的侵扰，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几度打破中华文化向外单向辐射形成的惯有的平衡，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外来文化只是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以高势能状态向中国进行有限的辐射和传播。而步入近代后，中华文化所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因为是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的，是一种全新的，总体上是一种较高势能状态，因而，在这次文化交流中，中国方面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

翻译系统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引进与传播过程中，是一个首当其冲的要害部门，在这里，传教士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对此，顾长声、杜石然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及傅兰雅等传教士在他们的著述里，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很为详尽的资料。^② 我们看到：当历史演进到清季，明末清初传教士垄断西方自然科学引进与传播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在中国科学的译坛上，历史并不曾因有了举世瞩目的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而给中国译员方面以任何主导的兆头。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合作的双方实力未曾改变，特别是中国译员的知识结构仍未得到多少更新。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8—9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② 参见《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

19世纪在中国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都为英、美新教传教士所操纵其中主要机构有三家：一是京师同文馆，二是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三是广学会。其中，广学会是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京师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这也就决定了不仅在自然科学引进与传播中传教士占主导地位，在社会科学的引进和传播中，传教士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创办报刊是输入西学的另一途径。如前文所述，据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统计，从19世纪40—90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内，传教士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的95%，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当时的新闻出版事业。

创办学校是传教士传播西学的又一重要途径，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学校的数量和规模均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学校、图书出版、报刊作为晚清输入西学的主要媒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在新式学堂，西书、报刊为青年学子阅读和讨论；另一方面，报刊又为旧学校的改制推波助澜，译印的图书则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新学。这三者彼此呼应和相互促进，并在这三个方面，对中国直接影响和促进，更加扩大了西学传播的主体途径，留学生的派遣、科学学会和博物馆的建立、外交使团的出访、万国博览会的参加，无疑都使西学传播的途径更加扩大

正是由于西学传播有了如此广大的途径，加之比时的西方文化处于一种高势能态势，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学一直处于“出超”，中学处于“入超”的状态。西方文化大有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过来：国际法介绍到中国了；西方议会制度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影响；法国启蒙主义思想被较系统地传播于中国的知识阶层；进化论在中国广为传播；西方文学、史

学、经济学说、社会学说传入中国；西方心理学、图书馆学和目录学、西洋音乐、绘画都在中国得到传播，大批有关书刊不断出版，与此同时，西方格致学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广度，加深了力度，仅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三个机构，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初，就翻译出版了近 600 种西学书籍，其中西方格致学类书，约占总数的 75%，包括了天文、地理、兵制、农政、算学、物理（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热学等）、化学、工艺、船政、医学等多种学科。

大规模的西学东渐，逐渐更新了中国人的观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导致了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即“新学”的启蒙和建立，当然也带来了以奴化思想为特征的反动文化的泛滥；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群的出现和士林风气的变化；推动了中国近代官办、民办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建立；推动了中国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

第三节 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

西方文化的输入，是在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使其处在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在列强的殖民化政策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这种意义上，最初，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被动的。而且，从西学东渐的过程来看，如前所述，在 20 世纪以前，西方人在向中国传播西学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至少在自然科学方面如此，这就更加重了中国人在这一时期，接受西方文化而处于被动的意味。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人始终被迫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正确看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正确处理中西文

化的关系。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精华萃集的文化系统，因此，先进的中国人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有着美、日等传统文化不发达或不甚发达国家的人士所不曾有过的苦恼和困惑。甚至连一代思想启蒙家严复也曾感叹道：“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

尽管如此，先进中国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在西学东渐中，总起来说，是走了一条主动选择的道路，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选择的内容越来越深刻，这时期的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

林则徐、魏源等人是近代中国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他们破天荒地把“奇技”放在师法的位置上，认为“奇技而淫巧”，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个口号所反映的，首先是看到并承认西方有长处，其次是主张学习西方的“长技”，归结是为了抵御西方侵略者，这里明确表述清了选择对象和目的。只是由于为主观认识和客观条件所限，选择的是“坚船利炮”一类的军事“长技”。

过了约 20 年，冯桂芬、洪仁玕都提出了学习西方的方案。而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产生影响较大的，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明确标明“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宗旨，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后来有人将其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奇妙的理论模式正式从理论上确定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暂时解决了引进西方文化上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这种选择模式，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西学的认识水平还是低下的，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他们力图走出一条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拒绝的“取其之长”道路的主观愿望。这较之顽固派的“全盘拒绝”与买办洋奴

的“全盘接受”高明得多，因而对社会的发展作用也大得多。它有力地推动了一个引进西方科技、管理方法，创办近代企业的社会运动。问题是，这个模式不是使固有的文化适应“近代”的变革，使之具有“近代”的功能，并正确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有益的东西，而是在于维护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秩序，在于仅仅局限在吸收西方的科技。这就充分表明了这种文化选择的保守性和狭隘性。

接下来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对鸦片战争以后几十年中国人对待中西文化的历程进行了反思，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批评“中体西用”论的失误，并超越了“中体西用”的局限，在中西文化的选择上跨出了一大步对于西方文化，他们主要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是一个典型的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的巨匠他将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学说，与中国古老的“公羊三世说”揉合在一起，“欲以构成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①，形成了改良运动中具有中国特色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内涵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正是这种体系，更为广泛地打动了绝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和稍具爱国之心的旧式士大夫但是，维新人士在文化选择上也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他们尊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旗帜，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并保守君权。

进入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以孙中山为领袖继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他们也从西方文化中选择吸收了进化论和民权、自由、平等思想，不过，在政治制度方面和维新人士不同，他们采取的是民主共和国方案，摒弃了君主立宪制。孙中山曾游学欧美，旅居香港和日本，他比同时期的康有为对西方有更多的

^①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41 年

了解和体验，更透彻地掌握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消极性一面，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西方政治制度一切都好，因此，他不是把西方文化照搬到中国，而是作了很好的选择，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的“大同”理想有机结合的产物；他的“五权分立”说，是将西方“三权分立”学说中国化的大胆创造。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从西方文化中进行选择，举起了“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对封建文化展开了最猛烈的袭击，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们把思想文化看成为解决政治问题、救国的根本办法，则是夸大了思想文化的作用。而且，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有的人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偏向的发生。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最重大的事情，是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选择在当时来说是艰难的，因为同时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十分驳杂，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先进的中国人正是经过对比、选择、实践、再选择这一途径，经过多次反复，最终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土地上，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是历史的选择。

伴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历程，观念也得到了不断更新：“师夷长技”观念更新了“华夏变夷”观念；变革观念更新了“尊王法祖”观念；民主民权观念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理智的务实观念更新了偏颇的尚虚观念；男女平等观念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社会主义观念更新了资本主义观念。

总之，从中国人主动选择西方文化的历程及观念变化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虽然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也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表现，但终究没有导致

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没有引导中国走上独立和富强，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作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选择，并对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五章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论争

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是历经曲折。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异质文化，它们在接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这种碰撞不仅附着着融合的进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碰撞本身就是融合。这种碰撞和融合具体体现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和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所产生的不同变异体。

第一节 全盘拒绝与盲目排外

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强行输入，除了少数进步人物之外，大多数的中国人采取了排斥与全盘拒绝的态度。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就不应该对这种态度进行简单的指斥。从文化交流理论来看，这种文化态度的产生在当时是一种必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文化要接受另一种文化，往往需要对外来文化有一个认识过程，外来文化要经过主体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和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的亲疏程度有密切关系。越是接近本民族文化心理而产生的文化变异体，越容易被本民族接受，然而这种越容易被接受的文化变异体所包含的异质文化的内容越少，它对进行选择

的民族主体的未来发展是越不利的。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和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所产生的最初态度和对所接受的最初的变异体只能是排斥与全盘拒绝。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天下意识和中国中心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①在创造了灿烂古代文化的中国人眼里，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国之外的国家都是蛮夷戎狄，其人民也都是化外之民。这样的民族心理不仅直接影响着迈向近代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且也影响着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明末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肇庆刻印了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他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有意地将中国移到了图的中央。然而对其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域外地理传播，除了当时的开明者徐光启、陆次云等少数人能接受外，当时被称为一代儒师的纪昀等乾嘉学者则信疑参半，强大的守旧势力则斥之为“邪说惑众”。明清之际，中西接触日益频繁，身历海外的华人写下了一些域外游记之作，如谢清高的《海录》，樊守义的《身见录》，但是封建士大夫大都把这些当作“异闻”。诸如此类的事例直至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的排外与全盘拒绝心理，不仅是来自于对外敌的仇视，而且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排外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心理。即使“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也对西方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看法，常常为传统的偏见所左右。他曾认为“天朝声威”可以“慑服夷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中国一旦绝市闭关，西方各国即会生计休矣。他在巡

^①石介《中国论》。

阅澳门时，虽然赞赏西式楼房建筑，但对西方的服饰风俗，却大不以为然，对西方人“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他认为是“真夷俗也”。他初到广州看到西方的军队，得出“夷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的结论。封建文化的局限在这位领一代风骚的先进人物的身上也深刻地反映出来。不仅如此，鸦片战争中的一些抵抗派将领也深陷在封建文化的羁缚之中，如积极抗英以至殉职的两江总督裕谦，曾发布命令“有传抄夷书夷事者，即行销毁，不准传播”。这种观点粗看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不无为传统文化而战之嫌。

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显得苍白无力，不能抵挡和招架，承袭着这种传统文化的中国人，最初都或多或少地抱着排外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心理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时却发展到极端的地步，这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拒绝。持这种态度的人，有深受洋人之害，缺乏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急于复仇的社会下层人士；有政治上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派；还有缺乏远见的一些儒生。这三部分人产生共同的文化态度，从表面看来似乎是让人费解的，但是以他们在社会中更多地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这点上来看，三者之间却有着天然的一致，尽管造成一致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社会下层人士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他们终生要在属于自己的有限空间内疲于奔命，没有任何摆脱传统文化的可能，西方资本主义方式的输入，直接冲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他们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清政府官僚中的保守派更多的出于保持自身利益和在社会中特权地位的要求，不愿意看到西学冲击下自身利益的被侵犯，在他们那里不仅是文化态度，所有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都是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回到“闭关而治，复我太平”是他们理想境地。一些儒生即社会中的文化人士，他们所以对外来文化要排斥，或出

于政治上他们向官僚阶层靠拢的渴望，或者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得心应手而产生对西学的恐惧。

全盘拒绝主张的产生所克服的心理障碍最小，然而由于它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拒绝，使得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没有和本民族文化融合的任何可能，因而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危害是最大的。文化的传播是一种必然，人为地把自身的文化封闭起来，只能延缓文化传播的进程，而不能彻底排除文化传播本身。在我国铁路修筑问题上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早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就提倡修铁路。其后英国使馆的威妥玛也向总理衙门建议要“开设铁道飞线”。1876年，外国人在上海到江湾修成了一条铁路，中国花钱购回后又把它给拆掉了。1880年之后，李鸿章、刘铭传力主修铁路，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政治上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和缺乏远见的儒士作了充分的表演。这些顽固派们有的提出修铁路有“四失”，即资敌、扰民、失土、夺民生计；有的提出修铁路有“五害”，即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他们或者认为修铁路会“损伤地脉”，或者认为修铁路是“嬉笑无用之举”。翰林院侍读学士周德润认为铁路一开，“而沿途之旅店，服贾之民车，驮载之骡马，皆歇业矣，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也。……昔商鞅开阡陌而秦以亡，王安石行青苗而宋不振，与民争利，祸亦随之。”^①他甚至认为“铁路行之外国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抨击修铁路有百害而无一益，列举铁路弊端 25 条：“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②他认为“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也。”内阁学士徐致祥不仅提出了修铁路的“八害”，而且竟然认为没有比修铁路祸民更大的了，内阁

^{①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

学士文治竟到了“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的地步，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刘锡鸿是全盘拒绝者的重要代表，还未出使欧洲在国内的时候，刘锡鸿参加了关于洋务问题的一场大辩论，他认为，“募人学习机器，辗转相教，机器必满天下，其以此与官军对垒者，恐不待滋事之洋匪也。”甚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写道：“御英夷不恃乎船械，摧劲敌不系乎战具”。后来，刘锡鸿作为副使，和郭嵩焘出使英国。他在途中和抵英之初，对外国的“一器一技”总要予以贬斥。他看到以机器代人力耕作，却议论道：“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可为富民省雇工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当主人要他看机器截铁、锯木时，他却说：“无非机器，皆非余所心属。”当他看到伦敦三十多所大戏馆高朋满座时，他以为这种奢侈都是使用机器造成的；当他看到火车时却说：“然以行诸中国，则稗肱股、执策绥、掉舟挽毂以度载人货者，莫不尽废其业。……势将乘坐寥寥，求低一日之煤费工需而不可必得。……是故火车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术可强同也。”^①刘锡鸿不仅全盘拒绝西方文化，而且产生了一种“用夏变夷”的梦想，他把西方近代科学贬为“杂技之小者”，而对中国的纲常礼教无限褒扬；当他在评及男女不能平权时，竟以身体的“胸前”、“背后”和皮肤的“头阳”、“腹阴”为论据，真是荒唐到了极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全盘拒绝最突出的历史事件是义和团运动，它标志着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争端的一次总爆发。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无疑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但是对外敌仇视和封建蒙昧的作用，使得这一运动产生了对新生

^①转引自《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244页，中华书局1985年。

产方式、生活方式完全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如果说他们攻打使馆、烧毁教堂、杀死使臣是出于反抗剥削和压迫的义愤，“挑铁路、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还有某些军事斗争需要的话，那么，封建蒙昧的表现远远超出了这些范围。他们最厌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他们“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不仅曾有六名学生因携带铅笔、洋纸，被义和团众搜出而“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凡家里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凡读洋书之学生，及着瘦小衣服者……则指为奸细……总而言之，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他们的揭帖声称“拆毁回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在他们眼里，“洋”字成为大敌，应该让它荡然无存，即便非用不可的东西，也要改换成与传统文化心态接近的名字。洋货改称广货，洋药改称土药，洋钱改称鬼钞，洋枪改称鬼銃，东洋车改为太平车，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东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这些仍不够，还要把“洋”字改成“激”，“其意为水火交攻也”。此外，对教民不加任何区别，有的教民几岁，甚至不满一岁也被杀害，当然对所有的西方人更是“必杀无赦”了。

在义和团运动中，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这两股敌对的社会力量竟然站到同一个战壕里，一方要“扶清灭洋”，一方要“招集成员，借御外侮”，共同对付闯入国内的资本主义怪兽。这一联盟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更根本的在于他们两者的脐带都连在一个共同的母体，在恪守封建文化本位这一点上，两者有着天然的一致。当然，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只是阐明它是义和团运动深层原因之一，决不能用文化的原因代替其他的原因，于此，李大钊的分析最精辟，他说：“义和团虽发生于仇

教的心理，而于西洋人的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着几分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与文化上的冲突。”^①

第二节 “援西入中”

对西方文化采取“援西入中”的典型事例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以推翻封建王朝为目的的农民战争。它的特点是，引进了一个西方的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构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以之作为发动、统帅和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这一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新的社会理想是太平天国能够大规模接受西方文化的根本原因。

从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可以看出，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能力上是无与伦比的，尽管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受限定在基督教上。应当说太平天国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比较深刻的，它不仅始终以拜上帝会的宗教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而发挥作用，而且从文化接受上来看也深入下去，在表层文化领域他们把基督教的内容和人们的称谓、口号联系起来，而且有固定的礼拜仪式。在中层文化领域，他们把基督教的一些内容渗透其中。不仅初期革命理论的形成是太平天国对西方基督教的利用和改造，而且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也把基督教教义和现实斗争融合在一起。《劝世良言》中云“世界上万国之人，虽有上下尊卑贵贱之分，但在天上神父之前，以万国男女之人，就如其子女一般”的教义。在洪秀全的理论著作中，以“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

^①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 88—89 页。

是姊妹之群”的思想表达出来，使得基督教的“博爱”观念被注入经济平均主义的理想内容。基督教的教义只承认人死后灵魂是平等的观念，被洪秀全引申到人间社会也要平等，提出要用平等的原则改造社会的追求；基督教宣传的赎罪方可升到天国的观念，成了洪秀全号召人们建立人间天国的启示。他们根据基督教“人无私财”的教义，建立了“圣库”制度，实行严格的供给制度。他们把摩西“十戒”改为“十款天条”，“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他们把太平军分成了“男营”、“女营”，制定了虽夫妻也不能同居，“虽极热，夜卧不得光身，白昼不得裸上体”的严厉禁律，正因为这些禁律和基督教教义联系在一起，使得它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初期自发地或自觉地起着约束作用。“同时长跪同默祷，同时蹶起同狂呼，每饭不忘除妖魔”的宗教仪式，使宗教宣传和反清的战斗动员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

太平天国宣扬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后来又索性编造出一个上帝鞭挞孔丘的故事，是驱使曾国藩等封建文人从书斋走向战场的因素之一。在曾国藩看来，“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诗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在他们的鼓动下，封建文人学士们纠集在一起，形成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阵营，对冲入国土的异教、西学进行顽强的抵御。

特别是天京变乱之后，太平天国的宗教外衣被撕裂了，它失去了昔日的凝聚作用，但洪秀全却日益坠落到了宗教的迷雾中，他不去认真地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而把革命的成败归结为是否忠诚于宗教的信仰，甚至在取国名、朝名、玉玺名上做文章，这时拜上帝教起了束缚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作用，尽管他们要把“太平天国”索性改成“上帝天国”，但是它的失败也是无可挽回了。它越是在深层文化领域靠近西方，越距中国传统文化遥远，

而将遥远的西方文化运用到受着传统文化熏陶的整个农民阶级身上时，只能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也是一种文化的失败。

起初，西方传教士及其政府对太平天国寄着“热烈希望”。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曾断言这场革命的性质不是反对清政府，而是为宗教自由而斗争。他设想道：“如今，倘此次之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门户，使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①但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他们就感到失望了。

“传教士们发觉他们很少有与太平天国一致之处，他们也是太平天国所不欢迎的。他们只好作出结论，认为洪秀全的教义是‘完全不像我们所预料会从天父那里得来的，也和耶稣所说的任何话极不相同。’”^②起义军虽信上帝，将它称作“皇上帝”，却不信“三位一体”说；他们做礼拜，进行祈祷礼仪，却不设教堂；他们遵循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将洪秀全奉为与耶稣平起平坐的天王；他们赏罚和关于天堂地狱的描述是从《新约》里借用的，可是他们略去了关于爱、宽恕、谦卑、关怀自己的邻人等基督教特有的教义。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认为，太平天国“计划用纯粹中国人的方式使中华帝国基督教化，而在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福祉而已。我们担心他们的活动方法……只能导致出现一种假的基督教。”^③显然，洪秀全是在“建立自己的神道统治时，从《圣经》里吸取对他最有用的东西，决不能说为了自己和他的信徒们真正接受了基督教。反之，他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捏造基督教启示的新源泉。”^④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援西入中”染上

①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③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④ 《九十年代的世界与中国》第 154 页。

了鲜明的“中体西用”的色彩。

第三节 “中体西用”

早在 1861 年，早期改良思想家冯桂芬在其所著的《校邠庐抗议》一书的《采西学议》中，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战”的观点，这是“中体西用”论的雏形。其后，薛福成在其《筹洋刍议》的《变法》篇中说：“取西人器术之学，以卫我尧舜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在其《韬园文录外编》中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的《西学》篇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这些观点表述不一，但其实质是一样的，即“中体西用”的理论。

稍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成了洋务派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的最好表述，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学为体”，即是以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旧学”为一切政治、文化教育的主体，特别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作为一切政治的中心。尤其注重“君为臣纲”这一条，那就是丝毫不准触犯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在这种大原则下，可以用“西学”——“西文”和“西艺”，来巩固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的统治地位。这种观点实质上排斥任何改变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新学”，特别反对当时比较进步的维新派所提倡的民权和君主立宪政治思想。“中体西用”论者只知道“增其新”（即西洋语文和殖民地加工业所需要的浅薄的科学与技术），而未尝一言“变其旧”（即旧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君主专制政体）。后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结成一气，极力从中破坏这种运动，张之洞有时在表面上虽然也伪装进步，同情维新运动，但实际上是维新运动的死敌。1898年，他著《劝学篇》，极力反对维新思想，阻碍维新运动的发展。该书分内外两篇，内篇讲中学，外篇讲西学。他认为中学为旧学，西学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烈于不通西学矣。”所谓“中学”，他认为主要的就是中国经史之学，这种学问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应放在学习的首位。先从经史中学得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然后酌采西学有用的地方以补我之不足。在为“体”的中学中，他基本的主张在于明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他认为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持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认为这三纲乃千古不易之道，其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凡胆敢违反这种道理，则“将众恶而共弃之”。

所谓“西学”，张之洞指出包括“西政”与“西艺”两类，其纲目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仪、电，西艺也。”他并且提出政先于艺的主张。他说：“救时之计，谋困之方，政尤急于艺。”必须指出，他所提倡的“政”，不同于当时维新派所说的“政治”，即改变当时君主专政的政体，他所谓的“西政”应指学习西方的学校及农工商等制度。所谓“西艺”，实际不外乎殖民地加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所需的片面、肤浅的知识和技能，如“船坚、炮利、制造精奇”之类。

洋务派是一些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又认识到西方文化巨大威力的官僚集团，他们自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全方位地接受西方文化，只能在科技领域采西学之“用”向中学之“体”上

嫁接，这种对异质文化的态度，恐怕除了全盘拒绝之外是最容易做出的选择了，它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也是在全盘拒绝之外最小的，这是它会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产生影响，甚至上升到统治地位，并使洋务运动持续多年的基本原因。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确曾贯穿洋务运动之始终。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主要工业企业都有浓厚的封建性，一个个工厂就像一个个衙门，大臣、总督、督办、会办、襄办等官僚政客充斥其中，其中不少人根本不懂西学，凭借着资历、高位和靠山，领取高俸，难免人浮于事。时人记述，“中国各局总办提调人员，或有九九之数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辨，叩以机括而不能名”的人，他们“但求不致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悉听工匠指挥，茫于分晓”。“官办工业有亏无盈，岂主其事者皆不肖耶？其来也不过徇情面，倚声势，大率纨绔居多。其人本不知稼穡之艰，焉知大体？惟好为排场，任其挥霍……无底之壑，终必匮乏。”洋务运动的封建本位，断送了洋务运动的自身。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使洋务运动难以为继。次年4月，沈毓桂以“南溪赘叟”的笔名，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匡时策》一文，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式一字不差地表述出来。1898年5月，张之洞发表了《劝学篇》，全面系统地阐发了“中体西用”说，完成了顽固派抵制维新派和革命派的这一理论，因而受到先进的中国人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严复的阐述是最深刻的，他写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

洋务运动虽然未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但是在文化方面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客观效果，它揭开了中国近代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序幕，初步奠定了近代文化的物质基础；它承认中学的不足和西学的功用，突破了“夷夏之大防”的藩篱，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

进入中国打开了一条通道；它给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强烈震撼。清政府集中力量搞“洋务”，使得人们逐渐淡化了对西方“夷狄”之见，使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化。不仅如此，洋务运动还传播了近代西方科技知识，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科技人才。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移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但是，当洋务派将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植进来时，不可避免地又孕育出了弱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这个“体”随着“用”的移植而发育成长着，最终无疑要破坏完整的封建之“体”。新的经济因素一定会带来新的政治因素，洋务派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对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和思想结构的冲击是一种必然。

“中体西用”文化观作为历史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讲究“天下国家”、“夷夏之防”的“中国中心观”的历史背景下，“中体西用”观有其明显的进步性。它突破了中国不需要向“蛮夷戎狄”学习的桎梏，承认了“中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是需要用“西学”补其不足的，这就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曾有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①

第四节“全盘西化”的提出

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国民缺乏文化深层次素质的提高，中国要最终战胜封建主义思想，推翻封建制度，长久地奠定资本主

^①参见张同奇《“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义的民主共和之基，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先进的中国人基于这种认识，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们对旧的文化传统展开了激烈批判，高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猛烈冲击和大量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使得这一运动一度出现了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

当然，“全盘西化”的提出还有别的动因。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引进中国后，“优胜劣败”的思想意识普遍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头脑中发生了深刻影响，而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还是渐变的改良，都没有真正地拯救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失望迫使他们全面走向西方去找寻国家的出路，于是“西学”和“中学”的根本对立也就水火不容地凸现出来。^①

在这一时期，鲁迅提出了“不读中国书”，并于1919年2月在一篇题为《随感录》的文章中指出：“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 APOLLO（阿波罗——光明、艺术之神）。”；钱玄同看到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页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竟提出了要“废止汉字”；胡适认为：“只有一条路，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死心塌地地去学人家，不怕模仿……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吴虞则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写道：“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了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地都会吃起人血来了。”此时的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① 参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16页。

《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中，对中西文化作了比较，并痛心指出中国民族“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面目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他甚至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若照中国人多数的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既然中国如此，陈独秀得出了结论，必须输入西方文明。

“全盘西化”的口号是激进的、激烈的，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它是违反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的。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在特定的种族、地理、历史诸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它包含着这一民族和国家特有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显示着特有的民族性，与这一国家的具体国情密不可分。文化的传播必须使外来文化与输入国的国情和民族性相结合，必须与传统文化保持既排斥又融合的关系，如果认识不到输入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优异的特质，而一味排拒，那么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吸收本身就失去了基础，因为人们都不能不带着传统的特性去认识和选择外来文化。在一个社会中，部分激进者由于种种原因产生“全盘西化”的设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使因袭着传统文化的国民和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者产生共识是不可能的。

在富有传统文化的社会里全盘西化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只要现代化没有建成，那么，“全盘西化”论义总会有一定市场。对“全盘西化”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批判上也许并无益处，因为这样做有一种完全复归传统的可怕后果，关键是应该协调好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消长的关系，将二者的社会影响融合起来，达到利用传统又走向现代化，这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想，为中国新文化的建立提供了选择的基础，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有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的历史过程，这时中国先进

的知识分子结束了以往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认识的阶段，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精神文化中的各种学说、流派进行分析和鉴别，乃至部分试验，其结局不仅是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经过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选择，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

第五节 近代的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自19世纪后半叶始，以中国下层群众为主体，包括部分官绅的反洋教斗争或称“教案”如火如荼，持续了半个多世纪，遍布全国各个省区，为数多达上千次，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种特有现象。关于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和性质，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反侵略”说；有“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说；有“中西文化冲突”说。^①我们不同意将近代中国发生的反洋教斗争的起因和性质仅仅归结为中西文化的冲突，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关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逐渐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此时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扩张相联系，他们以列强的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仅仅以来华传播“福音”为目的，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工具，并且他们凭借特权，和中国地方官府相勾结，在中国横行霸道，包揽词讼，鱼肉乡里，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就具有鲜明的民族自卫的反侵略斗争性质。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

^①见刘泱泱《建国以来教案研述述评》。

面，确切说，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我们认为在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中，仍然包含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成分。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大规模传入，势必引起基督教教义教规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冲突，引起西方一神教和东方多神教的矛盾，引起西方习俗与中国风俗习惯的矛盾，引起西学与中学的矛盾。只看到近代教案的反侵略性质，闭口不谈其中中西文化冲突的内容，我们认为是不全面的。

如果说中西文化论争中的“盲目排外”、“中体西用”、“援西入中”、“全盘西化”倾向等主要反映的是中国近代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的话，那么在近代一系列“教案”中表现出的中西文化冲突则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群众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尽管在反洋教斗争中也有官绅参加，但主力却是下层人民群众。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将近代反洋教斗争中的重大教案中出现有关中西文化冲突的内容叙述一下，以便窥见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下层群众对西方文化传入的态度。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大小教案共发生近千起，较为重大的教案有：1861年的贵阳青岩教案；1862年的湖南衡阳教案；1863年、1866年的两次重庆教案；1865年、1868年的两次西阳教案；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81年的济南教案；1890年的大足教案；1895年的成都教案，还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

1862年发生了湖南衡州教案。教案发生的原因之一便是教会的洋人唆使教民聚众一千多人，在大街通衢张贴揭帖，声称要拆掉城隍庙，改建“道友堂”，还要撤掉府县学中的孔子牌位，改奉“十字架”。教民又散布流言，宣传天主教当兴，迂腐的儒教当废，如“胆敢违抗，将来广东、湖北两省教主，必兴问罪之师”等等。教会指斥儒教，亵渎中国百姓所信奉的神圣，必然引

起人民甚至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儒士的强烈反对，所以才出现考生“乘考聚众，焚毁该堂（教堂），拆除教民房屋人逾数万，势其汹汹”的情况。

1869年发生了安庆教案。是年夏天，湖南反洋教的揭帖流传到安庆，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响，特别是士人，反响尤大。揭帖内容有：教会不敬祖宗神佛，惟知上帝，入教者必先毁除祖宗牌位，遇到庙宇，即行拆除，“祖宗者，人之本也，本之不存，枝叶必枯”。揭帖以“如果邪教盛行，圣道不昌，不知成何世界”号召“凡我士农工商，务必敌忾同仇，群起报复。”^① 安庆人民在揭帖的鼓舞下，纷纷欲捣毁教堂，驱逐教士。此时正好赶上府院考试，安庆府各地文武考生齐集在安庆。这些考生因平时孜孜所学皆为诗书义理，与教会反对祖先崇拜之义绝不相容，因而有浓厚的反洋教思想。一十月间，安庆考场附近出现了一张匿名揭帖：“匪教猖獗，与考童为难，于初二日拆仁爱堂。”^② 十一月三日，英教士宓道生、卫养生乘轿前往府署，要求道台查办散发反教揭帖之人。当时府署内正举行考试，教士一入府署，即被考生拦阻，并将宓、卫二人之乘轿拽翻，高呼“杀洋鬼子、打洋鬼子。”^③ 许多考生和群众拥入西石坊英教士住所，捣毁家具什物；同时，东石坊法国教士韩石贞住宅亦被大批愤怒的群众捣毁。^④

1898年四川发生了第三次大足教案，并逐渐形成了反洋教武装起义。此次斗争的领导人蒋赞臣、蒋鹤林在领兵攻入安岳、资中时，沿途张贴的告示中说：

海禁大开以来 泰西传教通商

① 《中西纪事》，第21卷，第4页。

② 《清季教案史料》，第2册。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0。

④ 参见张力·刘黎洁《中国教案史》。

凡我廿一行省	率上俱杂外洋
积久竟忘庇荫	气习遂至猖狂
不应欺凌乡党	不应侮弄祠堂
不应袒护教民	不应摇荡边疆
剪灭孔圣正教	竟尔破坏五常
恃势不思痛改	胆敢跋扈飞扬
往者迭次打毁	衅山彼教不良①

.....

这个告示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侵略的痛恨，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以军事侵略和不平等条约为依托的基督教文化的反感。

发生在 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观点是被学术界广泛认同的。但从反洋教斗争的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次“教案”，处于中国近代这个特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里，义和团运动自始至终充满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斗争。对此，前文已略有述及，下面我们摘引义和团运动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揭帖、告白等文献，借以说明近代中国下层群众对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态度。

勒令耶稣各堂（天津， 1900 年 3 月）

着尔耶稣各教堂知悉：今限尔一礼拜内，教堂内之人，悉行离开，各教堂均由本会中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须用术将尔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彼时悔之晚矣。②

拆同文馆大学堂揭帖（北京， 1900 年 5 月）

① 转引自张力·刘鉴洁《中国教案史》。

② 佐原笃介辑《拳匪纪事》第 2 卷。

二十九口，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①

灭洋兴清（北京，1900年6月）

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②。

神助拳（天津，1900年）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及竊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谗，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擒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③

圣谕增福财神札（天津）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不久刀兵滚滚，急速退教，速进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中能安民，下能保身。见帖速传，传一张，免家之灾，传十张，免村之灾，如不下传者，即有吊头之苦。……^④

① 佐原笃介辑《拳匪纪事》第2卷。

② 仲芳氏《庚子记事》。

③ 佐原笃介辑《拳匪纪事》。

④ 上火选辑《义和团杂记》。

告白

我中华帝国以圣教著称于天下，诠释天理，教化人伦，文教所及，光照河山孰料神州巨变，世风日衰。五世以来，赃官委以重任，官府为买官鬻爵者开，惟富者任职于朝中。科举形同虚设，举人秀才埋没于乡里，官位按银价而定。达官显宦，家缠万贯，皇帝垂涎。大小官吏，辗转盘剥，鱼肉百姓，劫掠民食，陷黎民于水火。衙门败坏，不堪言状。商场行会之中，无钱寸步难行。贿买官吏在所必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一应俱全。贪官污吏，诡计多端，背离三纲，天良丧尽，无法无天。彼等系一丘之貉，目光所及惟不义之财。公理荡然无存，敲诈勒索之外，无所事事。讼案不胜枚举，衙门绝无公断。不行贿买，势必败诉。草芥子民，无处伸冤。百姓横遭杀戮，哭声直达天庭，纵有神明贤哲降世，晓以大义，颁发善书，教化百姓，嗟呼！从者寥寥，悟道者谁？邪恶畅行无阻，神道深知世道不古，圣教罔然。

今天庭震怒，命诸神降世，不分尊卑，普查人间。罪魁乃当今皇帝，业已后断无人，断子绝孙。满朝文武，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难以言状，置寡妇孤孀哭声于不顾，毫无悔过从善之心。

灾劫临头，尤为甚者。洋鬼挟来邪说，以基督、天主、耶稣诸教相诱，从者芸芸。该教等灭绝伦常，诡诈多端。嗜利之徒，咸居门下。彼等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致命清官廉吏，腐化堕落，饕餮之徒，尽为奴仆。故修铁路、架电报，制造洋枪洋炮，机器工艺，尤其其乖戾之天性所好，奉机车、气球、电灯为上品。洋人虽出入乘轿，与其身份大相径庭，我中华百姓视之为天谴蛮夷，天帝方遣神佛下界灭洋。首批下界战魔谴顽者乃红灯照、义和拳。焚烧洋楼，修复庙宇，尽毁洋货，斩尽妖魔，端正教化，尊圣崇贤，使圣哲之教光大发扬。天意既定，扫除立行，三年之内，大功告成。作恶者难逃此劫，天帝慈悲之心，人人可

见。天机玄妙，不轻易示人，惟太平之世，指日可待，即在癸卯之年，预示众生福祉，逃脱劫难之苦。小民之歌，就此结束。最后一语，系全文之小结。学子士绅切勿以咒语等闲相待，无视其微言。^①

① 阿诺德·兰道尔《中国联军》，第1卷。

第六章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节 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政治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文化挟雷霆之势，涌进古老的中华，驱赶着鹅行鸭步的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的近代化，他们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多次的试验。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农民救国的探索和尝试。洪秀全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

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得到启示，从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利用了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形成新的思想体系，西方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洪秀全改造中国的基本思想。

太平天国对中国的改造理想表现在《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上。这个革命纲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并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内容，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绘制了太平天国革命所需要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蓝图。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能建立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新社会，它的探索必然不会成功。

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和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两个政治派别的共同政治信条。改良派据此向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挑战，向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观念挑战，力主学习西方“法度政令”，兴民权，定宪法，设议院，行三权鼎立之制，建立“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所谓君主立宪制度，并不触动地主阶级的统治根基，而只是要求地主阶级允许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享政权，建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改良派依靠戴着皇冠的代表人物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行动。他们提倡新学，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影响，戊戌变法后，怀疑旧学，欢迎新学的人增多了，人们的民主要求增长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西方资产阶级“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民治、民享”等民权学说和“代议政治”、“共和制度”，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恶劣政治的根本”，既“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又是中国长期落后与被欺凌的

根源，力主在推翻满清统治的同时，变革“国体”，以民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五权宪法”。所谓“五权宪法”是借鉴中国古代实行的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以五权分立补救三权鼎立之弊。革命派“感受欧美的革命思想”，在中国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风暴。

于是，“民主革命风潮涌起。民约论、自由论、自治论、独立论的译作成为时髦之学，《路索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美国独立宣言》等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弥勒等西方哲人比孔孟程朱等中国圣贤更受青年崇拜。与反满宣传相呼应，形形色色的反对外族统治的独立战史、战纪、轶闻，世界各国的民族英雄、志士、杰士、义士、侠女的传记，译作纷呈。”^①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王朝，打倒了持续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民主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在舶来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兴起的，当时的所谓民主，其核心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相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求推翻“假共和”，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面前，毕竟显得形单势孤。他们实现真正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愿望也还是失败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是深远的，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它不仅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二 经济影响

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压榨下，原来就已经贫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加赤贫化了。他们纷纷陷于破产和失业，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被剥削的过程，也就是地主和官僚通过剥削、掠夺、压榨、欺骗手段积累大量财富的过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生财之道十分垂涎，具有投资于近代工业的要求。19世纪70年代前后，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成熟了。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而来的。据统计，自1872年至1894年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约有50多个，资本共500余万元。其中较著名的有：

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道员朱其昂在天津设立机器磨坊；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公和永缫丝厂；1882年徐润在上海设立同文书局；同年李松云在上海设立机器厂；同年广州商人设立造纸厂；1886年官绅、买办、淮军将领在天津合办自来水公司；1890年上海商人设立火柴公司等。

中日战争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震动和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当时许多爱国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它采取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向日本学习。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大声疾呼要求设厂自救，提出了自办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的主张。据统计，1895年至1898年，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0余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比较著名的有：商人楼景晖创办的合义和

丝厂；华侨商人张振勛创立的张裕酿酒厂；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纱厂；杨宗濂创办的业勤纱厂；夏粹芳创办的商务印书馆等。

辛亥革命前 7 年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从 1901 年至 1911 年间，全国新设的厂矿有 340 家，资本达 1 亿零 1 万余元，这十年新设的厂矿和增加的资本都超过了前此二十年间的两倍以上。这时的企业，主要仍在轻工业方面，特别是纺织、食品等行业。此外卷烟、造纸、火柴、玻璃等轻工业，都有较显著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11 年至 1913 年注册设厂有 72 个，平均每年 24 个，1914 年至 1918 年五年间，注册设厂有 183 个，平均每年近 37 个。此期间兴办的工厂以纺织和面粉工业进展最大。这时，重工业部门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如临榆柳江煤矿、江苏铜山贾江煤矿等。同时，电力、交通运输和金融业也发展起来。

三 文教事业的影响

1. 教育事业

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影响，中国近代创办新式学校教育可分三个时期：一为鸦片战争时期；一为洋务运动时期；一为新型学校教育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大量地进入中国，据统计，1845 年时，在华传教士有英人 10 名，美人 20 名，德人 1 名；1855 年增至英人 24 名，美人 46 名，瑞士人 2 名，德人 3 名。传教士除传教外，大多数都兼办教育——在他们自己家中或在教堂内附设学校。当时比较有名的学校有：1844 年英人霍尔特在宁波开设的中国最早的教会办的女子学校；1845 年美长老会在宁波建立一所学塾，到 1867 年迁往杭州改为育英书院，后来发

展为之江大学。此外还有英华书院、清心书院、徐家汇公学、格致书院、法汉学堂等。据 1877 年统计，全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有 350 所，在校学生有 59755 人。

洋务运动时期是中国新式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洋务派为搞“自强”、“求富”的“新政运动”，需要大批买办、翻译和技术人员。他们需要的人才约两部分，一为“西文”人才，一为“西艺”人才。为培养“西文”人才，洋务派设立了京师同文馆（1862 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 年）、广州同文馆（1864 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 年）等。为培养“西艺”人才，洋务派开设了一些中国近代最早的专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机械学校、福州马尾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1881 年）、天津武备学堂（1896 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 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 年）、天津电报学堂（1879 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 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 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 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 年）、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1892 年）和工艺学堂（1898 年）等。

同时，基督教会办的新式学校进一步发展，一般由中等学校发展为大学。1871 年，美圣公会设学堂于武昌，1891 年建成文化书院，以后发展为华中大学；1879 年，美国圣公会成立上海圣约翰书院，1894 年发展为圣约翰大学；1885 年，美长老会在广州设格致书院，以后发展为广东岭南大学；1888 年，美以美会在北京设立汇文书院，1893 年，公理会在通县设立潞河书院，1919 年，合并成为北京燕京大学。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和一些地方人员因受“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盛宣怀于 1895 年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1903 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和 1897 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后为上海交通大学）；戊戌变法时在北京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等。

1905年，在许多封疆大吏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合奏请下，清政府于是年8月下令停止科举。新的学校制度和新式学校大量出现。新的学校制度设蒙养院、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预科、本科、大学院等七个等级。停止科举后，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国规模的新式学校教育发展起来。

2. 文化事业

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书籍、报刊的大量出版发行。书籍报刊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载体，同时，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又进一步促进了书籍报刊业的发展。

近代的报刊分两大类，一类为外国人经营的报刊，一类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报刊。外国人经营的刊物主要有《遐迩贯珍》、《中外新报》、《六合丛谈》、《香港新闻》、《中外杂志》、《中外新闻七日录》、《教会日报》等。其中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林乐知主编的《教会新闻》较有影响。外国人经营的报纸主要有《中外新闻》、《近事编录》、《华字日报》、《上海新报》、《沪报》、《直报》、《申报》等，其中《上海新报》为《字林报》的中文版。

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刊物主要有《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湘报》、《湖学新报》、《国闻报》、《国闻汇编》、《知新报》、《经世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二十世纪的支那》、《二十世纪大舞台》、《东方杂志》、《民报》、《醒狮》、《复报》、《中国女报》、《女子世界》等。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报纸主要有：《循环日报》、《汇报》、《苏报》、《时务日报》、《中国日报》、《时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

近代出版的书籍如果按内容可分为小说类、政史类、科技类三种。因为书籍浩繁，兹不列举。

大量的书籍、报刊的问世，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人们

的观念，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最大影响。

四 风俗习惯的影响

中国传统风俗与近代西方风俗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分别从属于各自的文化系统。这些不同表现在吃、穿、住、行、婚姻、家庭等各方面。19世纪80年代的一位中国学者曾类比过它们的不同。这位学者在《津门杂记》中说：“津地华洋杂处，互相交接，兹将中外国习俗不同之处略记之。中国人梳辮以剃发为修容；西人以头上发短为美，只剃面而已。中国饮水沐浴，俱用热水；而西国则俱用冷水。中国人读书写字自右至左；西人读书写字自左至右。中国罗盘曰定南针；西人曰指北针。中国人以指甲长为修饰；西人以指甲短为修饰。中国人见亲友以戴帽为有礼；西人见客以脱帽为有礼。中国人尚左；西国人尚右。中国人于肆筵设席每先茶点而后饭；西人则先饭而后茶点。中国人鞋头高而跟浅；西国鞋跟整而头低。中国人以红为吉色，以白色作丧服；西人以黑色作丧服，以白色为吉服。中国茶碗有盖在上；西国茶碗有盘在下。中国人娶妻一从父母之命；聘定之余美恶不能更改；西国人娶妻专行自己之志，听其自择，两情无不和睦。中国人当迎娶之日新人涕哭交流；西人当迎娶之期新人欣喜交集。中国人以男为重，养育教诲男先乎女；西国人子女并重，养育教诲女与男同。中国人请酒男女分席，不交一言，视女如仆；西国人请酒男女同席共相笑语，待女如男。中国人生女裹足，终身艰于行步；西国人生女无此举，一生随意遨游。中国人谓意会藏诸心内；西国言意思聚于脑中。此外尚有多端，不胜枚举，大抵中西习俗悬绝者居多，往来交际，亦不可不知也。”^① 在作者的观念

^①张焘辑《津门杂记》卷下《中外国异俗》。

中，西方风俗是被作为与西人交际的注意事项而被罗列的，丝毫没有吸收的意思。但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展和加强，西方风俗却被中国人大量接受了。下面就是西方风俗植入中国的几个例子。

1. 服装的改变。

商周时期，衣服款式通常是上衣下裳，裳即裙子，不分男女都可以穿用。贵族在裙子外再多系一片革制或丝绣的斧形服饰即是身份尊贵的标志。上衣下裳的服式到春秋之际被连接起来，下面垂到踝部，称为“深衣”。深衣是士以上贵族的常服。庶人一般穿褐，但也可以用深衣作为礼服。古代御寒的冬服有裘、袍等。裘是皮衣，毛向外，贵族在行礼与会客时要在裘外再加穿褐衣，即罩衣，否则将被视为失礼与不敬。袍最初是装填乱麻和旧丝绵的长衣，为贫困者穿用的衣服。所以，先秦时期穿裘还是穿袍，是有富与贫的显著差别的。

秦汉之后，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衣着等级制度日益完善。各级官吏与庶民在衣着服饰上，从式样、用料到颜色、花纹，都有明显的不同，不能有差错。如唐宋以后，龙袍与黄色就成为皇室的专用服色，其他人绝不能僭用，否则被视为“大逆不道”。其他官员“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①而平民百姓则禁止用大红和鸦青色，以免与官服相混。

服饰的等级在礼服和官服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古代帝王及高级官员的礼服上绘绣有十二种纹饰，即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雉）、火、宗彝（尊形）、藻（水藻）、粉米（白米）、黼（斧形）、黻（亚形），通称十二章纹。十二章纹由来已久，大约在周代已经形成，但在秦以前只是服装上的吉祥纹饰。直到东

^① 《明史·舆服志》，中华书局。

汉时期，章服制度作为封建礼仪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才真正确立。从此以后直到清代，十二章纹一直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章纹用法各代虽略有出入，但大同小异，仅以唐代为例即可知其大概。

唐武德四年（621年），朝廷发布的服饰令规定：天下只有皇帝可用十二章；皇太子及一品之服用九章；二品之服用七章；三品之服用五章；四品之服用三章；五品之服用一章。

明清时期，皇帝的朝服仍然采用十二章纹，而文武官员们则改章服为补服。补服也叫做补褂，是在常服上另加徽识称补子，缀于前胸及后背上，以金钱和彩丝绣成，使人一望便知其官衔和品级。明代洪武年间规定，公、侯、驸马、伯补子绣麒麟、白泽。文官的补子用鸟类图形。武官的补子则用兽类。

官服一般在公务和典礼时穿着，平时官吏可穿便服。何时穿什么服饰也都有礼仪规定，不能乱穿。官吏不论上级下级，如正式见面，一方穿官服另一方也应穿官服接待。下级穿官服拜见上级官员，上级官员不穿官服接见，便为失礼，下官甚至可以拒绝参见。

一般男服有袍、褂、袄、衫、裤等。秦汉时期的男子，主要穿着的是一种宽衣大袖的袍服。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男子的服装主要是袖口宽大，不受衣袖约束的衫。唐宋男子的服装仍以圆领袍衫为主。明代读书人多穿直裰或曳撒。平民则穿短衣。清朝一般男服有长袍、马褂。马褂，罩在袍衫之外，长仅及腰，原为军中服饰，因便于骑马，故称“马褂”。康熙末年，富家子弟开始穿着。雍正时，穿者日多。以后传至民间，不分贵贱，逐渐作为一种礼服。另有一种翻毛皮马褂，为达官贵人服用。长衫、袍褂是清代男子的主要礼服，官吏人士开两衩。不开衩的“一裹圆”，为市民百姓服装。此外，还有马甲，或叫坎肩，向例为王公贵族服用，至清后期人人可穿。



汉代妇女的礼服，仍以深衣为主。只是这时的深衣已与战国流行的款式有所不同。显著的特点是，衣襟绕转层数加多，衣服的下摆增大。穿着这种衣服，腰身大多裹得紧，且用一条绸带系扎腰间或臀部。此外，汉代妇女也穿襦裙。细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种裙子大多用四幅素绢拼合而成，上窄下宽，不加边缘，因此得名“无缘裙”。这种襦裙是中国妇女服饰中最主要的形式。东汉以后穿着的人虽一度减少，但从魏晋开始重新流行后，历久不衰，一直沿袭到清代。汉代妇女也有穿裤的，但大多仅有两个裤管，上端用带子系扎。后来宫中女子有穿前后有裆的系带裤名“穷裤”的，逐渐为民间仿效。

明代命妇服装，分礼服与常服两种。礼服用于朝见君后，参与祭祀等大典。主要有凤冠、霞帔、大袖衫、褙子等。明代一般妇女服装，基本上沿袭唐、宋式样。主要有袍衫、袄、霞帔、褙子、比甲、裙子等。清代命妇服装，与男服大体类似，一般妇女服装，有满、汉两种。满族妇女，一般穿长袍，或外罩坎肩；汉族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主。清中期以后也相互仿效。满族妇女的长袍，袍口平大，长可掩足，衣领较低，后腰身渐小，袖口渐细，衣领加高。外面往往加罩短的或长及腰间的坎肩，有对襟、一字襟、琵琶襟等各式。这种长袍以后演变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装——旗袍。

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西方服饰文化也传入中国。受西方服饰的影响，中国传统服装发生深刻变化。第一，服装不再标明等级；第二，服装颜色不再为某些人专有。也就是说服装已经脱离了等级政治，出现了形式多样、五颜六色的男女服装。

清王朝后期，自同治四年（1865年）开始，至光绪时期，先后几次选派学生出国学习。留学生到了国外，即开始着西装。以后，清政府开办学堂，操练新军，也采用了西式的操衣和军服。

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王朝的覆灭，服装观念发生变化，出现了“服装革命”。这时，公职人员的服装主要有西装和中山装。中山装是中西合璧的服装，直领，明兜，其余大体与西装相似。辛亥革命后，女装也有很大变化。有些妇女着西式衣、裤，西式女裙，西式大衣。

2. 冠冕的改变

中国的冠服制度，大约在夏商时期初步确立，到周代趋于完善。这以前，古代男子一般都是留着长发不剪，或稍加系束，冠以纶巾。夏商周时期，冠服制度已成为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分别等级尊卑的工具。按照周代典章制度的规定，凡举行祭祀大典，以及朝会、大婚亲迎等，帝王和百官都必须身穿礼服。礼服由冕冠、玄衣和纁裳等组成。冕冠，是帝王和百官参加祭祀典礼时所戴最尊贵的礼冠。成语“冠冕堂皇”，就是从冕冠非常尊贵这个意义上派生的。冕冠，包括冕缃、垂旒、充耳等几部分。周代冕冠是对后代有很大影响的冠服。周代一般男子大多戴冠帽，很少光头露顶的。冠帽除帽箍形之外，还有平形、尖形、月牙形及中间突出、两边翻卷等式样。大抵上低而平的是普通人所戴的，高而尖的是贵族阶层所戴的。

秦始皇常服通天冠，皇太子常服远游冠，百官戴高山冠、法冠和武冠。汉代以冠帽作为区分等级的主要标志。主要有冕冠、长冠、委貌冠、武冠、法冠、进贤冠等几种类型。按照规定，天子与公卿大夫参加祭祀大典时，必须戴冕冠，并以冕旒多少与质地优劣区分等级尊卑。长冠，又名齐冠，原是一种用竹皮制作的礼冠，后用黑色丝织物缝制。因为是汉高祖刘邦微贱时仿照楚冠创制的，又称“刘氏冠”。委貌冠，形制与皮弁相同，有些像翻倒的杯子，用帛绢制成。这两种冠均为参加祭祀的官员所戴。武冠，又名“鶡冠”。鶡，俗名野鸡，性好斗，至死不退。用作冠名，以表示英武，为各级武官朝会时所戴礼冠。法冠，又称“獬

豸冠”。獬豸是神羊，相传能分辨曲直，性忠，故为执法者所戴。进贤冠，为儒士所戴。西汉末年，据说因王莽本人秃头，怕人耻笑，特制巾幘（有些像便帽）包头，后来戴巾幘就成了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冠帽的形制颇具特色。汉代的巾幘这一时期虽然还在流行，但已有变革。如将幘后加高，巾呈平形，体积逐渐缩小至头顶之上，称“平上幘”或“小冠”。在小冠上加以笼巾，则成为“笼冠”。因为它是用黑漆细纱制成的，又称“漆纱笼冠”。后世的乌纱帽就是由此演变而成的。

唐代皇帝的服饰有大裘冕、衮冕、通天冠、武弁、平巾幘等。大裘冕包括礼帽和礼服。礼帽，外表黑色，里面浅红，用金装饰玉簪穿导，帽两边悬着的黄绵对着双耳。凡是郊祀、朝贺、宴会等，皇帝都戴通天冠。贞观八年，唐太宗开始戴翼善冠。此冠因冠纓像“善”字而得名。在讲武、出征、狩猎时，戴武弁。乌纱帽是太子视事及宴见宾客所戴之冠。乌纱帽是南朝宋明帝初创制的，用乌纱抽扎帽边。文官朝会参见帝王时戴进贤冠。司法官员戴法冠。幘头，包头软巾，也叫四脚、折上巾，有四条带，两带系于脑后下垂，两带反系头上，令其曲折附顶。它始于北周。唐代以罗代绉，把四脚改成两脚。两脚脑后交叉，叫“交脚幘头”，为武官所戴；两脚左右伸出，叫“展脚幘头”，为文官所戴。明代乌纱帽成为官帽。样式前低后高，两旁各插一翅，通体圆形，外表用黑皱纱，帽里为漆藤丝或麻，既轻又牢固。明代一般人平时用巾帽。明代巾帽形制繁多，胜于历代。最常见的是网巾。网巾编结如渔网，是一种束发髻的网罩，多以黑色细绳、马尾、棕丝编织而成。另有儒巾和四方平定巾，是士人所戴之巾。软巾，也称唐巾，用软绢纱制作，有带缚于后，垂两旁，比较普及。

清代，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两冠。分冬夏两种。冬天所戴之冠称暖帽，夏天所戴之冠称凉帽。皇帝暖帽为圆

形，帽檐反折向上，上缀红色帽纬，顶有三层，用四条龙相承，饰有东珠、珍珠等。凉帽则是前缀金佛，后缀舍利，亦缀红色帽纬，饰东珠，顶与暖帽相同。皇子、亲王、镇国公等，朝冠形制与皇帝之冠大体相同，仅帽顶层数及东珠等饰物数目递减而已。文武官员的冠顶，上衔顶珠，其质料、颜色依官员品级而不同，如一品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等。顶珠之下，有一只两寸长短的翎管，用以安插翎枝。一般官吏士庶所戴之帽，最常见的是瓜皮帽，系沿袭明代六合帽式，作瓜棱形，圆顶，顶部有一红丝线编的结子。一般市贩、农民多戴毡帽。冬天人们也戴风帽，又称“观音兜”，因与观音大士所戴相似而得名。夏天则戴笠帽、凉帽等。

近代开关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帽子的观念发生转变，帽子仅为头部服饰，它不代表等级。人们开始“穿衣戴帽，各好一道”。于是，传统的冠冕逐渐抛弃，而逐渐引进西方的礼帽。在辛亥革命后的公职人员中，礼帽成为比较常见的冠服。西方礼帽，圆筒而宽沿，一般为黑色呢料。礼帽的传入，宣告了中国几千年冠服制度的瓦解。

3. 发式的改变

中国发式有两大系统，一为汉人系统，一为少数民族系统。汉人男子必须束发于顶，而少数民族男子则披发，甚至有时剃发。

辽代男子发式依契丹族习俗多作髡发，头顶头发剃光，两鬓或前额留下少量头发作为装饰，有的额前留一排短发，有的耳边披散鬓发，有的把左右两绺头发修剪成特殊形状，下垂至肩。

蒙古发式，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剃“婆焦”。它像汉族儿童留的三搭头，即在头顶正中交叉剃出两条直线，然后把脑后四分之一头发剃去，正面四分之一剃去或剪成不同的样式，有尖角形、寿桃形、覆盖在前额，把左右两侧头发编成辫子，披在肩

上。

满清入关以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下剃发令，令汉人在限口内尽行剃发，效女真发式，以此作为归顺与否的标志。汉人男子全部剃发。其发式为：头顶以前到鬓角头发剃去，脑后四分之一头发也剃去，后脑盖头发编成辫子，披在身后。

在近代，随着西方风俗的传入，有些男子发式发生变化。清王朝后期，自同治四年（1865年）开始，至光绪时期，先后几次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留学生到国外，即剪掉辫发。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发式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发式不带任何政治意义。男子尽行效法西方人士，一律剪成短发。

4. 跪拜礼的废除

在社交礼俗中，跪拜礼是古代使用年代最长、频率最高的基本礼节。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人们互相致意的姿势，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周礼》把跪拜礼分为九种，合称九拜，即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和肃拜。

稽首是最隆重的跪拜礼，属于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师以及拜天、拜神、拜庙之礼。动作是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然后头也伏在手前边地上停留一段时间。因为头至地稽首多时，故称稽首。顿首是地位相等的人互用的跪拜礼，其行礼方法与稽首同，只是俯身引头至地就立即抬起。因为头触地的时间很短，只略作停顿，所以叫顿首。空首是国君回答臣下或尊者对卑者的答拜礼。行空首礼时，身体先取跪姿，然后拱手至地，接着引头至手。所谓“空”，就是头并没有真正叩到地面，而是悬在空中。以上三种是正拜，属吉事之拜。

振动、吉拜和凶拜三种是凶事之拜。振动与吉事之稽首礼相当，是丧礼中最重的跪拜礼。所谓“振动”即“拜而成踊”。踊指跳起脚来哭的动作。吉拜是“拜而后稽颡”，因以其拜与顿首相近，故谓之吉拜。凶拜是“稽颡而后拜”。稽颡也是古代的跪

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在居丧答拜宾客时行此礼，表示极度的悲痛和感谢。

奇拜是指一次拜，褒拜是反复两次以上的拜礼，二者都是进一步说明拜的次数的，不是独立的拜礼。

肃拜是妇女的正拜，其拜仪是屈膝跪地，下手至地而头微俯。男子在军中也行肃拜礼，这是因为将士披甲，不便于行其他拜礼。肃拜是九拜中最轻的。女子之所以比男子礼轻，大概与母系社会时期女性长期居于受尊敬的地位，不必行大恭大敬之礼的传统习惯有关。而且就是这种轻的肃拜也只沿用到唐代。武则天自立皇帝后制定礼仪，将女子的拜姿改为正身直立，两手放胸前，微俯首，微动手，微屈膝。这种拜仪当时称为“女子拜”。唐宋时期，女人在行这种拜礼时常常口称“万福”，所以后来又把女人拜礼叫“万福礼”。这种拜俗从武则天改制开始，一直沿用到清代。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发布命令，废除跪拜礼。社交中的礼拜，采用西方的鞠躬礼。这种礼拜的姿势为正身直立，两手垂放，手指并拢紧贴两股，曲身俯首。

5. 丧服与居丧的改变

中国人有居丧的礼俗。居丧期要穿丧服，丧服的区别是由生者与死者亲属关系的远近而决定的。丧服共分五等，俗称“五服”。根据《仪礼·丧服》的记载，其名称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緦麻。居丧期也分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

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其衣用粗麻布制成，麻布不缝边，斩断处外露，另还截一段粗麻布像围裙那样围住下身。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子为父、父为长子都服斩衰。子为父服斩衰还要系粗麻腰带，执孝杖（俗称“哭丧棒”）。妻妾为夫，未嫁女为父服斩衰还要用麻系在发髻上，称为髻衰。斩衰居丧期按规定为三年，实际执行是 25 个月（或 27 个月）。

齐衰服也用粗麻布，但缝边较整齐。齐衰居丧期又分为四种。齐衰三年，是父卒为母、母为长子的丧服。齐衰一年分杖期与不杖期。杖期是父在为母，夫为妻的丧服，因在丧礼中执杖而得名。不杖期是男子为伯叔母、兄弟、其他儿子，女子为娘家父母、媳妇为公婆及孙子孙女为祖父母的丧服。齐衰五月，是为曾祖父母的丧服。齐衰三月，是为高祖父母的丧服。

大功次于齐衰。功指织布及制丧服工作。其服用熟麻布制成，较为精细。大功丧服为九个月，是男子为姊妹和姑母、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女子为娘家兄弟、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以及公婆为嫡子之妻的丧服。

小功也是熟麻布，但丧服较大功更为精细。小功丧期五个月，是男子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堂姐妹、外祖父母，女子为丈夫的姑母姐妹及兄弟媳妇的丧服。

緦麻是五服中最短的丧服，用细麻布制成。緦麻服丧期三个月，凡较疏远的亲属、亲戚，如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外祖父母、岳父母、中表兄弟、婿、外孙等都服緦麻。

按照礼制，在服丧期间还有许多居丧的规定要遵守，称为“守制”。其具体内容有几个方面。一是庶民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至居丧期满。如因军事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官员守制没有期满，朝廷也可强令其出仕，这叫做“夺情”或“起复”。但在入署办公时应穿素服，而且不能参加朝会祭祀等礼仪。官员如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惩罚。二是禁止婚娶、饮宴等喜庆之事。三是禁止赴考。

辛亥革命后，随着西方风俗的传入中土，中国的丧服和居丧制度发生了改变。学生、知识分子及广大公职人员废除五服服饰，而改用西方的臂纱。守制的规定也自觉废除，人们不再因为家中发生丧事而辞去职务。人们对丧事开始抱有西方人上的那种“节哀顺变”的达观态度。

6. 婚俗的改变

中国古代婚姻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处于主导地位的还是媒聘婚，即经过明媒正娶的婚姻形式。媒聘婚自周代起就有了一整套繁琐的礼节仪式。《仪礼》规定聘娶婚礼必须经过六个程式，即“六礼”。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即男方具送求婚的礼物。男家首先须请媒人到女家说亲，得到女家应允后再送上雁作为礼物，并正式向女家说明缔婚的请求。为什么要用雁作为礼物呢？因为雁中雌雄成双是固定的，一只死亡，另一只就不再择偶。以雁为礼象征爱情的忠贞。不过，雁越来越难得，后世往往以鹅、鸭或鸡来代替。

问名是男方派遣的使者在纳采礼后，请问女方生母之名，女子本人名、排行及出生年、月、日、时等，以便回来后占卜婚姻的吉凶。问名也是以雁作为礼物，女家则要设酒宴进行款待。

纳吉，男方得知女子之名后，即在祖庙占卜，预测婚姻是否吉顺。获得吉兆后，就派使者带着雁到女家报喜，叫做纳吉。纳吉之后，婚约就算正式确定了。如果男家在祖庙卜得凶兆，预示婚事不成，那么就无须再行纳吉之礼了。

纳征，是向女方送聘礼。最初为帛、皮等物，后来聘礼为金钱财物所取代，故纳征又称“纳财”。

请期即男家选择好合婚的吉日后，派使者依然带着雁礼，去征求女方同意。

亲迎是婚礼中最重要的仪式。到了婚期，新郎乘车亲往女家迎娶新娘，举行婚礼。

上述六礼，周代主要是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实行，一般庶民往往有所精简变通。但是，这六礼却成了后代婚嫁礼仪的基础，其主要仪节一直在古代社会沿用。

近代以来，西方恋爱、婚姻观念传入中国，影响中国婚俗。

首先，在西方自由恋爱的影响下，一部分青年人自行择偶，

改变了传统中国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的状况。

其次，近代男子婚姻开始简化手续，废除了婚姻“六礼”程式，代之以结婚庆典。结婚庆典标志自由恋爱的结束和夫妻生活的开始。

7. 贞节问题的淡化

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妇女贞节问题。

远在周代的礼制中，便提出了妇女要“贞”的要求，但这主要是为保证继嗣的可靠，比起后世封建社会越来越严格的贞操要求，比起后世逼女子“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是比较宽泛的，它没有对女子的改嫁、离婚提出限制。

从秦汉到唐朝，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对男尊女卑和妇女贞节问题的强调逐步系统化、理论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用朝廷的名义表彰寡妇，力求树立男女有别、谨守贞节的榜样。清是巴蜀地区的一个寡妇，她青年丧偶，靠着祖传丹穴作为生计。秦始皇称巴蜀寡妇清为“贞妇”，还特地为她筑了女怀清台。汉因秦制，对于贞节更加提倡，汉宣帝就有赐给贞女帛匹之举。汉平帝和汉安帝，也都曾专门颁布诏书，表彰贞女。

《礼记》对贞妇的要求是“一与人齐，终身不改”，即妇女一经嫁人，终身不得改嫁。妇女的“贞名”与男子的“气节”同为汉代儒家礼法所推崇。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用传记的形式提出了束缚女性的六条规范，其中表彰了许多从一而终的寡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班固编定的《白虎通义》也突出宣扬了从一而终。特别是班固的妹妹，被称为曹大家的班昭所撰的《女诫》，更是将这一点提到了理论高度。她说，丈夫有再娶的道理，妻子则没有改嫁的依据；丈夫是天，天是笼罩一切的，所以妻子不可与夫离异。

从《后汉书》开始，历代绝大多数正史都立有《列女传》。

《后汉书·列女传》中，为守节者列传虽然只占少数，但为宋代以后将列女传变为节妇烈女传的做法打下了基础。

圣贤的遗训，成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限制了寡妇的再嫁。从汉代开始，历代都出现了一些断发、毁容、誓不再嫁的“烈女”。东汉刘长卿早死，留下的儿子也夭折了，他妻子桓氏怕父母要她再嫁，非但不肯归宁父母，而且预先割耳毁容，以示决不再嫁。东汉荀采 17 岁嫁给阳瑜，后丈夫亡故，其父荀爽强令改嫁。荀采誓不相从，结果自缢身亡。

宋代出了几个大儒，创立了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的方法治经的理学，使中国的学术思想以至风俗制度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理学家以“穷天理，灭人欲”作为理想的道德原则，因而对贞节问题看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北宋仁宗时的理学家程颐已将贞节问题推到极端。他在回答“当寡妇穷而无所依托，是否可改嫁”时，断然说道：“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一段话经过其他理学家的一再宣扬，成为理学的一句名言，影响极为深远。

南宋初期，程颐的四传弟子、集宋儒理学大成的朱熹更加竭力鼓吹贞节观。丞相陈俊卿之子陈师中的妹夫死后，他就写信去，要陈师中设法让其妹妹守节。信中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不可改易的道理。朱熹还几次要求地方上将事迹显著的节妇详申上去，予以“旌赏”，对于不守贞节的妇女，也要上报官府，予以惩治。逐步形成的系统的理学观念，还认定妇女的最高目标是贤良，而不是贤能，并将“贞”与“忠”相提并论，忠臣死于国难，愈惨烈愈能动人心魄；女子守贞，愈艰难奇特，就愈能表其心迹。要求女子遇到困难或强暴，一死了之。困难愈大，死得愈惨，动人怜悯愈深，便节烈得愈好。这类极端的封建道德说教，摧残了无数妇女的身心，吞噬了千万无辜女性的生命。宋元明清历朝，正史《列女传》中所收贞女一代比一代多。据统

计，节妇人数，宋朝 152 人，元朝 359 人，明朝 27141 人，清朝前期 9482 人；烈女人数，宋朝 122 人，元朝 383 人，明朝 3688 人，清朝前期 2841 人。可见明、清两代妇女受封建贞节观的摧残和毒害已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

1840 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入，西方资本主义婚姻家庭观也传入中国。封建的贞节观念与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一起发生动摇。19 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向西方借鉴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对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封建宗法家庭制度和男尊女卑等封建纲常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对近代史上家庭伦理思想方面的变革产生了积极影响。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随着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知识界中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的呼声日趋强烈。广大妇女逐渐从“守节死义”的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

8. 妇女地位的提高

中国古代的妇女地位是低下的，并且越到后代，地位越低。

在西周宗法家长制确立以后，女子地位便开始明显下降了。因为礼制规定国家政权、家庭产业都由父子相继，世代相承，所以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生养儿子，而对女儿的出生表现出无关痛痒的态度。“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① 孩子一生下来，就因性别的差异得到了父母不同的待遇，男孩睡在床上，给他包的是衣裳，玩的是玉璋；而女孩只能被置于地上，包的是衣褂，玩的是纺线用的瓦。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表现得竟如此泾渭分明，后人称生男孩为“弄璋之喜”，生女孩为“弄瓦之喜”，典故就出于此诗。

^① 《诗经·小雅·斯干》。

在周代，女子在家庭中已开始逐步受到三从四德的束缚，家庭中“男外女内”的格局已经形成，《易经》中就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太义也。”治内之妇必须以治外之男的意愿为依归，没有独立的自主权利，只有从属的家庭地位。两周时期的这些轻视女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秦汉至唐，中国封建社会由发端而至鼎盛，承袭于奴隶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封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和巩固，而作为它内容之一的男尊女卑思想则更加提高和完善，“夫为妻纲”，“出妻”为主要方式的专权离婚，构成了男尊女卑思想的主要内容。

汉代人将“夫妇”或“夫妻”称谓的含义作了十分明确的解释。“夫”指扶持，是可以依仗的人，“妇”的意思则是屈服顺从。《白虎通义》公然指出：“夫者，扶也，以道扶持。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妻则被解释成另一个谐音“齐”。但这并非说妻子在地位上与丈夫平等，而是要求“贞齐与夫”、“从一而择”、“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透过这类以音释义的表象，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夫妻间不平等的地位与男尊女卑的倾向。

夫妻关系的不平等最集中地体现在主要由丈夫独断专行的“出妻”制上。在汉代，西周礼制中的“七弃”被法律固定了下来。“七弃”即“七出”，妻子如果犯了不孝、无子、淫乱、嫉妒、多言、恶疾、盗窃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有权将她休弃。

到唐代，唐律在沿袭了汉代以来“七出”制度的同时，又规定了“三不去妻”的原则。即曾和丈夫共同主持过公婆丧事的妻子不能去，贫困时娶的妻子富贵后不能去，妻子没有归处的不能去。但既有“七出”的规定，妻子符合“三不去妻”的条件，丈夫也可找出种种理由将其逼走。

唐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由前期向中、晚期的转变，政治统治上的高度集中，使得家庭立法、制度更趋严密、完备，

这样使得宋元明清时期妇女沦入黑暗深渊。

在宋代以来，法律处处都体现着“夫贵妻贱”的原则。例如，关于夫妻财产，宋律规定，妻的财产，由夫与妻共同为主；丈夫典卖妻的妆奁、田产，不为违法；妻子如自己要典卖妆奁田产，亦应由其丈夫出面立契。明代关于处理夫妻互相毆打的法律规定，更是夫妻地位不平等的写照。“凡妻毆夫者，杖一百……至笃疾者，绞；死者，斩；……其夫毆妻，非折伤，勿论。”^①不仅如此，法律还限制妻、妾告夫的权利。如清律规定，妻妾告夫与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同为“干名犯义”罪，要杖一百徒三年，诬告者绞。即使是丈夫与人通奸，做妻的也不能举告，而丈夫却有捉奸的权利，即使当场把与人通奸的妻子杀死，也不过是杖八十了事。

宋代以来夫妻关系的不平等还表现在承袭前代的“出妻”制上，宋、明、清三代“七出”、“三不去”、“义绝”等律法基本循唐旧制，丈夫若认为妻子犯有“七出”中之一“出”，而妻又无“三不去”之理，便可有权出妻。

法律的苛严、礼教的专制，大大扭曲了明清时代妇女的人格和形象。清人陆圻这样形容新婚女子：“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气，遇下人不敢呵骂，一味小心谨慎，则公姑丈夫皆喜。”他还劝告妻子，不要对丈夫“游意倡楼，置买婢妾”有不满表示。妻子只有“能容婢妾，宽待青楼”才是值得称赞的。这些压抑、贬低妇女、损害妇女人格、鼓吹夫权的观点，与北宋以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交杂在一起，不仅在行为方式上，而且在深层心理结构上，严重束缚了妇女的自主，妇女与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 and 权利上的差异更进一步拉大了。

近代以来，受西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妇女地

① 《大明律》。

位开始逐步改变。

洋务运动中，一些满脑子都是封建礼教和华夏变夷古训的出使人员和留学生，一下子置身于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世界，看到了妇女竟然公开参加社交活动，甚至公开接吻，惊得目瞪口呆；对于外国高级官员的一夫一妻生活，也感到无法理解。他们当作笑料零星地介绍到国内，国内人开始也看成是海外奇谈。随着时日的推移，有些人在国内尽管恪守封建礼法，到了国外却羞羞答答地以夷变夏了，让随同出国的子女穿洋服，上洋学，学习与四书五经完全不同的知识，也让他们的夫人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到后来，有些人为了便于在国外和外国人交往，出国时还特地带上可以应付交际场面的夫人。例如出使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大臣洪钧这位同治年间的状元，就以重金把沪上名妓赛金花收纳为妾。到了国外，赛金花以大臣夫人身份参加社交，出过不少风头。德龄和容龄姐妹，随父亲裕庚出国，学了外语及西洋音乐、舞蹈知识，回国后，极端顽固的慈禧太后出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需要，破格把这两姐妹选为近身侍从。这一切，都并未真正涉及妇女解放问题及婚姻家庭的改革，影响也有限，但总还是让人们见了点世面，引发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思考。

正式提出妇女解放问题并有过某些行动的，是继洋务派而起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有因翻译西方名著而轰动一时的严复，都曾足妇女解放的倡导者。他们的主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不缠足。1882年，康有为在广东发起女子不缠足的“不缠足会”，后来由他弟弟康广仁主持，在广东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不缠足会”。不久，上海也出现了“不缠足会”。为了宣传不缠足，本世纪初，上海的“中国天足会”还专门出版过《不缠报》。女子缠足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李后主见他的宫女用帛缠足，纤巧弯曲如新月，穿着素袜在金制的六尺高的莲花上

跳舞，飘飘然如水仙乘波，便下令全国女子都要缠足。宋太祖灭了南唐，却把这一残害妇女的“发明”保留下来，进行推广。到后来，“三寸金莲”竟成了女性美的重要标志，姑娘脚大，嫁人都不容易。太平天国曾下令妇女放脚，太平天国失败后，脚又缠得更紧了。康有为曾亲眼目睹他姑母因缠足无法随男人逃难而反对缠足。梁启超 1897 年在他宣传变法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中，尖锐批评缠足是“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戮，以快其一己之耳目之玩好。”紧接着他又起草了《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其中规定，入会者的女儿都不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已缠足者，在八岁以下，一律放足。严复更大声疾呼，女子敷粉缠足是“坐食待毙”；禁缠足，是妇女自立、自强的前提，而妇女的自立自强，又“为国政至深之根本。”1903 年，上海的“中国天足会”还专门出版了报纸，进行不缠足的宣传。

其次是兴女学。中国的第一所女学，是外国传教士 1844 年在宁波创设的女子学塾。1851 年，外国传教士又到上海来创办了裨文女校。中国人首先倡办女学的是郑观应。1897 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进一步论述了兴办女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天下积习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天下大本”有二：正人心，广人才。这二者都要从“蒙养”开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梁启超认为：保国、保种、保教为天下三大事。他进一步指出：教，包括男，也包括女，男女各半。而男子之半，又出于妇人。因此，他提出妇女教育是保教、保种、保国之必须。梁启超还强调，女子只有通过受教育，才能学得谋生能力，并进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在女子教育的问题上，严复的见解比梁启超高明得多。1898 年，他在《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一文中强调，“人之学问，非仅读书，尤宜阅世”。阅世，就是读今人之书，知当世

之事，而不能把“压制妇女，待之以奴隶”的《列女传》、《女诫》之类的孔孟之书当作课本。

再次，主张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严复曾在英国留学，资产阶级的婚姻制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男女自行择偶”和“妇女之出门晋接”即参加社交活动，“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行之俗”。婚姻是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必须由自己做主，决不能像“探筹抓阄”似的，一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复还针对自由择偶、社交公开将造成“越礼”、“乱俗”的叫嚷，反驳他们说：“大家妇女，其防闲密矣，岂绝无越礼之事乎？小家妇女，其防闲又疏矣，岂尽人皆越礼乎？”嘲笑这种叫嚷是“不足辩也”。康、梁和严复等人还主张，妇女要在经济上独立，寻求谋生之道，如果一切全都依赖丈夫，妇女就不能有独立的人格。他们也提倡妇女社交公开，开展性教育。谭嗣同在《仁学》中说，淫起源于对“淫器”的神秘感。如果“淫器”是生在额头上，为人们所习见，没有神秘感，就不至于淫乱了。

维新变法失败，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变成了落伍的保皇派，他们曾经提出的妇女解放的主张，也渐渐被他们自己所抛弃，转而鼓吹孔孟之道，复古倒退。

但是历史已跨进 20 世纪，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也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样，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本世纪初，一批进步资产阶级思想家，又重新开始争取妇女解放的革命活动。

开办女学。1902 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也是比较强调用新的文化知识和爱国思想培养学生的女校。紧接着，又有人办起了务本女校、城东女校和以职业教育为目的的蚕桑学校等。有的女性，也起来创办女校。在其他省市，女校也相继出现。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校，发展更快。据长期在我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统计，

截至 1902 年底，单是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就有 4373 人，约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1907 年，清政府官办了京师女子师范学校，培养对象是小学教师和蒙学院保育员。辛亥革命以后，这所学校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创立我国第一所女校的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长的身份，首先在北大开了女禁，招收女大学生，从此大学才开始男女合校。

倡导女权。在办女校的同时，女权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1902 年，上海出版了由女性创办的《女苏报》和《女学报》。1903 年，以宣传女权为中心内容的《女界钟》一书出版。第二年，丁初我创办了《女子世界》杂志。1905 年广州出版了《岭南女学新报》。《女界钟》认为，女子变成畸形，受人奴役，是由不读书、不社交、无正当消遣，特别是由“三从四德”及“七出”等封建礼教造成的。强调妇女应当有入学、交友、营业、财产、人身和婚姻自由六种权利。其中还“要求女子脱离奴隶地位，作他（她）自己的人。”这份杂志除了鲜明地提倡女子教育、女权和“女子家庭革命”以外，还经常通过报道，以触目惊心的事例揭露封建婚姻、家庭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同时，资产阶级女革命家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和女子学校，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和教育。她不断写诗著文，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宿妓蓄妾，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男女平权，号召女子走出家门就业，在经济上自立。

妇女参军、参政。在辛亥革命中，不少先进妇女，从争取妇女解放转而直接参加到推翻清政权的实际斗争中去。武昌起义胜利后，秋瑾的女友吴淑卿组织了第一支革命女军。同年底，女子革命军在上海纷纷成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沈警音和唐群英等领导的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张馥真、林宗雪领导的上海女子国民军等。妇女不但参加武装斗争，还组织了妇女参政同盟会，争

取妇女参政的权利。

然而，中国妇女的解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出现一个新局面。1916年1月，陈独秀以（一九一六年）为题，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高呼“三纲”要打破，青年女子要从被征服的地位起来居于征服地位。李大钊、鲁迅以及周作人、胡适等人，也都相继发表文章，抨击孔孟之道、封建纲常，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部分论述，共产国际妇女运动的活动，十月革命后苏联妇女的新生活，在中国都陆续作了介绍。资产阶级国家关于妇女、家庭问题的论著和文艺作品，如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家庭问题”剧本《娜拉》，也在这时翻译出版。这一切，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高潮。

第二节 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观念 及思维方法的影响

西方文化不但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对中国人的观念及思维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它改变了传统中国人“崇古薄今”、“家庭本位”、“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旧的观念，代之以“后胜于今”、“人格独立”、“商业富国”、“义利统一”等新观念。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最大规模的观念更新。同时，西方科学的思维方法，也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定势。这里说明一点，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观念的影响是广泛的、多方面的，今限于篇幅，只谈其荦荦大者。

一 从“崇古薄今”到“后胜于今”

历史上中国人有着牢不可破的崇古观念。这种观念来源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认为：如同“天”永远不会变化一样，决定社会与历史命运的“道”也永远不会改变。既然“道”永远不会改变，那么，从古代沿袭下来的种种规范、习俗，即传统，具有神圣性，并愈加贴近“道”的古代本身，也就愈加值得尊崇。因此，在古代社会，“崇古薄今”就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孔子说 he 自己是“信而好古”，而“人心不古”，是人们批评世风日下的一个常用语。

崇古思想是与远古时代崇奉祖先的宗法思想连结在一起的。中国古代宗法制盛行不衰，“敬天法祖”也是历代一脉相承的思想原则。因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黄帝、尧、舜、禹等被奉为圣人，而由禹、汤、文、武、周公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又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为完美的、最为理想的黄金时代。这样，古人的思想出现了奇特的扭曲：与相信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近代进化论的见解相反，古人却相信，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是倒退了，今不如昔。所以古代志士仁人的最高理想，就在于阻止社会“滑坡”，使之能重新回升到三代。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古人“崇古薄今”、复古的心理，根深蒂固。例如，井田制是周朝奴隶制时代的一种土地占有制。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到尽头，井田制也随之瓦解。但是，历代总有人把这种井田制理想化，想恢复井田制，用以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宣布土地国有，不允许买卖，就是想恢复井田制。王莽改制失败后，许多人并没有醒悟，甚至到了宋代，一些儒生仍然在倡导恢复井田制。

这种崇古的观念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更为严重。首先孔子就

提倡“述而不作”。汉代以降，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二千多年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术，于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思想，也就成了封建文人学士共同遵循的治学原则。而且又有所谓的“道统”说，就是强调从尧、舜、禹、周公、孔子，一脉相承，已经把天下的道理都穷尽，生在其后的人，只要继承这个“道统”就行了，不必再去发挥什么新思想、新学说，这叫做“代圣贤立言”、“为圣人继绝学”。不仅如此，古圣人说过的话都是绝对真理，是不能随便议论的，否则，就是“非圣无法”，这个罪名之大，是可以将人治死的。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就出现了以下奇观：古代所谓“五经”，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不过是古代的典籍和研究历史的史料而已，但古代的读书人却把它视为圣贤的经典，治国安邦的鸿宝，把毕生的精力用于读经、校经、释经、解经。到了清代初期，考据学盛极一时。经学家为了考证书中的一个字或一种古物，往往殚精竭虑，成书洋洋数万言。历代经学家辈出，著述汗牛充栋，但内容陈陈相因，都不过停留在对经书的校勘、考证、注释上，谈不上对经书内容本身的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对传统的尊崇，又往往形成抗拒革新的强大惰性力。古代变法革新的事例不少，但几乎都夭折了。改革家们遭人攻击的一个共同的罪名，就是“变乱成法”，破坏传统。如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变法，曾遭到楚国守旧贵族屈宜臼的指责，说吴起变法是“变其故而易其常”，吴起用兵是“逆之至也”，并认为楚悼王注重改革是“逆天道”，任用吴起将助逆成祸，他甚至当面辱骂吴起为“祸人”。又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了著名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也曾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公子成认为赵武灵王是违背圣贤的遗教，变更古代的章程，是万万行不得的。总之，守旧者认为，列祖列宗传下来的“祖宗成法”是不能改变的。改革就是进步，对改革的抵制以及

对改革者的打击，就是因循守旧，就会使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因此，崇古观念，是传统中国最陈旧、危害中国最严重的观念之一。

中国人的“崇古薄今”观念在近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后胜于今”的观念。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变易思想的作用；二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对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后者的作用尤大。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儒学自始至终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儒学中，以研究、阐释儒家经典的“经学”最为重要，被历代统治者尊为显学，经学书籍被列为古代四部典籍之首。汉代经学中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前者重“微言大义”；后者重“名物训诂”。此后 2000 多年，两派一直争论不休，起伏不定。清初“朴学”大盛，古文经学占上风。清代中期以后，今文经学中包含的“穷变通久”的变易思想受到重视，认为历史是变化的，有所谓“三统”、“三世”之说。“三统”即为夏、商、周三代，夏为黑统，尚黑色，商为白统，尚白色，周为赤统，尚红色，表示三代有所损益，有所变革；“三世”即指社会演进的山“乱世”而“升平”而“太平”。这一观点对瓦解“崇古薄今”传统观念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近代利用今文经学的观点，否定“崇古薄今”观念，并以此作为实行改革和维新的根据的代表人物有两位，前期为龚自珍，后期为康有为。

龚自珍反对凡古皆是，盲目信古、崇古、好古的观念，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①“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②他相信

① 《定庵文集·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② 《释风》，《龚自珍全集》。

《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目睹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国势日衰的社会现实，主张变更祖宗成法，实行社会改革。他提出的改革社会的内容虽然只局限于“限田”、“均田”、破格录用人才、整顿贪污、废除跪拜等等支流末节问题上，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落后的现状，但他的思想为近代中国人破除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及解放人们的思想，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此，梁启超给予很高的评价：“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①

龚自珍之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继承今文经学这一传统，进一步抨击了“崇古薄今”观念，主张变法自强。他根据东汉何休所著的《春秋公羊解诂》一书中所说的“传闻衰乱世，所闻升平世，所见太平世”的观点，提出公羊三世说的顺序应该是“据乱世”进而“升平世”进而“太平世”。康有为把三世说和“小康”、“大同”二法结合起来，合称“三世二法”。他又将三世和西方传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至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尔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②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太古蒙昧状态到文明时代，从低级社会发展到高级社会，未来到达大同世界。根据上述的看法，康有为提出：社会历史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不能墨守成规，恪守祖训，要日新又新，与日俱进。他提出：“旧则塞滞，新则疏通；旧则腐败，新则鲜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41 年。

② 康有为《论语注》。

明；旧则颓败，新则整饬；旧则散漫，新则团结；旧则羸落，新则发扬；旧则形式徒存，人心不乐；新则精神振作，人情共趋。”^① 旧即为古，新即为今，是崇古还是厚今，结果相关悬殊。康有为批判崇古守旧的观念，说：“中国之俗，向忠于远而不近，旧而不新，失此灵药，致成痼疾。”^②他认为由旧而新的变化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使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何从而生？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③ 并认为历史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④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⑤ 康有为的思想不仅促进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开展，而且为打破中国人“崇古薄今”的落后观念起了不小的作用。

虽然今文经学“变易”思想对“崇古薄今”观念有一定的瓦解作用，但真正称得上“崇古薄今”观念克星的是西方“进化论”思想。不同的民族文化互相碰撞，互相交流，可以帮助本民族文化消除那种陈腐的社会心理。西方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中国人传统观念的变化就是明显的例证。

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学说本是生物学中的一个理论。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支持者，他的演说集《天演论》（原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了前半部分，并定此名。“天演”即“进化”之意。）是介绍和宣传进化论的。严复于 1895 年开始着手翻译赫胥黎此书，并于 1898 年正式出版《天演论》，这是进化论学说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之始，使中国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是社会达尔文

①②康有为《论语注》。

③④《变则通通则久论》，《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

⑤ 《上清帝第六书》，《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选编》，三联书店 1957 年

主义，即庸俗进化论，其创始人为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他在社会问题上只承认渐变（即改良），否定质变（即革命），并把世界人种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类，优者胜而劣者汰。由此可见，这是欺压、剥削广大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强权逻辑的理论。但是，严复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后出现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其介绍进化论的出发点是想使中国免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号召人民起来自强图存。《天演论》出版后，风行全国，进化论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经常议论的话题，成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等词汇成了当时人们的口头禅，甚至许多人取名或把学校定名为“自强”、“自力”、“自存”，“竞生”、“竞存”，“适”、“适存”、“演存”、“进化”、“进步”等，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严复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观念，指出：中国人讲“常”，进化论讲“变”；“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① 中国人主张历史循环，“天不变，道亦不变”，西方人主张历史进化，日进无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以为“天运循环，周而复始”，西方人以为事物是变化的，竞争是必然的。显然中国人的观念是落后的，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那么，如何改变中国人的崇古观念呢？严复运用了近代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人类演化的历史来论证进化的必然性，强调“世道必进，后胜于今”。^②

进化论的传入，给中国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崇古薄今”观念以致命的打击。从此以后，“后胜于今”的历史进化观逐渐深入人心。“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②严复：《天演论·导言》，《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

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①于此，“崇古薄今”观念逐渐瓦解。

中国人“崇古薄今”的观念被打破，“后胜于今”的观念形成，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巨大的影响。首先，这种变化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新了人们的陈旧观念，使人们相信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不断发展的。“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②先进的中国人用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好古而忽今”的复古主义和“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论，认为社会要进步，一定要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他们反对今不如昔的论调，反对那些食古不化的顽固派，批判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哀叹。他们用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告诉人们社会总的趋势是不断变化的。政治制度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化，从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以至民主共和政体。这样就使中国人民逐渐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资产阶级“天赋民权”、“主权在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时“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乃至“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崇古薄今”观念的改变，没有进化论的传入，中国近代就不会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就不会有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正因为进化论的传入对瓦解中国人传统观念有如此巨大的作用，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信奉过进化论。也正因为严复系统介绍进化论对更新中国人的观念、解放中国人的思想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经验时，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

① 《述侯官严氏最新政见》。

② 严复《天演论·新反》按语，严复集，1986年。

列，称他们是共产党出世前探索国家出路的代表人物。^①

其次，反对“崇古薄今”的腐朽观念，坚持“后胜于今”的进化论观点，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如前所述，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在表述的时候披上了一件中国式的“公羊三世说”的外衣。维新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梁启超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也是从反对崇古观念，鼓吹进化论为起点的。他把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世相演，循序以进。他认为当今之世，“民为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可移易的人类社会公理。沿着这条路走，是顺变易之常理，会蒸蒸日上；违背变易之公理，崇古非今，不思变革，其结果必将自取灭亡。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反对“崇古薄今”，用进化论鼓吹革命。邹容在《革命军》中便宣称：“革命，天演之公例也。”孙中山也从西方学来了进化论，他非常推崇达尔文的学说，认为《物种起源》一书是划时代的著作，自该书出现以后，“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依归于进化矣。”^②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变革，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趋势，也就是说民主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不仅如此，进化论的“世变”观，鼓舞中国人民去争取民族的生存，争取民族的自救，以此唤醒了人民“保国保种”的爱国民族主义意识，对近代中国各阶级、阶层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有积极的作用。

总之，“崇古薄今”观念的改变，对解放中国人民的思想，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②《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更新人们的观念，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运动以及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崇古薄今”观念的破除，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过程。

二 从“家庭本位”到“人格独立”

家庭为整个社会的细胞，而中国传统家庭又始终保持着以父权为中心，以长子继承制为中轴的宗法制的特性，家长拥有专制的特权。这种家庭独裁制模式，一经扩大，便成封建国家的模式。封建国家就是一个扩大了封建家庭；君主就是放大的独裁家长。有人说，中国社会是国家式的家庭，又是家庭式的国家。这话一点不假。一个家庭的家长，俨然是这家庭中的小皇帝，坐在紫禁城中的皇帝，俨然又是这个国家的大家长。皇权高于一切，然而它尊重并保护家庭。因为封建家庭就是皇权存在的最坚实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不破，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可以照样做皇帝。于是为了维系家庭，儒家特设了“三纲五常”。“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就是天、地、君、亲、师五伦。这样，整个封建社会被严密地罩上了一张以家庭为本位，以忠君为核心，以等级观念为特色的封建伦理网络。它不但给每一个人都规定了行为准则，也给每一个人都规定了各种义务，唯独没有给每个人规定各自应有的权利。应当指出，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中，个人无疑总是要与其他人发生联系才能存在的，绝对独立的个人是不可能有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现代民主观念认为，这种联系应当建立在人与人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但儒家却以“三纲五常”去规范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上下有别”，“贵贱、尊卑有差”。一句话，人只有各就其位，屈从于封建等级制度的模式，才有存在的价值。这样，“平等的人”，“独立的人格”被抹杀了。儒家设计的

人际关系与现代社会的本质差异，就在这里。同时，儒家讲内自省，讲修身养性，重视人格造就，这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但也应当指出，儒家讲内省，主要目的是要求人们自觉遵从，维护外在的等级制度。因此，它极力提倡克制自己，以至于主张灭“人欲”，存“天理”，鼓吹禁欲主义。总之，封建的伦理名教，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形成了对“人”的束缚，在这里，“独立的人格”被封建伦理等级关系淹没了。

还应该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它肯定人在宇宙中的主导地位，以为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才”，但只有人，才可以主宰一切；同时，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立志“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表现了这种人本主义精神。但它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那种以反对神权主义，讲究独立人格、天赋人权，强调个性解放和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是不同的。所以从根本上说，儒家人本主义所强调的人，由于抽掉了独立人格，因而是被动的。

“家庭本位”和“独立人格”的淹没，引起了许多弊病。第一，广大子女从教育、婚姻到从业，终生都必须听从父母的包办，丧失了独立的权利和人格，实际上成了父母的奴隶。第二，以家庭为本位和讲究五伦关系，又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和亲友关系，可以无限膨胀，形成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网。它浸润民族的心态，使人们信服人情高于一切，人际关系决定一切；同时，它又泯灭了人的自强自立和冒险进取的精神，养成圆滑、自私的个人品性上的弱点。

近代开关以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新观念，如独立人格、天赋人权、个性解放、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等传入中国，它们有力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本位”的旧观念。

本世纪最初几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把带有独立人

格,天赋人权观念的西方名著《论法的精神》(《法意》)《自由论》(《群己权界说》)译成中文出版。其后,强调个性解放的尼采、叔本华等人的作品也有译作出版。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努力把主张独立人格的易卜生的作品及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他们的思想及作品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又把矛头对准“吃人的礼教”,主张家庭革命,实现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和改造国民性。一场空前伟大的思想革命开始。在这场思想革命中,一大批具有“独立人格”的新的国民成长起来。

三 从“重人事”到“重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而轻科学,这可以从古代社会的传统观念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实际政策上看出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方文化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是不同的。前者把自然当作审美的对象,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后者把自然当作认知的对象,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因此,前者看重的是人事,后者看重的是科学。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许多传统观念,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重人事轻科学的非理性倾向。例如,《周易》讲,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道”是无形的、精神的东西;而讲究具体器物技艺的“器”不过是有形的、物质的东西。这里已经表现出了对人事的重视和对技术工作的轻视。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实际上都把科学技术当作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认为“小人能之”,君子是不屑去做的。他们把研究星相、历法、医术的科技工作者,视为俳优、小人。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古代许多重要发明者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也说明科技和科技人员是不被重视的。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

才流向的重要政策。但科考的指定书是儒家的经典，科学技术知识从来不列入科考的内容。这也就否定了科技和科技人才的价值，而引导士人从小埋头四书、五经。所以封建士人的理想取向，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二是，忠君报国，青史留名；三是，功名不成，就退居田园山林，闭门读书优游度日，以隐士、名士为荣。这中间当然有高低之分，但它们都没有把掌握科学技术，推进社会生产以造福人类当作一种光荣、一种理想，或者列为治国安邦的内容之一，却是共同的。可见，科技是落在士大夫视野之外的。所以，毫不奇怪，在中国历史上，为君而死的“忠臣”，比比皆是，但是，就没有出现过像西方的布鲁诺那样，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人。

同时，科技发展离不开实践，在古代尤其离不开生产劳动。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阶层，恰恰是轻视体力劳动的。孔子本人就是如此。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田和种菜的技术时，他讥讽樊迟是“小人”。孔子告诫他的学生说，种地的一定要挨饿，而读书做官自然就会有俸禄。后来孟子干脆把话说透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意思是，读书做官运用心思的人，是人上人；而凭体力劳作的人，是人下人。从此，封建士人以君子自居，“一心只读圣贤书”，或坐而论道，或吟诗填词。追求作“劳心者”、人上人，与生产劳动绝缘，自然也与科学技术绝缘了。

所以，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还能有多少人去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呢？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精力主要都消磨在读书和讲究修身养性一类功夫上了。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科技典籍，不过是沧海一粟；古代的经学家、文学家，人数众多，但古代科学家相比之下，却寥若晨星。有人统计，从公元前 26 世纪到新中国成立前的 4500 年间，出生在山东大地的著名人物，共 356 名。其中当官从政者 138 名，占总数的 38.7%；搞

人文社会科学的人 116 人，占总数的 32.5%；农民起义领袖和军事将领 64 人，占总数的 18%；而科技人员只有 17 人，占总数的 4.7%。从这一特殊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轻视科学技术的一般情况。

鸦片战争中，西方炮舰震醒沉睡的中国人。血的教训，使中国人深深懂得，声、光、电、化，乃西方富强的基础。那种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的观念，一下子被抛到爪哇国去了。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打出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从此，中国人以极大的热情学科学，用科学，积极探索一条“科学救国”的新路。

四 从“重义轻利”到“义利统一”

义和利应该是统一的。人们奋斗所要达到的目的，总是与他们的自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义、利之间，当然常常会出现矛盾与冲突；但是，说到底，人们必须把二者统一起来，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通观《论语》，孔子对义、利的看法，是有偏颇之见的。在他看来道德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不但如此，他还认为，君子与小人不同，其区别之一，在于君子追求的是道德，而小人追求的是利益。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的义、利说，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后辈儒生变本加厉，把这种儒家的义利观，概括为一句更为著名的话：“重其谊不重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就是说，为人处事，目的是加重情谊，而不必看重是否能带来利益；所作所为，目的是昭示德行，而不必计较是否能带来功利。这种扭曲的义利观，产生了十分有害的结果。

第一，它助长了封建士大夫的空谈习气。所谓“利”，无非

是指物质利益、经济效益或社会效果。既然君子只应追求道德而不必追求利益，那么，士大夫就可以去空谈，而把各种效益扔到一边。于是，出现了两千多年里，士大夫喋喋不休地谈论心性，谈论义理，而不去接近半点社会实际的怪现象，而且谁谈论的越玄、越空，谁的名望就越高，官做得也就越大。

第二，阻碍了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愁衣食的封建士大夫在终日自鸣清高，空谈心性、义理的同时，还轻视“利”、鄙视“利”。他们指斥在“利”方面进行科技研究的劳动者为“小人”，把科学技术斥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很多成果，因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而被埋没。此外，这种义利观，使人们耻于言利，直接影响到以求利为目的的工商业的发展。

第三，一味轻利也害了读书人自己。文人学士鄙视言利，看不起物质生产劳动，结果使自己成了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于社会并无真正益处的人。而一旦失意落魄，许多人没有营生的本领，只好以“君子固穷”、“谋道不谋食”一类陈词滥调，自欺欺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感到中国科技、经济过于落后，于是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举办了一些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开办了同文馆，并选派年轻的官员去学习天文、算学，并向国外选派留学生。洋务派的活动虽说没有把中国引向富强的道路，但他们主张引进西方近代科技，发展近代工商业，开始讲求物质产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这就冲击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洋务派是可取的，进步的。此后不久，重义轻利的观念最终被“义利统一”的新型义利观所取代。

五 从“重农抑商”到“商业富国”

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与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联系的是重农抑商。商人是赤裸裸地把追求利润作为自己行为准则的人。这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中，恰恰是典型的“小人”形象。孟子就反对言利，他武断地认定，“为富不仁”。儒家把致富分为三种：第一种务农，叫“本富”；第二种是经商，叫“末富”；第三种是作奸犯科以获取利益，叫“奸富”。就是说，农为本，商为末。封建社会把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商人排在最后。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历代统治阶级无例外地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即保护农业，限制和打击商人及商业活动。例如，除了向商人抽取重税、横征暴敛之外，历代曾禁止商人穿锦绣、乘马、剥夺商人参加科考和做官的权利。这些政策的目的是，都是为了要贬抑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重农抑商的价值取向和实际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促进社会生产朝商品经济方向发展和刺激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媒介，也是促进传统社会解体 and 向工业社会转化的重要催化剂。近代西方各国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工业革命及封建制的解体准备了条件，而使其先后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体制的。但中国却失去了这种机会，中国的商业始终被抑制在末等地位，不容发展，这就使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有力冲击而愈加板结；资本主义经济也就久久难以确立了。商业与工业是相辅相成的，商业既得不到稳定发展，也就不可能刺激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商业与科技发展又密切相关，商业及商品生产不发展，就不会给生产技术的提高提供资金和原动力，社会经济就不会出现技术革命的大进步。总之，商业及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杠

杆，没有商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但农业超不出小农业的范围，而且大工业也不会建立起来。一句话，社会经济将永远停滞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水平。因此，抑制商业是中国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在以商业立国的西方列强打败中国之后。在铁的事实面前，中国人猛醒：商业是富国之本，强国之路。于是，开始大力发展商业。戊戌变法法令中就有很多有关发展商业的条文，如中央鼓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等民间团体，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中国人开始认识商业富国之路。同时，以《原富》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也翻译到中国，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广泛影响。从此，商业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

六 从“模糊”到“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因此也养成了偏重直觉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特点，是力求从整体、统一的观点上，去看待事物，它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有利于人们注意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动态的发展。这是应当肯定的。但它的弱点在于，忽视了对事物作分门别类、严密具体的分析，因此对事物的认识，难免含混、笼统。

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传统思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意会性特点。“所谓意会性，就是说，人们并不是通过对某一概念的严格逻辑定义和界说，来把握和认识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换言之，人们不是通过抽象思维的方法，而是通过对概念的上下文加以直观地领会的方法，来潜移默化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实际涵义。而且，一旦领悟了该概念的涵义，人们仍然不是经由概念的理论语言来对这一概念加以界说和定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与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是它的非确

指性或模糊性。“由于概念缺乏逻辑意义上的确指性和规定性，以致出现在后代人看来颇为奇怪的思想现象：即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家和学者，都可以凭自己主观上的意会，在不同意义上来使用‘理’、‘气’、‘道’、‘性’、‘命’、‘心’、‘体’、‘用’、‘格物’、‘致知’这类基本哲学范畴。他们完全不必顾忌旁人和前人是在什么意义上来使用上述概念的。”第三，是中国传统理论范畴与概念的不可离析性或“板块性”。“既然一般传统的抽象概念是由一些带直观感性意义的名词通过借喻而演变过来的，例如‘道’，即从‘道路’中伸引过来；‘理’是以木纹中的条纹、条理中伸引过来；‘气’从气雾流动状态中伸引过来。因此，中国传统的概念术语，往往具有不可分割的‘板块’性质，这种‘板块’既不能进一步分解为若干独立的子概念，也不能与其他概念综合为其他新概念。”^①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从整体分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缺点，还在于它的非逻辑性，非实证性和非工具性。

所谓非逻辑性，是说它缺少理论体系，缺少明确的学科概念，缺少严格的逻辑推理。萧功秦先生所谓的意会性，模糊性，板块性大体可以归于此类。

中国人缺少建立理论体系的创造力，所以凡古代的理论著作，不论文章也好，专著也好，谈话也好，论辩也好，大都没有学科概念。无论天文地理，政治军事，仁义道德，刑罚奖赏，凡有论者，统统放在一个“大口袋”里。中国古人的文章，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文章，大有百宝囊意味，要什么，有什么。至于学科体系，谈不到了，他们也不重体系。中国人没有体系概念，因此也就很少在分析哲学方面有自己的独到建树，很少能建立起来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所以，后来人读到前人的书籍，常常要反复

^①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

揣摩，还是很难找出一个明确无误的含义。体系既不健全，在造词造句上就有很大的随意性。要讲逻辑论证，《庄子》中似有一些，不过往往论于小道，未曾光大。墨子最重逻辑，然而他的学说在后世却被统治者和士人遗弃，可以看出，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没有一点地位的。

倒是如禅宗“公案”一类的非逻辑思维方式，在我们传统文化中颇占一席之地。禅宗“公案”本身不重逻辑，反而特重对逻辑的反驳。如有一个和尚问洞山守初禅师：“什么是佛？”回答说：“麻三斤。”有个和尚问石头希迁：“什么是道？”回答说：“木头。”这种非逻辑的思维方式，真是让人莫名其妙，然而它却受到士人特别的推崇。

所谓非实践性，是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少实证精神。中国人讲“道”，讲“天”，讲“天人合一”，讲“天人感应”，讲“阴阳转化”，讲“五行相生相克”，都讲得头头是道，然而缺少实证精神，也没有实验手段。我说一个大道理，你信不信？你不信，自有信，于是，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实证精神，没有实验手段，所以，以讹传讹者甚多。虽是世界有名的礼仪之邦，然而头脑昏昏之人不少。即便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很简单的现象，往往也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例如，中国有螟蛉义子之说。此说指蜾蠃（一种小蜂）无子，就取螟蛉（一种肉虫）的儿子回家，把它养大，也就成了蜾蠃。这件事鲁迅先生引证过，认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蜾蠃之所以把螟蛉抱回家，不是做儿女，而是做儿女的点心。又如，有的中国人相信小猫头鹰大了一定先把自己的母亲吃了才肯出窝的，而且煞有介事地说，大凡猫头鹰的巢穴附近，都悬挂着一颗黑乎乎的头颅，那就是母鹰用嘴咬着树枝让儿女们吃光吃尽剩下的头骨。其实，经科学考察，那不过是猫头鹰吃剩下的老鼠骨头罢了。还有，有的中国人居然说，蝙蝠是老鼠吃盐以后变的。这些都属无稽之谈。把这种无稽

之谈当成真实的认识方法，就是缺少实证精神。这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不仅表现在生活常识上，也表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张岱年先生指出，《周易》并非周公孔子所作，但中国很多古代士人就认定了那是周公孔子所作，而且正正经经把它作为圣人的经典传了下来。这种遗风传至清代，就有我们对西洋人的种种奇谈怪论。例如说西洋人胎儿在母亲子宫中和中国人不一样，以此可知优劣；又如，有的中国人说英国人不长膝盖骨，一旦用竹竿捅倒，很难爬起；再如，有的中国人认为让赤身裸体的妇女站在城头，就足以使洋人的大炮不响。同样，把马桶挂在阵前，也就足以使洋人的火炮不响。种种奇谈怪论，不一而足。

中国古人不重实验，不能以实验精神对待自己的思想、认识、理论和决策，因此，中国古代虽有伟大发明，却不能使之光大起来。中国虽曾有强大的封建主义，却没有首先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所谓非工具性，是指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缺少工具行为，缺少工具意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其实不算不发达，中国有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启发了西方近代文明。不仅如此，中国在化学、数学、物理学、建筑学、光学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些贡献在中国思想家、政治家那里，都不过是“贡品”而已。高兴的时候，拿来一点；生气的时候，弃之不理，而且从骨子里就认定了这是“下贱”人摆弄的低级玩艺。

中国人不喜欢工具，喜欢面对世界抒发情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屈原有天问，一问就是 120 个问题，问得天翻地覆，好不深刻，好不气派。然而，问问罢了，没有下文。他不过以天问表现自己的迷惘。

看重工具的，中国有鲁班，然而鲁班不入百子之流。看重工具不让鲁班的，又有墨子。墨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思维方面第一位工具大师。他把好些语言概念给以严格定义。如对“名”

的定义是：达、类、私。墨子认为“达”为物名，即物的总名；同样形状而名之者为“类”名，即物的分类之名；一人一物之名为“私”名，即人或物的具体名称。这种既分类又定义的工作增加了语言的明确性。如果这种工作有人继承下来，发扬光大的话，定会使中华语言成为世界上最周密、最清晰、最具逻辑性的语言之一。可惜，墨子这种工具性的探索工作一开始就遭人鄙视，以致他的学说在后世没有发生大的影响。讲到工具作用的大儒，首推荀子，他的《劝学篇》当然有些与新儒旧儒不同的味道。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又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之，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所以，他说“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然而，传统中国人如同冷遇墨子一样，也冷遇了荀子，以致他的假物思想也没有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不善假物，但西方却善假于物。最终，善假于物的西方打败了不善假于物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失败，是工具的失败，是思维方式的失败，而西方胜利也正是工具的胜利，思维方式的胜利。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非逻辑性、非实证性和非工具性，是传统中国人反科学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造成中国观念上的模糊、玄虚与不切实际。观念的落后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落后的一个必然反映。反过来，思维方式的落后加重中国近代生产方式落后及政治制度落后。

把西方逻辑学著作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明末科学家李之藻。他把（亚里斯多德辩证法概论）译成《名理探》出版。这是 17 世纪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的逻辑学讲义，主要内容为中世

纪经院哲学派别所述亚里斯多德的概念、范畴的学说，基本上代表了经院哲学的逻辑面貌。但是，在当时的思想界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从这部书中反思出自己思维方式的缺点。

意识到中国思维方式落后于人，并想改进的人士是近代维新派先驱马建忠。他参照西方语法著成《马氏文通》，此书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为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同时，这部著作作为中国逻辑思维研究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沿着马建忠开创的道路继续向前迈进的是严复。戊戌变法后，他翻译了《穆勒名学》。此书原名《逻辑体系》，是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逻辑学著作。全书六卷，严复译出全书的一半。以研究归纳法为主，其中关于契合法、差异法、共变法、剩余法等确定现象原因的归纳方法的表述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它的翻译出版，对中国思想界，特别对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严复以后，研究西方逻辑学说的人口渐增多。西方先进的逻辑思想逐步被中国人所认识。最终，科学的思维方式，代替了非逻辑性的、非实证性的和非工具性的传统的“模糊”思维方式。

纵观近代八十年的中国文化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都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西学的传入，特别是西方以“天赋民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传入，打破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长期统治的地位。文化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也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后来共产党的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

了历史的铺垫。

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肩负着总结传统文化、批判封建主义、促进观念变革和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历史使命，我们反对全盘拒绝与盲目排外，也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也不赞同貌似持中的“中体西用”。我们应该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的批判精神来对待中西文化，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中真正的思想精华，学习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与先进生产力有必然联系的那些优秀的文化成分，通过扬弃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而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进于更高的崭新境界。

附录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大事年表

年代	大事
1580	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来华，入居广东肇庆，是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播天主教之始。
1581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进入广东传教。（一说 1583 年利氏始来华传教。）
1587	利玛窦至南京。
1594	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来华，赴广东韶州，助利玛窦传教。
1597	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来华，入广东韶州传教。
1599	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来华，赴南京传教。
1601	1 月 24 日，利玛窦至北京。
1603	徐光启在南京领洗，入天主教。
1604	利玛窦所著《二十五言》在北京印行。
1606	意大利耶稣会士熊三拔来华，赴北京传教。
1607	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成。
1610	4 月，利玛窦卒于北京。 是年，李之藻根据传教士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所传西洋历法以修历，西法入中国自此始。
1611	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来华。
1613	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来华。

- 1614 李之藻译《圆容较义》成。
- 1615 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
- 1617 张燮著《东西洋考》成。
- 1618 4月16日，瑞士耶稣会上邓玉函偕金民阁等二十二人来华。
- 1622 德国耶稣会上汤若望来华。荷兰入侵澳门。明廷令兵部遣人至澳门请耶稣会士陆若汉等二十四人铸西洋大炮。
- 1626 来华传教士金尼阁著成《西儒耳目资》。
- 1629 明廷开历局，以徐光启为监督，用耶稣会教士龙华民等修历。
- 1630 5月，明廷征西人汤若望供事历局。
7月，明廷征西人罗雅谷供事历局。
- 1649 艾儒略卒。
- 1650 中国境内天主教徒达一万五千人。
- 1657 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来华。
- 1658 传教士卫匡国著成《中国历史》（第一部）
- 1659 比利时人南怀仁来华。
- 1661 郑成功进驻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清廷施行迁海令。
- 1666 汤若望卒。
- 1669 2月，清廷革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职，以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掌钦天监。
8月，清廷禁天主教，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宗教仪式，不在禁止之列。
- 1679 来华传教士白晋著《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成。
- 1680 南怀仁铸火炮三百二十余门。
- 1687 传教士白晋著《中法小词典》成。莱布尼兹和在华

- 传教士建立联系。
- 1692 12月，意大利剧团在布尔哥格旅馆上演五幕剧《中国人》。
- 1696 传教士李明著《中国现状新志》。
- 1700 中国境内天主教徒达 3万余人。
- 1705 罗马教皇遣使至京。
- 1707 清廷禁天主教，令教士退居澳门。
- 1713 意大利上演《道士隐形术与中国宫廷》。
- 1717 清廷下令禁天主教士及外国人留居中国。禁赴南洋贸易。出海商船，须详报船只，客商姓名，所到地方；不准多带口粮。卖船给外国者，本人及造船之人皆斩。出国不返者，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并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解回立斩。
- 1722 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来华。
- 1723 清廷令西洋人除在京者外，安插澳门。改天主教堂为公廨，严禁传教。
- 1728 来华传教士马若瑟写成《中文概说》。法国耶稣会士孙璋来华。
- 1730 5月，毁杭州天主教堂。
- 1731 清廷准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禁铁器出洋。
- 1732 来华传教士宋君荣先后发表《中国天文学简史》、《中国天文学论文集》。
- 1735 传教士马若瑟将《赵氏孤儿》译成法文，并在巴黎出版。
- 1738 德国耶稣会士魏继晋来华。
- 1746 7月，清廷勒令在福建传教洋人回国，究治习教魁首。
- 1750 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来华。

- 1752 伏尔泰写成《自然法赋》一书，该书受中国宋明理学影响甚大。
- 1753 5月，增钦天监西洋监副一人。
- 1755 法国巴黎上演伏尔泰编写的《中国孤儿》话剧。
- 1756 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
- 1757 清廷下令限广州一港对外贸易。
- 1762 英作家汤姆斯·帕西编译的《中国诗文杂著》出版。
- 1767 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发表《中国的专制制度》。
- 1773 清廷下令解散耶稣会。
- 1777 清廷令广东禁洋船运棉进口。
- 1782 广东十三公行成立。
- 1783 来华传教士冯秉正著《中国通史》成。
- 1784 第一只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
- 1793 英使马戛尔尼来华。自海道至天津，赴热河见清高宗皇帝。
- 1803 西班牙人传入西洋种痘法。
- 1805 4月，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及设立学校。在京刻书传教之西洋人德天赐，解往热河圈禁，有关之中国人发伊犁为奴，旗人并销去旗档。令内务府加强管理西洋堂，撤毁堂额天主字样。
10月，赐英吉利王书。
- 1807 最早来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到广州。
- 1815 10月，西洋人兰月旺以违禁潜入内地传教，处死。
11月，禁买洋人输入奇货。
- 1816 英使亚墨哈斯来华至京，因争礼仪，未见仁宗皇帝

而离去。

- 1832 梁发编著《劝世良言》。
- 1833 外国传教士办的近代报刊《西洋每月统纪传》在广州出版。
- 1839 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为了了解西方情况，请人译述英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辑而成《四洲志》一卷。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情况。
- 1840 6月，中英爆发鸦片战争。
- 1841 龚自珍卒。
- 1842 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 是年，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五十卷刊行。
- 1843 7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教，进行反清传教，冯云山、洪仁玕受洗礼加入拜上帝教。
- 是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设印刷所。这是英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个机器工业。
- 1844 11月，清政府批准天主教弛禁。
- 12月，清政府允许在五个通商口岸修建教堂，中国人自由入教。
- 1845 11月29日，英驻沪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的《上海租地章程》公布，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为英人租借居留地，是为外国租界在中国设立之始。
- 是年，洪秀全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 1846 洪秀全写成《原道觉世训》。
- 1847 3月，洪秀全、洪仁玕赴广州美教士罗孝全处学道。
- 8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与冯云山创拜上帝教总机

关，制定仪式及“十款天条”。

是年，魏源编著《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刊行。

1850 8月3日，英国在上海出版英文《北华捷报》（周刊）。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公报，供外国侨民阅览。

10月，林则徐卒。

11月，各地拜上帝教会众陆续到广西金田，编制队伍，建立“圣库”，准备起义。

1851 1月11日，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元年。

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

1852 2月3日，太平天国颁行天历。

是年，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一百卷本刊行。

1853 4月27日，英使文翰“访问”天京。其后，法、美公使接踵而至。太平天国当局答应允其正当通商，拒绝其无理要求。

是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办汉文时事月刊《遐迩贯珍》于香港，刊载当时中国情况。

1857 魏源卒。

1858 伍廷芳在香港创办《中国新闻》，此为中国人最先创办的近代报纸。

1859 冬，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洪秀全批准颁行。

1860 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占圆明园，大肆劫掠。18日，英使令焚毁圆明园，以掩盖劫掠罪行。

1861 1月20日，清政府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命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主其事。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后分别由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任。

3月25日，外国公使始驻北京。是年，英商办的

《上海新报》创刊，此为第一种中文日报。冯桂芬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曾国藩办安庆军械所，此为官办新式军事工业的开始。

1862 3月17日，江西南昌教案发生，群众愤毁天主教堂。

8月24日，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

1863 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培养洋务翻译人才。

1864 7月1日，上海《北华捷报》扩充为《字林西报》，改出日刊，《北华捷报》成为其星期日副刊。此报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内设立审判机关“会审公廨”。

12月，京师同文馆美国教习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刊行。

是年，广州设立“广方言馆”，又称“广州同文馆”。

1865 9月20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为近代军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工厂。

是年，李鸿章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局。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培雅学堂。

1866 3月20日，清政府派斌春率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出国游历。

4月1日，总理衙门奏呈赫德上年提出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提出的《新议略论》。

是年左宗棠创设福州马尾船政局，此为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开办度恩学堂。

- 1867 11月21日，清政府派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出使大臣，转年2月25日向上海起程。
是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成立。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
- 1868 9月5日，《中国教会新报》在上海创刊。
是年，扬州人民捣毁传教士住所。
- 1869 1月2日，四川酉阳爆发反洋教斗争。
6月14日，贵州遵义爆发反洋教斗争。
11日，美教士丁韪良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 1870 6月21日，天津教案发生。天津法国领事丰大业向天津知县及居民群众开枪，被群众击毙，群众焚毁教堂多处。
- 1871 8月，福建古田人民拆毁英教堂。
- 1872 4月30日，英人美查创办《申报》于上海。
8月11日，清政府批准上年曾国藩、李鸿章所派容闳、陈兰彬率领第一批广方言馆毕业生梁敦彦、詹天佑等30名幼童赴美留学。
是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设立。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简村创办继昌隆缫丝厂。
- 1873 5月21日，江西瑞昌群众拆毁美教堂。
7月，中国人自办的《昭文新报》在汉口创刊。
- 1874 6月16日，容闳在上海创办《汇报》。
9月5日，《中国教会新报》改为《万国公报》。
11月17日，官学生唐绍仪等幼童第三批30人赴美留学。
是年，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
- 1875 清政府派使臣驻英、日、美等国。
- 1876 4月，四川江北厅数千群众毁教堂，涪州群众起而

响应。

12月3日，使英大臣郭嵩焘、副使刘锡鸿等自上海出洋赴英。

是年，中国第一次派遣留欧学生。

1877 1月25日，李鸿章奏派李凤苞率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严复、萨镇冰等30人，分赴英、法学习制造驾驶

1878 9月，开平矿务局正式出煤。

1879 12月14日，福建延平发生反教会斗争。

是年，美国基督教会将在上海开办的培雅学堂和度恩学堂合并为圣约翰书院。

1880 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学堂。

1885 10月13日，清政府设海军衙门，命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奕劻、李鸿章为会办大臣。

1886 7月25日，重庆人民愤教民仇杀，三千人愤而捣毁英法教堂，驱逐传教士。

11月6日，《天津时报》创刊，由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怡和洋行笱臣集股创办，李提摩太为主笔。

1887 10月9日，福建福安县30余乡农民组织义军，提出“为国复仇”口号，与外国教会侵略势力进行斗争。

是年，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设立同文学会，1893年改名广学会。

1888 12月17日，北洋海军成军，拥有军舰22艘，共4万余吨，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刘步蟾为左右翼总兵。

1890 8月8日，四川大足县余栋臣反对法传教士暴行，举行起义。

1891 4月20日，扬州人民掀起围攻教堂斗争。

5月13日，丹阳、无锡、江阴、南昌等处哥老会纷

纷烧毁外国教堂。

6月5日，湖北武穴郭六寿等反对教会贩卖，聚众焚教堂，杀教士。11日，丹阳群众愤起焚毁教堂。

9月2日，湖北宜吕群众焚毁法国及英、美教堂。

1892 5月21日，清政府命禁止排外刊物。

1893 2月17日，中外商人合办的《新闻报》创刊于上海。

7月1日，湖北麻城发生教案，殴毙教士二人。

是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发表。

1894 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创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转年2月21日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

1895 5月21日，康有为联合入京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8月1日，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17日，康有为等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

12月8日，温处道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建陆军。

是年，林纾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文。盛宣怀在天津设立中西学堂，亦称“天津西学学堂”或“北洋西学堂”，即北洋大学的前身。

1896 1月12日，上海出版《强学报》。

6月26日，《苏报》创刊于上海。

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编。

是年，中国初次派遣赴日留学生。南洋公学在上海

设立。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

1897

1月22日，康广仁、徐勤创《知新报》于澳门。

10月26日，严复于天津创办《国闻报》，严复主编。

11月26日，谭嗣同等于长沙办时务学堂。

12月，严复译斯宾塞《劝学篇》、赫胥黎《天演论悬疏》，陆续刊载于《国闻汇编》。

是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苏州设中西书院。

1898

4月，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出版。

5月5日，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1日，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在上海创刊。

6月11日，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维新。从这天起陆续颁布许多变法命令，到9月21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28日，光绪帝命把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的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每月拨2千两白银作经费，翻译外洋书籍。

7月3日，光绪帝诏立京师大学堂。10月，令各省书院为学校，派孙家鼐管理此事。官书局及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24日，清廷准孙家鼐奏请，命荣禄速印《校邠庐抗议》一干部，送交军机处。25日，清政府将张之洞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使其广为刊布，实力劝导。26日，光绪帝命改《时务报》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

8月9日，孙家鼐奏呈筹办大学堂章程八条，派丁韪良充西学总教习，赏给二品顶戴，清廷允准。

9月5日，诏川西法练军。

是年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出版，此书参照西方拉丁语法写成，是中国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

- 1899 3月15日，总理衙门拟定地方主官接待教士章程。
3月，山东义和团朱红灯在平原起义。
4月，严复译密克《支那教案论》出版。
6月15日，福建建安群众捣毁英教堂。22日，云南蒙自群众捣毁英教堂。
- 1900 1月12日，上谕以“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党”，命各省督抚“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
6月12日，义和团在北京开始烧教堂。14日，天津义和团焚毁城内教堂。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天主教总堂。20日，北京义和团包围使馆区。27日，太原义和团烧毁东夹巷教堂。
7月2日，盛京团民攻克法天主教总堂，击毙主教纪隆。6日，河南义和团围攻南阳府天主教靳岗教堂。
8月16-18日，八国联军受“特许”，在北京大肆抢劫三日。
- 1901 1月29日，清廷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开始实行“新政”。
2月1日，清廷严禁仇教集会。
7月24日，清政府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派奕劻总理事务，王文韶为会办大臣。
8月29日，清廷下诏改科举，废八股，试中国政治事论，废武科。
9月11日，清政府命各省建立武备学堂。14日，清政府命整顿京师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

各州县均设小学堂。17日，清政府命各省选派留学生。

是年，第一批女学生赴日留学。《苏报》在上海正式创刊。严复译斯宾塞《劝学篇》第一篇出版。美国基督教会在上海和苏州设立的中西书院合并为东吴大学。先后在苏州设文、理学院，在上海设法学院。

1902 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

是年，《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张元济主编《外交报》出版。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出版。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将外语、天文、舆地、兵法、格致、制造等若干西学学科列入学校教学内容。

1903 1月29日，湖北留学生于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后更名为《汉声》）。

2月17日，浙江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杂志于日本。

3月29日，江苏留日学生创办《江苏》杂志于日本。是日，法传教士创办的震旦大学成立。

4月27日，天津北洋大学正式开学。

7月7日，上海《苏报》及爱国学社被查封，史称“《苏报》案”。

8月7日，章士钊等创刊《国民日报》于上海。

是年，马君武译《物种原始》出版。杨廷栋译《民约论》出版。严复译斯宾塞著《群学肆言》、约翰·穆勒著《群己权界说》出版。严复开始编写《英文汉诂》。梁启超在东京创刊《新小说》。

1904 3月11日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创刊。

是年，康有为游历欧美。严复译甄克思著《社会通论》出版。美国基督教会在广州设立的格致书院更名

为岭南大学，先后设文、理、农、商、工、医等学院。

1905 6月，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7月16日，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9月13日，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于上海。

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于东京正式刊行。

12月6日，清政府设立学部，国子监并入。

是年，严复游历法、瑞士、意大利、英等国。严复译《穆勒名学》和赫胥黎《天演论》出版。严复编著《英文汉诂》出版。美国基督教会把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先后设置神、文、理、医、工等学院。

1906 1月22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被法教士王安之行凶刺伤，后死。25日，南昌群众愤毁法教堂，击毙王安之等六人、英教士三人，是为“南昌教案”。

2月，严复著《政治讲义》出版。

7月28日，学部奏颁《教育会章程》十五条。是月，英国设立协和医学院于北京。

8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出版。

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声言数年后察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

11月7日，清政府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

- 12月16日，张謇、汤寿潜等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于上海。
- 1907 1月，《中国女报》创刊于上海，秋瑾主编，宣传妇女解放。
- 4月2日，上海《神州日报》创刊，于右任任社长。
- 9月3日，陈焕章发起成立孔教会，后改为孔教会。
- 20日，清政府设立资政院。
- 是年，英人斯坦因盗走大批敦煌文物。清廷委任沈家本等为修律大臣，对古代法律中民、刑不分的状况作了整理、修改；并参考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把《大清律例》改为《大清现行刑律》。同时吸取欧洲、日本的立法经验，主持制订了民法和商法草案。
- 1908 8月27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 9月22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议院选举法要领等。
- 是年，清政府设立教育部。
- 1909 11月13日，陈去病、柳亚子等于苏州创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 是年，严复译耶芳斯著《名学浅说》出版。
- 1910 10月11日，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于上海出版。
- 是年，美国在南京设立金陵大学。清政府设立海军部。北京图书馆成立。清政府颁布《大清新刑律》，分为总则（十七章）和分则（三十六章）两编，共五十三章四百八十八条，附有暂行章程五条。
- 1911 4月29日，游美学务处于清华园建成清华学校。
- 5月8日，清政府组成“皇族内阁”，以庆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
- 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11月3日，清政府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31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用阳历，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

1912 1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5日，孙中山发表《告友邦书》。19日，民国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

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

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5日，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公布。

5月5日，共和党成立。7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国会采用参、众两院制。24日，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9月3日，教育部公布新学制。

1913 2月，《孔教会》杂志在上海创办。康有为主办《不忍》杂志。

5月29日，进步党成立。

6月22日，袁世凯令各省尊孔祀孔。

9月27日，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北京“孔社”，开“孔子诞日纪念会”。

1914 2月7日，袁世凯通令各省祀孔，以春秋两季行祀孔礼。

4月10日，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杂志于东京创刊。章士钊主编《甲寅》杂志创刊于日本，在上海发行。

是年，严复译卫西琴著《中国教育议》出版。

1915 1月20日，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

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复辟。

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转年9月，《青年杂志》从第2卷1号起改名《新青年》。

1916 12月26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 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了文学革命。

3月1日，《太平洋》杂志在上海创刊，李剑农任主编。

1918 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4卷4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8日，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

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

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于北京创刊《每周评论》。

1919 1月5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纪元》一文。

21日，北京政府派陆征祥、顾维均等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

2月9日，北京大专学校学生15000人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保持国权”，“对于中口争执坚持到底”。

4月6日，《每周评论》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摘译。15日，鲁迅于《新青年》上发表小说《孔乙己》。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举行爱国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军警镇压学生，30余人被捕，“五四”运动爆发。

附录二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著名人物传略 (以出生年先后为序)

罗明坚 (1543—1607)

意大利人，字复初。29岁入耶稣会，1578年同巴范济、利玛窦等赴亚洲传教。1580年来华，1582年12月27日至广东肇庆，居东关佛寺，不久回澳门。又于1583年9月10日重回肇庆，与利玛窦同居城中，向拜访他们的中国绅士布道，此为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始。罗氏认为中国传教事业已略有基础，罗马教廷应派钦使驻中国。为此，他于1588年回欧洲，向罗马教廷汇报此事，未果。1607年罗氏卒于意大利萨勒诺城。著有《天主圣教实录》。

利玛窦 (1552—1610)

意大利人，字西泰。1571年8月15日入耶稣教会，1580年7月25日晋铎，1581年耶稣会调利氏来华，1583年9月10日同罗明坚居广东肇庆，是为来华传教士入中国内地传教之始。此间，利氏绘制《万国舆图》。1599年，利氏与耶稣会士郭居静从南京北上，试图觐见明万历皇帝，未果，仍回南京。利氏让郭居静到澳门置办送皇帝的礼物，并于1600年5月6日同耶稣会上庞迪我再度进京。但在途经山东临清时，为当地税吏所阻，并被指控为有不轨之图，投进监狱。1601年1月24日，利氏遵万历皇帝旨再次入京。明帝对利氏的供物十分赞赏，特别是白鸣钟，

尤得万历皇帝的欢心，因此下诏准利氏留居北京，并让户部负担利氏的生活费用。利氏利用居住北京的机会，结识了朝中一些官员和士大夫，在他们中传教，特别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交情甚深。利氏来华期间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自己也写了许多关于数学的书，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除此之外，他还负责管理在华耶稣会上传教工作。1610年4月，利氏在北京病逝，时年58岁。皇帝赐葬地。利氏著、译的著作有：《天学实义》、《交友论》、《西国记法》、《二十五言》、《畸人十篇》、《辩学遗牍》、《西琴八曲》、《斋旨》、《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勾股义》、《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万国舆图》、《西字奇迹》、《乾坤体义》等。

龙华民（1559—1654）

意大利人，字精华。1582年入耶稣会。1597年来华，初在广东韶州传教，1603年4月韶州圣堂建成，是为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1609年，奉利玛窦之召赴北京。转年，利氏卒，龙氏继任中国区耶稣会会长。1628年，中国耶稣会与日本分省独立。明熹宗时，龙氏奉诏入京铸造西洋大炮。明亡后龙氏投靠清朝，深得清帝宠信。1654年11月11日卒于北京，清顺治帝赐丧银300两。龙氏著有《圣教日课》、《死说》、《念珠默想规程》、《圣人祷文》、《圣母德叙祷文》、《急救事宜》、《圣若瑟行实》、《地震解》、《灵魂道体说》等。

郭居静（1560—1640）

意大利人，号仰凰。耶稣会士。1594年来华，初到潮州，旋赴韶州，后随利玛窦赴北京，帮助利氏传教，与徐光启交往甚多。后徐光启丁忧回籍，特请郭氏到上海。郭氏在上海居2年，受他传教影响，加入天主教的中国人达200多，并在上海建一座

天主教堂。后奉李之藻之请，赴杭州传教。1640年卒于杭州葬城外大方井。著有《灵性诣主》、《悔罪要旨》等。

徐光启（1562—1633）

上海徐家汇人，字子先。少年熟读儒家经典，1581年中秀才，160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607年迁翰林院检讨。明崇祯帝时任礼部左侍郎。1596年，徐氏在韶州结识耶稣会士郭居静，初次接触西学，并对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转年徐氏在南京认识了耶稣会士利玛窦，后随利氏学习西学，并和利氏一起将拉丁文的《几何原本》译成中文。1607年，《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不久出版。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翻译的西方数学书，促进了中国数学的发展，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如平面、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对角线、外切等，一直沿用至今。后徐氏跟耶稣会士熊三拔习西方水利机械，并推广种植甘薯。崇祯朝，徐氏负责历局，主持修历。他延聘来华耶稣会士，并利用西方历法理论修历，编写历书。徐氏死后，李天经继续主持这项工作，终于完成《崇祯历书》。徐氏是明末接受西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庞迪我（1571—1618）

西班牙人，字顺阳。18岁入耶稣会。1599年来华，初抵澳门，旋入南京帮助利玛窦传教。1600年，和利氏一起赴北京。1611年，庞氏和熊三拔一起应召入历局，修改历法。1616年，和其他耶稣会士一起被逐回澳门。1618年1月，庞氏死于澳门，葬香山澳。著有：《七克大全》、《人类原始》、《天神魔鬼说》、《受难始末》、《庞子遗论》、《实义续编》、《辨揭》、《耶稣苦难祷文》等。

熊三拔（1575—1620）

意大利人，字有纲，耶稣会士。1606 年来华，赴北京从利玛窦学习汉文。1610 年利氏卒，遗命熊氏为京院院长。1611 年，和庞迪我一起入历局，修改历法。熊氏曾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起翻译许多西方书籍，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1617 年被逐回澳门，1620 年卒于此地。译著有：《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等。

邓玉函（1576—1630）

瑞士人，字涵璞。35 岁入耶稣会。1618 年 4 月 16 日来华，先到澳门，后到嘉定学习汉语，再至杭州传教。不久被召赴北京，主持修改历法。1630 年 5 月 11 日卒于北京。著有《崇禎历书》（与徐光启、汤若望、罗雅各等合作）、《人身概说》、《正球升度表》、《洋盖通宪图说》、《测天约说》、《黄赤距度表》、《奇器图说》等。

金尼阁（1577—1628）

法国人，字四表。1594 年入耶稣会。1607 年抵印度，1611 年来华。初在南京传教，不久赴杭州、北京。后被派为代表回罗马。金氏回欧洲后，去各国传播中国文化。1618 年 4 月，金氏率汤若望、罗雅各等耶稣会士二十二人来华，携带教皇所赐的西书七千多部。后在南昌、韶州、杭州等地传教。1613 年入河南开封，转年入山西，继又赴陕西传教。金氏在绛州、西安、杭州等地创办印刷所，印刷书籍多种，促进了西学的东传。1628 年卒于杭州，葬城外大方井。著有《推历年瞻礼法》、《宗徒祷文》、《况义》、《西儒耳目资》等。

艾儒略（1582—1649）

意大利人，字思及，耶稣会士。1610 年来华，初抵澳门，

转年入广州，后赴北京。又曾在上海、扬州、陕西、山西、杭州等地传教。1625年入福建，为福建传教的第一人，被此地官绅称为“西来孔子”。艾氏曾在1641—1648年间任中国省区会长。1649年卒于福建延平，葬于福州。著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出象经解》、《天主降生行义》、《弥撒祭义》、《涤罪正规》、《悔罪要旨》、《万物真原》、《三山论学记》、《圣楚歌》、《利玛窦行实》、《张弥格遗迹》、《杨淇园行略》、《熙朝崇正集》、《五十余言》、《圣体要理》、《耶稣圣体祷文》、《圣体四圣经文》、《玫瑰经十五端图像》、《性学粗述》、《西学凡》、《几何要法》、《四方问答》、《职方外纪》、《口铎日抄》、《道原精萃》、《坤舆图说》等。

汤若望（1591—1666）

德国人，字道味。1611年入耶稣会。1622年来华，初抵广州，旋赴北京，不久往西安传教。1630年，入历局，和罗雅各等人一起编写《崇禎历书》。汤氏修历时，得以在宫中布道，10多年中，宫中有140多人受洗入教。1636年曾为明廷设厂制造大炮。1645年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继又兼太常寺卿。康熙初为前钦天监佞杨光先所劾，1664年11月被捕入狱，旋释放。1666年8月15日卒于北京。著有：《进呈书像》、《主教缘起》、《浑天仪说》、《西洋测日历》、《民历补注释惑》、《大测》、《主制群征》、《星图》、《真主训论》、《恒量表》、《古今交食考》、《交食历指》、《学历小辨》、《测食说》、《测天约说》、《远镜说》、《新法历引》、《恒星出没》、《历法西传》、《西洋历法新书》、《共译各国八线表》、《赤道南北劝星图》、《拉丁文中国耶稣会传教史略》等。

卫匡国（1614—1661）

意大利人，字济泰。17岁入耶稣会。1643年来华。初传教于浙江，后游历各省，至北京。1646年回浙江。耶稣会上对于

是否允许中国人入教者祭祖敬孔问题争论不休，需报告罗马教廷以定是非。1650年，卫氏为此事赴欧洲。1657年再次来华，抵杭州。1661年6月6日卒。著：《天主理证》、《灵性理证》、《逮友篇》、《中国历史》等，1655年卫氏绘制的一张中国地图出版。

南怀仁(1623—1688)

比利时人，字敦白。18岁入耶稣会。1657年来华。1659年入陕西传教。1660年入京，帮助汤若望修历。1669年清廷拜其为钦天监监正。南氏经常和康熙帝讨论几何、天文和历算等问题，对西学东传做出贡献。1676年，南氏任中国省区会长。1688年1月28日卒于北京。著有：《教要序论》、《圣体答疑》、《道学家传》、《妄占辨》、《妄推吉凶之辨》、《告解原意》、《善恶报略说》、《仪象志》、《仪象图》、《康熙永年历法》、《熙朝定案》、《筒平规总星图》、《坤輿全图》、《地輿图说》、《坤輿外纪》、《赤道南北星图》、《验气说》、《神威图说》、《测验纪略》、《西方要纪》等。

殷铎泽(1625—1696)

意大利人，字觉斯。1642年入耶稣会，1657年来华。初抵澳门，旋赴江西传教。1671年返罗马，请求教廷向华派遣传教士，并给在华传教士以经济资助。1674年再次来华，不久赴杭州。1676年购买杭州城外大方井地，为来华传教士之墓葬之地。1687年，任中国副省区会长。1696年10月3日卒于杭州，葬于大方井。著有《耶稣会例》、《西文四书直解》等。此外，殷氏曾将《中庸》翻译成西文，并和郭纳桑合作翻译《大学》，对中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贡献。

莱布尼茨(1646—1716)

德国莱比锡人，哲学家，后人称他为“德国哲学之父”。在哲学方面，莱氏早年倾向机械唯物主义。后抛弃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实体观而另创立了唯心主义实体学说，即客观唯心主义“单子论”。莱氏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自然科学家，在数学方面，他是微积分学说的创立者之一；他提出的二进位制，影响到后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逻辑学方面，他是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之一。此外，他在历史学、法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莱氏主要著作有《单子论》、《人类理智新论》、《神正论》等。莱氏是中德文化发生密切联系的奠基人。他早在 1687 年前，就读过孔子、老子等人的著作，并和在华的耶稣会士建立联系。他的“单子论”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很大。中国《周易》对他数学逻辑观念有直接的影响，他通过与在华耶稣会士的白晋讨论有关《周易》的著名通信，证实他于 1703 年正式提出的《论二进制计算》和宋儒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莱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白晋(1656—1730)

一名白进，法国人，字明远。1678 年入耶稣会，1685 年来华。先赴浙江，旋即入京，得康熙皇帝信任，入内廷为康熙讲解西学。奉康熙之命，1693 年赴欧觐见法王。4 年后返华。奉诏与费隐、雷孝思、杜德美等费九年之功而绘制皇舆全览图。1730 年 6 月 28 日卒于北京。著有《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即康熙皇帝传）《古今敬天鉴》、《天学本文》等。

卫方济(1651—1729)

比利时人，1687 年至中国，先后在江苏淮安、安徽五河、上海、江西建昌和南丰等地传教。1702 年返欧，1729 年卒于欧洲。著有《人罪至重》，编译《中华帝国经典》，将四书、《孝经》

等介绍给欧洲。

刘应（1656—1737）

法国人，字声闻。1673年入耶稣会，1687年来华。先后在北京、山西、南京、广州等地传教。1708年升为代牧，1709年被迫离华，至印度。1737年卒于此地。刘氏译《礼记》部分篇章，并编译《易经概说》。

巴多明（1665—1741）

法国人，字克安。1685年入耶稣会。1698年自欧来华，曾随侍康熙帝二十多年，备其顾问。1723年，巴氏谏阻雍正皇帝缓行驱逐传教士之令。1729年，主持译学馆，教授满汉子弟习拉丁文。1741年，卒于北京，皇帝赐葬银二百两。著有《德行谱》、《济美篇》。巴氏向欧介绍中国的医学，并把大黄、当归、阿胶等多种中药推荐到西方。

马若瑟（1666—1735）

法国人。1683年入耶稣会。1698年来华，转年入江西传教，在饶州、建昌、南昌等地居二十余年。1724年，被逐到广州，从此专心著译。1733年被迫居澳门，越二年卒。著有《圣母净配圣若瑟传》、《杨洪园行迹》、《神明为主》，并编译《经传议论》，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将元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1735年在巴黎出版，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西传。

冯秉正（1669—1748）

法国人，字端友。1686年入耶稣会。1703年来华，先抵澳门，后赴广州，未几，奉命在江西传教，后赴京。1710年协助雷孝思、德玛诺勘画中国省图。1748年卒于北京。著有《圣体

仁爱经规条》、《圣心规条》、《盛世龟筮》、《圣年广益》、《圣经广益》、《求真白证》、《朋来集说》、《静避江钞》等。曾译《通鉴纲目》为法文，更名为《中国通史》。

宋君荣（1689—1759）

法国人，字奇英。1704年入耶稣会。1722年来华，转年赴京。深谙汉文、满文。巴多明死后，宋氏主持翻译馆，教授八旗子弟习拉丁文。1759年卒。宋氏编译《中国天文学简史》、《中国天文学论文集》、《中国天文学史》，并用法文写成《成吉思汗及蒙古史》，并著《中国纪年方法》，编辑《北京通信——宋君荣司铎书简集》。

伏尔泰（1694—1778）

法国巴黎人，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哲学观点上，伏尔泰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在认识论上，他赞成洛克的经验原则；在政治上，他赞扬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揭露和批判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伏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宽容的品格，优于基督教文化，他在《论各民族的习俗与精神》一书中，把中国文化放在全书的首位，排在基督教文化前面。伏氏于1752年写成的《自然法赋》一书，深受中国宋明理学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伏氏据马若瑟所译元曲《赵氏孤儿》改写成的剧本《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

孙璋（1695—1767）

法国人，字玉峰。17岁入耶稣会。1728年8月30日来华，抵北京，在此传教三十余年。1754年，任耶稣会会计，1767年7月28日，卒于北京。著有《性理真论》、《甲子会记》等，编著

《汉满法对照字典》。

魏继晋（1706—1771）

德国人，字善修。1726 年入耶稣会、1738 年来华，次年赴北京。魏氏善长音乐，长期供奉清内廷。曾任中国、日本耶稣会巡阅。1771 年卒于北京。著有《圣若望泉玻穆传》、《圣咏续解》等。编著《汉德字典》。

狄德罗（1713—1784）

法国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他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体；在认识论上，他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狄氏哲学思想深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曾盛赞中国儒教，说它“只须以坦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

钱德明（1718—1793）

法国人，字若瑟。1737 年入耶稣会。1750 年奉派来华，先抵澳门，然后转赴北京。通晓满、汉语言，居北京四十余年，专事沟通中西文化及传教事务，1793 年卒于北京。著有《满汉词典》、《五译合璧集要》、《中国历代帝王纪年表》、《纪年略史》、《孔子传》、《四贤略表》、《列代名贤传》、《古今音乐篇》、《孙吴司马穰苴兵法》、《中国古代宗教舞蹈》、《中国学说列代典籍》等。

马礼逊（1782—1834）

英国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07 年到美国纽约，同年 9 月 7 日到广州。马氏是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第一人。1809 年，

马氏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翻译。1816年，随英使阿美士德出使北京，任汉文正使。1823年回英国，带去大批汉文书籍，后来这些书籍由其家人捐赠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1824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26年再次回到广州。1833年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兼翻译。转年8月马氏死于广州，葬澳门。马氏深谙中文，著有《汉语语法》、《汉英字典》、《广东省上话字汇》等著作，马氏长期从事《圣经》汉译工作，1823年其所译圣经在马六甲出版。马氏死后，其妻编有《马礼逊生平事业回忆录》。

林则徐（1785—1850）

福建侯官人，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年号谿村老人。清末政治家。1839年在广东禁烟时，同西方发生了直接的接触，认为闭关锁国是“因噎废食”，不可能“固疆强国”。为此，他一面派人到广州刺探敌人的消息，去澳门了解西方国家的动态，购买西方的书籍和报刊；一面组织人力进行翻译，汇编了《华事夷言》、《西洲志》、《各国律例》，从而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史地等方面的知识。不仅如此，林氏十分注意缩短中英之间武器方面的差别，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林氏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因此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梁发（1789—1855）

广东高明人，一称梁亚发或阿发，号学善者，别号学善居士。第一个华人牧师。初为中国印刷工，自1810年，接近在中国首传基督教新教的马礼逊，并为其刻印中译本《圣经》。1816年11月入基督教，1823年被派充宣传师。1832年写成《劝世良言》一书，后还著有《熟学圣理略论》、《祈祷文赞神诗》等宣传

基督教的小册子。

魏源（1794—1857）

湖南邵阳人，字默深。清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曾参与浙东抗英斗争。并将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历史地理等增补为《海国图志》，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1852年扩充为100卷。此书系统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等知识，并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选兵、练兵和养兵的经验，改造军队，以强国御侮。此书对当时和后来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冯桂芬（1809—1874）

江苏苏州人，字林一，号景亭。道光进士，1862年后入李鸿章幕。著《校邠庐抗议》一书，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筹国用、改科举。”这种主张对洋务派和近代资本主义改良思想均有很大影响，为提倡新学的早期政论著作。此书1883年始刊行。

李善兰（1811—1884）

浙江海宁人，字壬叔，号秋纫。清末数学家。1868年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著有《则古昔斋算学》、《考数根法》等。与英人合译《几何原本》后九卷、《代数积拾级》、《重学》、《曲线说》、《谈天》、《植物学》等书。

卫廉士（1812—1884）

美国人，亦称卫三畏，基督教传教士，美国外交官。1833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曾协助裨治文编《中国丛报》。1856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兼翻译。1877年回美

国，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著有《简易汉语教程》、《中国地理》、《中国总论》、《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中国历史》等，编有《汉英拼音字典》。他的《中国总论》和《汉英拼音字典》被视为西方人研究中国必备之书。

洪秀全（1814—1864）

广东花县人，原名仁坤。太平天国领袖。早年几次应科举考试，均失败。偶读梁发《劝世良言》，接受西方基督教思想影响，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转年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后著《原道觉世训》，宣传革命思想。利用和改造西方基督教思想，将之和太平天国的组织制度、法律规范结合起来，制定“十款天条”，划分军队为“男营”和“女营”，创“圣库”制度，并将基督教的博爱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结合起来，制定《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的纲领。

徐寿（1818—1884）

江苏无锡人，字雪村。清末科学家。1862年与人合作制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蒸汽机，后又设计制造木质轮船“黄鹄号”。与英人傅兰雅等合译《化学鉴原》、《物体遇热改易说》、《汽车发轫》、《测绘地图》等书。1874年与傅兰雅等创设上海格致书院。

威妥玛（1818—1895）

英国人，汉学家，英国外交官。1847年任英驻华汉文副使。1853年任英驻上海副领事。1855至1871年任英驻华使馆汉文正使。1871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归国后于1888年任剑桥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威氏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编有英汉字典。著有《寻津录》、《语言白迩集》等。

洪仁玕（1822—1864）

广东花县人，字益谦，号吉甫。太平天国领袖之一。1843年加入拜上帝会。1852年至香港，在外国传教士处教书，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1859年至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是年写就《资政新篇》，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革新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此为农民阶级提出用西方资本主义方式改造中国的最早模式。

丁韪良（1827—1916）

美国人，字冠西。美国长老会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63年至北京传教。1869年任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1916年12月死于北京。著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学》、《花甲记忆》、《北京被围：中国对抗全世界》、《中国知识》、《中国的觉醒》等书，翻译惠顿氏《万国公法》为汉文。此外，丁氏著有不少汉文宗教书籍，以《天道溯源》最为有名。

王韬（1828—1897）

江苏苏州人，初名利宾，字紫诠，号仲弢。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189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任职。后至香港，旋赴英、法、俄等国游学。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1884年在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王氏主张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著有《弢园文录》、《弢园尺牍》等。

容闳（1828—1912）

广东香山，字达萌，号纯甫。中国最早留美学生，被称为近代留学生之父。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美国耶鲁大学毕业，

转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宝顺洋行任职。1860年访问天京，为太平天国献计献策。1863年入曾国藩幕，参与洋务运动。1872年率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赴美留学，任留学生副监督。后调任驻美副公使。曾支持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失败，逃去香港，后定居美国。1912年死于美国，著有《西学东渐记》等。

韦廉臣（1829—1890）

英国人，伦敦布道会教士。1855年来华，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回国。1863年再度来华，在烟台传教。1874年，任广学会《万国公报》的编辑。著有《华北、满洲及东蒙旅行记》等。

华蘅芳（1833—1902）

江苏无锡人，字若汀。清末著名数学家。1859年著《抛物浅说》。1862年与人合作设计制造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5年后，他先后与美国人玛高温、金楷里和英国人傅兰雅等人合译了《地学浅释》、《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合数术》、《决疑数学》等多种西方近代数理著作，将西方的常微分方程、概率论等介绍到中国。1874年与徐寿、傅兰雅等创办上海格致书院，主讲10多年。

林乐知（1836—1907）

美国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年来华。1868年在上海主编《教会新报》。1874年在苏州办博习书院。1882年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1890年在上海创办中西女塾。1875年起，为江南制造局和海关译书三百九十余部。著有《中东战纪本末》、《各国妇女》、《中国在国际间之地位》、《文学兴国策》、《李傅相历聘欧美记》等。

张之洞（1837—1909）

直隶南皮人，字孝达，一字香涛，晚号抱冰。清末洋务派首领。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1898年4月，发表《劝学篇》一书，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维护封建纲常，反对维新变法。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薛福成（1838—1894）

江苏无锡人，字叔耘。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1867年入曾国藩幕，主张学习西方，改革现政，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1889年出使英、法、比、意四国。著有《庸盦全集十种》等。

郑观应（1842—1922）

广东香山人，字正翔，号陶斋。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为宝顺洋行和太古洋行买办，后任轮船招商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1896年任汉阳铁厂总办。1906年任粤汉铁路总办。主张振兴民族工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提出设立议会，实行君主立宪。批判洋务派对西学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提出要“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著有《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

李提摩太（1845—1919）

英国人，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年来华，曾在山东、山西、北京、天津等地传教。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任上海同文书会（后更名为广学会）总干事。著有《新政策》、

(《华夏诸神表》、《万众皈依》、《留华四十五年记》等,将元李志常的《西游记》译成英文出版。此外还翻译了许多佛教著作。

马建忠(1845—1900)

江苏丹徒人,字眉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代表人物之一,著名语言学家。1870年在天津办洋务。1877年赴法留学。1879年得博士学位回国,仍从事洋务和外交工作,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主张学习西方,振兴民族工商业。精通英、法、希腊、拉丁文,著有《马氏文通》,此为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此外还著《适可斋纪言纪行》等。

林纾(1852—1924)

福建闽县人,原名群玉,幼名徽、秉辉,字琴南,号畏庐,别号冷红生、六桥补柳翁,辛亥后改号蠡叟,践卓翁,学者称闽侯先生。近代文学家。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早年主张实行立宪,坚持学习西方,批判科举制度。不懂外文,靠他人口述,用文言文翻译欧美小说171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迦茵小传》等。所译小说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著有《畏庐文集》、《诗存》、《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等。

严复(1854—1921)

福建侯官人,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樾老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66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77年赴英留学海军。1879年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总办。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主持变法图强。先后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说》和《名学》、孟德斯鸠的《法

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甄克斯的《社会通论》等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译著集为《侯官严氏从刻》、《严译名著从刊》。

辜鸿铭（1857—1928）

福建厦门人，字汤生，别号汉滨读易者。游学欧洲多年，归国后曾为张之洞幕僚，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将《四书》翻译成英文，著有《读易草堂文集》、《尊王篇》（英文）、《春秋大义》（英文）等。

康有为（1858—1927）

广东南海人，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1879年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内刚兴起的改良思想。同年他初次游学香港，阅读西书，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长处。随着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领导维新变法运动。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孙中山（1866—1925）

广东香山人，名文，字德明，号逸仙。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早年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1894年创办兴中会。1905年组织创建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创立三民主义学说。领导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民主革命运动。晚年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的合作。著作被收入《总理全集》。

梁启超（1873—1929）

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1890年在上海接触到西学。后和康有为一起领导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主张立宪保皇。曾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1918年底至1920年3月去欧洲游历。回国后到处讲学，鼓吹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宣扬资产阶级治学方法。著作收入《饮冰室合集》。

陈独秀（1880—1942）

安徽怀宁人，字仲甫。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的伦理道德，领导新文化运动。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20年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胡适（1891—1962）

安徽绩溪人，原名洪骅，字适之，现代学者、作者、教育家。1910—1917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主张文学革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三十年代曾发表“全盘西化”的言论。194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卒于台湾。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等。

后 记

本书在写作出版过程中，承蒙何毅亭、柳丁同志及山西教育出版社广大领导和同志们热心指导和帮助，提出不少有益的修改意见，由于他们的支持帮助，本书才得以顺利地完成并出版。南开大学的孙香兰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指导作者写作，并给本书作序，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同时，我们写作过程中还参考、征引了学术界前辈和同仁们的有关研究论著，现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我们的学识及研究水平，加之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4月

序

明末清初以来，中西文化发生了较广泛的交流，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对于加强历史学、文化学学科建设，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加深对国情的了解以及总结对外开放的经验，都是十分必要的。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来华传教士、中国留学生、近代翻译事业、近代书籍报刊出版等问题的专题研究较深入，并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但从总体上叙述、分析、评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著作尚未出现，而由于语和、庾良辰等同志编著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此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史实出发，大体勾勒出自 16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轮廓，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原因、过程、影响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论争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态度的变化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书立论有据，分析清楚，叙述平实，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是此书出于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之手，更显得难能可贵。书后附录，材料翔实，可供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通读全部书稿，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此书的《引言》部分简要地论述了文化的定义、文化的结构、文化的本质和文化学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别概述了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最后指出了中西文化的主要区别。这为读者阅读此书做了文化学理论上的准备，同时为下文论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做了铺垫。

第二，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件繁杂，人物众多，千头万绪。作者对纷繁的史实进行了一番分析、排比、提炼、概括的工作，构建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框架，显示了作者驾驭历史材料的能力，使本书在结构上线索清晰，层次分明，有条不紊。如本书第三章在叙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时，既讲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情况，又讲中国文化传入西方的情况；在讲到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既讲不同时期传人的主要内容，又讲文化传播的渠道和途径；在谈到中国文化西传时，既讲传播过程，又讲对西方的影响。这样详细、全面、系统地叙述史实，对读者的阅读有很大帮助。

第三，本书引用材料丰富、精审。作者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中外的原始文献，并对这些历史材料进行一番分析判断、辨别真伪和权衡材料价值大小的工作，把最精当的材料引入书中，真正做到了取宏用精。这种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当然，本书在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希望作者不断加以完善。瑕不掩瑜，应该说此书是一部比较好的学术著作，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是为序。

孙香兰

1996 年 4